



# 传知行学术通讯

二〇一〇年第六期 总 006 期

## 戴晴：昂贵的三峡工程防洪

陆佑楣：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

汤耀国：洪水考验下的三峡工程



【传知行学术通讯】

月刊·创刊于 2010 年

2010 年第六期·总第 6 期

## 【卷首语】

### 低俗不是反革命，是不革命

【主编】

金复生

【封面设计】

李一凡

【本期撰稿（姓氏拼音序）】

楚望台、戴晴、冯素雷、郭玉闪  
黄凯平、孔德继、廖若、李程远  
綦彦臣、汤耀国、吴敖祺、余世存  
杨孚瑞、由晨立、张大军

【说明】

《传知行学术通讯》是传知行研究所的电子刊物，每月中旬发刊。内容包含我们所做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兼有公共话题方面的文字，同时《通讯》也是结交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理念朋友的一个公共平台。我们非常欢迎各位读者加入到我们的撰稿行列，如有意向请投稿到：[chianjinfusheng@gmail.com](mailto:chianjinfusheng@gmail.com)，届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

【出品机构】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网站】

<http://www.zhuanxing.cn/tongxun.aspx>

【博客】

<http://chinatransition.blog.sohu.com/>

【邮箱】

[chianjinfusheng@gmail.com](mailto:chianjinfusheng@gmail.com)

两年前郭德纲在小剧场里开讲相声

《我要反三俗》。内里有一句“敢说我三俗？三俗是我用来侮辱人的手段！”台下观众爆笑不止。两年后“反三俗”运动卷土重来高歌猛进，拿郭德纲开刀祭旗，实在并不意外。



（图片来源于网络）

干掉郭德纲是一个仪式。郭德纲不是一个意见领袖，只是一个出了名的相声演员，被视为低俗文艺的代表。但是党需要干掉他，以宣示自己仍然有控制社会的力量。

党经历过多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消灭了许多与它不同的观点。但是面对低俗，昂贵的宣传机器近乎作废了；甚至这些机器本身，也开始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媚俗起来。比如在新华网和人民网上，也不难在显要位置找到活色生香的图片。

这个党其实也不是很高雅的党，它也是唱着“待到打下了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发迹的。除了一个喜欢弹钢琴的前总书记，以及一个偶尔吟吟诗的现总理，总体上仍然不脱文盲的本色，也需要用低俗的文艺形式自我包装，诸如“什么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党的政策亚克西”之类。

消灭低俗，这是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低俗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低俗没有观点，只有立场。没有横眉冷对，只有嬉皮笑脸。低俗的反义词不是高雅，而是严肃。低俗不反对任何人，但对一切教化施以嘲弄。把讥讽掩藏在荤段子和粗口里，以低俗的形式表达不合作的态度。真正的危机不是遭到反对，而是不理睬和不合作。低俗的人不反对人民日报，但是也从来不看它；这导致反三俗运动如同对着流沙下手，一拳下去全不着力。这是一场试图重建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运动，却也是一场注定了没人鸟他的运动。

楚望台

2010 年 8 月 15 日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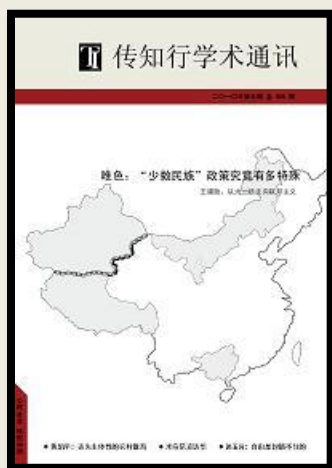
传知行动态 .....	1
刊物 .....	1
会议 .....	1
讲座 .....	1
时事评论 .....	2
医改观察	
“高州”不是模式 .....	杨孚瑞 3
高州医院凸显价格管制弊端 .....	杨孚瑞 5
制度重于医德 .....	由晨立 6
热议	
呼唤有政府的野鸡生存——由唐骏事件反思中国教育 .....	孔德继 9
研究专栏 .....	13
企业一定是利润最大化吗 .....	郭玉闪 13
论刑法第 105 条应该废止 .....	杨孚瑞 15
Maurizio Ferrera 教授谈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福利体系 .....	廖若 吴敖琪 19
税收债务关系说与纳税人权利 .....	黄凯平 25
转型译丛 .....	27
非武装反抗（三） .....	张大军 27
大学论坛 .....	48
我在北京当律师 .....	夏 霖 48
封面·三峡防洪 .....	56
昂贵的三峡工程防洪 .....	戴 晴 57
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 .....	陆佑楣 61
洪水考验下的三峡工程 .....	汤耀国 64
副刊 .....	69
中国人生的圣经——序《回到卢作孚去》 .....	余世存 69
“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推荐好书《思想的蝴蝶》 .....	綦彦臣 72
对话黄有光 .....	李程远 75
货币趣谈 .....	冯素雷 79



传知行推荐 .....	81
新闻.....	81
文章.....	81
好书:《近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话语》(一) .....	楚望台 82

## 传知行动态

## 刊物



传知行学术通讯 2010 年第五期

当这个电子文本编辑结束之后，我用鼠标上下来回肆意翻滚着汇编完成的 PDF 文档，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本期是创刊以来篇幅最长的一次，共 172 页，文章 20 篇。这一期我们制作了两个小专题，一个是讨论民族自治问题的“治道”（感谢黄凯平想出这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它由两篇文章组成，一篇是西藏作家唯色女士惠赐，一篇是宪政学者王建勋教授为本刊新近写就的《从大一统走向联邦主义》，两文从不同角度、观点对现行的民族政策提出了犀利的看法，引人深思，所提出的主张值得当局借鉴。另一个专题与近期波兰政治家米奇尼克的访华相关，我们特别准备了一系列与此关联的文章、访谈，内容近半是在第一时间发表，值得好好一读。

细心的老朋友一定会发现，这一期的封面发生了变化，种种迹象表明《通讯》在向成熟一方不断迈进，在此特别感谢王家敏小姐精彩到位的封面设计，感谢玉闪兄应接不暇的好点子，好方案，还要感谢所有撰稿的老师、朋友、同仁，此不一一赘言。

——《卷首语》

[PDF 版下载](#)

## 会议

●2010 年 8 月 4 日，传知行医改研究小组进行了一次活动。此次活动邀请卫生经济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恒鹏教授来讲座，主题是“对中国政策制定问题的一点思考——以医药政策为例”。朱教授通过严密的经济学思维帮助医改研究小组的朋友们理清了今天药价高企的症结所在，朱教授认为应该取消加价 15% 的限制，引导医院开低价药，并在降低药价的同时提高医疗服务的费用，使医生的医术得到尊重，医患关系得到改善，患者负担得以减轻。讲座中朱教授对医改研究小组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和讨论。

●2010 年 8 月 7 日，传知行主办召开了“精神病与行政强制收治立法”研讨会，探讨将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及《行政强制法》中精神病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多位专家到场发言。

●2010 年 8 月 8 日，传知行税权研究小组在传知行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讨论会，《他乡之税》作者田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程明霞、前国税局工作者张艺科、传知行所长郭玉闪和研究员黄凯平参加了这次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分税制，田毅介绍了《他乡之税》的写作过程，并列举了书中大量而翔实的数据和史料，对乡镇一级的财政治理进行了梳理。刘业进和郭玉闪对分税制分别做了评论。

## 讲座

●2010 年 7 月 17 日，刘柠《从日本模式看中国模式》，地点：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2010 年 7 月 24 日，张大军《基督教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地点：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注：讲座内容的文字整理，请见[传知行主网站](#)。另外，从 2010 年 7 月 30 起，我们的“公民转型论坛”因故将要暂停一段时间，但过段时间还会继续进行，届时会再通知大家，我们期待各位朋友到时继续参与我们的讲座。

## 时事评论

**编者按：**老百姓的看病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近来，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人民医院以“薄利多销”的方式做到了既让老百姓看病不贵，同时也能够赚大钱。高州医院实现了患者、医生、医院的多赢结果，被汪洋称为“高州模式”。在公立医院进退维谷的今天，“高州模式”的出现无疑给人以柳暗花明的感觉。然而，如果既有的管办不分和管制重重的体制不改革，“高州模式”也难免昙花一现的命运。

收入本期的时评文章有由晨立的《制度重于医德》，该文指出，要实现新医改的目标，非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这“四个分开”不可。还有杨孚瑞的《“高州”不是模式》以及《高州医院凸显价格管制弊端》，通过宏观和微观各个角度都说明高州医院成功在目前体制下只能是个特例，公立医院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真的能够从高州医院吸取经验教训，看不起病的问题也许不是那么难以解决。

近来，就唐骏的博士学位问题，争议大多围绕在对“诚信”价值和“唯学历是举”的看法上，并激起了不在少数的一群人对洋学历的嘲笑。孔德继先生《呼唤有政府的野鸡生存——由唐骏事件反思中国教育》一文，从事实分析入手，对比中美高校学历制度，直问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 医改观察

## ■ “高州”不是模式

杨孚瑞

当年的国企改革也是这样，在政府死不放手的情况下，出现了“马胜利”、“张兴让”、“张瑞敏”等模式，可个别孤例无法改变国企沉积多年的老问题。等朱镕基决心改制后，各种模式都不必要的了。

高州医院经过各路人马明察暗访证明基本上是成功的。说起经验，成功的关键在于院长钟焕清的管理到位。这就做到了别的医院做不到的：一，医院运作成本被大幅压低。通过杜绝回扣和采用新的采购制度，进药成本压到最低；日常办公开支也尽量节约，甚至救护车用油院长都管。二，医生收入和科室创收脱钩，用评分的办法给医护人员定收入级别。这就使医生没有了开贵药的动机，而且患者的评价是打分重要内容，这促使医护人员的态度明显热情。三，杜绝红包，并用“黑点惩罚制”处罚缺少医德的医生，由于院长真下功夫监察，确实收到了时效。四，高薪引进人才并投资高新设备，并依靠低收费形成以胸外科为主的优势专科，甚至东南亚人都来此进行心脏手术。其年住院量是6万人，在广东名列第三。五，辅助性的管理措施，比如公开所有医生护士的电话，以便责任到人，也方便患者及时找到负责救护者。



杨孚瑞 Yang Furui

虽然高州人民医院这么好，可是如果称之为“高州模式”并不妥当。因为这只是一个孤例，并不是在合适的



制度环境下自然生长出的无数范例之一。其管理上的种种做法都是可以借鉴、学习的，称之为“模范”或“榜样”倒无不妥。不过要说到“模式”，首先应该是一套制度，其次是其可复制性。

我们说到“神木模式”的时候，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因为这是神木县实现全民平等的免费医疗的一套制度体系。处在这个体系中的各医疗机构都是各就其位而已。反观“高州模式”，仅指高州市人民医院这一家医院的成功。而高州人民医院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有个特殊的钟焕清院长，不仅其管理才能出众，而且其在官僚体系中的背景保证了他能严格管理，甚至能不受医院级别限制开展高端业务。如果看高州市的所有医院，再大一点看茂名市的公立医院，就没有任何值得特别称道之处。

如果高州人民医院的成功运作可以在别处复制，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模式”。不过从各方的调查和评论来看，尤其是从其他医院发表的意见来看，大部分因素则是难以复制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如何在全国推广了。



高州医院住院病房的走廊里贴着医护人员手机号码，随时接受患者的咨询和投诉。图片来源于广州日报。

虽然高州医院基本是成功的，但也并不是就毫无瑕疵。网上也能找到具体的患者投诉该医院“渎职”的帖子。有患儿腹痛输液过程中死去的，也有误诊被割除子宫的。而且当地人也说到高州医院火了之后，谁要想进去工作，也要托关系、送钱。

这些瑕疵说明，高州医院毕竟也是处在一个充满陈腐官僚气息的社会环境中。在现有的体制下，公立医院的领导也是整个阶层体系的一员，并不是市场上的职业经理。待遇好的公立医院就像其他公立企事业单位一样，许多人靠托关系也

要进来，而一旦人浮于事又很难解雇那些有背景的人。再加上日常行政开支的浪费，医院往往靠拼命从患者身上榨钱才能生存发展。所幸的是，高州医院的院长能够靠自己的权威，象职业经理人一样严格管理，清除了很多普通公立医院固有的弊端。

举例来说，公立医院的一个明显弊端是管制严重，这带来几个后果，一是医护服务价格低，所以公立医院往往默认医生收红包拿回扣。二是药价虚高，医院表面进药价格高，但得到返点和回扣这些暗中好处。返点是医院管理者拿，当然他们也就不好管医生拿回扣了。结果就导致患者当了冤大头。而钟焕清院长靠着以身作则杜绝了回扣，极力压低虚高的药价，这是普通公立医院难以做到的。笔者在河北大名县调研新农合时，该县人民医院的院长也说能够以大概全市统一招标价的半价进药，这说明药品降价的空间本来是足够大的。但是很少有医院院长能够象钟焕清这样能够克服这些积弊。

在目前的公立医院经营模式下，设想一下医院院长的利益在哪里。如果他管理得当，医院赚了很多钱，他自己是很难靠正规渠道大幅提高收入的。假如他收受了不正当好处，就有贪污受贿之嫌，假如利用职权为亲戚子女谋利益，这也是特权腐败。他最正当的好处是升迁成更高级的官员。所以很难设想一个普通公立医院的院长面对

卫生局长要把亲戚安排进医院的要求时可以开口拒绝，当领导的亲戚犯了错误时他也很难处罚，更不要提开除。如果因为年龄等关系，公立医院的院长升迁无望，他就很难拒绝医药代表“进贡”或患者“意思”的诱惑。如果一个公立医院的院长真的做到了一不求升迁，二不求个人好处，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他就只能是个没有推广价值的特例，因为毕竟市场经济只能假定每个人都是“经济人”而不是雷锋。

尽管有制度环境不利的因素，个别地方出一些既有敬业精神又有雷锋情操的人还是可能的。除了高州人民医院，还有个例子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金水医院不但收费比同样手术的市级医院低一半，而比高州医院更有雷锋精神，常常为特困群众做免费手术。金水医院不象高州医院“政府没投一分钱”，作为公立医院，每年政府给金水医院投入 6 万元，但免费手术支出就有差不多 50 万元。不过金水医院同样靠着“廉价多销”战略实现了医院的大发展，固定资产二十年来从 20 万元发展到 8000 万元。中央台的“小崔说事”节目还对这家医院专门做了报道。金水医院没有高州医院的胸外科手术那样的知名高端专长科室，做的也没有高州医院那么大，但是仅仅靠院长周国平的精心管理就取得这样的成绩，按说更有可学习性。


如同毛泽东时代有一两个雷锋无法解决真个社会的精神文明问题一样，偶尔出来一个高州医院或金水医院无助于解决普遍的在公立医院看病贵和看病难问题。关键还是要进行公立医院的体制改革，给所有医院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是那些真正有潜力的医院都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有了这样的机制，将不会再有一两所医院因为价格低服务好就闻名全国，因为在竞争下，所有的医院都必须靠态度好价格低以赢取客户，只有那些最杰出的医院才可能闻名并壮大。

在合适的机制下，新的医院也会迅速成长起来，尤其是民营医院。比如，笔者 2010 年 6 月在江西浮梁县进行新农合调查时，发现该地有两所民营正骨医院，都是从一家私人小诊所发展起来的，后来分了家，成为以骨科为主的综合医院，总资产达到 3000 多万元。假如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能公平竞争，可能这两家民营医院会成长的更大。

高州医院的钟焕清院长是个非常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说到其他医院当院长照样能把医院做到这种程度也是可信的。假如有了合适的制度土壤，成千上万个钟焕清都会冒出来。社会上其实并不缺钟焕清这样的人才，而是缺乏这种人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市场。

真正的“高州模式”应该至少在高州地区创造出一个小的地方气候，在这种气候中，能生长出许多象高州人民医院一样优秀的各类医疗机构。但很可惜现实不是这样，而且在卫生部各类条条框框的约束下，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小气候。

当年的国企改革也是这样，在政府死不放手的情况下，出现了“马胜利”、“张兴让”、“张瑞敏”等模式，个别孤例无法改变国企沉积多年的老问题。等朱镕基决心改制后，各种模式都不必要的了。如果公立医院真能实现管办分开，让医院放手发展，虽然有可能出现类似少数国企巨头垄断的新问题，但至少不必再求助于偶尔冒出来的各种“模式”了。如果象高州医院一样优秀的医疗机构能普遍生长出来，看病贵看病难自然会得到极大缓解。

我们希望“高州模式”无人再提，而高州医院能遍地开花。 



## 高州医院凸显价格管制弊端

杨孚瑞

*看病毕竟不同于理发服务，如果没有任何管制，就目前来说，消费者也许就要被榨取的更狠。一个合理的替代办法是由医保机构跟医疗机构谈判价格，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制定价格，因为政府的人力有限，不太可能弄清楚医疗机构的各种服务的具体成本。*

高州市人民医院这一家县级医院的成功，反衬出了全国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不成功，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医患纠纷，也不会有长期的看病贵和看病难的痼疾。正因为痼疾难除，所以近年才启动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大幕。不过，就目前的公立医院改革措施来说，并没有针对政府管制的固有弊端下猛药，有些措施反而强化了管制。尤其是价格管制，比如目前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医院新实行的“零差价”政策，实际上是多了一项价格管制，使这些医疗机构陷入困境。（朱恒鹏：《药品零差价制度后果很严重》）

由于医疗行业的巨大信息不对称，价格管制因其直接和便利，成为政府部门青睐的手段。每当“看病贵”的呼声高涨的时候，就可能来一轮“降价运动”。发改委已经数次下调基本药品目录中的药品价格。但结果就是许多廉价药品有价无市，而许多功能类似的新药和进口药纷纷涌现。从患者角度看，药价一直在稳步上涨，构成了看病贵的主要因素。

据已有的分析，高药价和发改委的药品加成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医院的主要利润点来自三块：一是药品和耗材，二是器械检查，三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价格专家认为是过低的，不足以弥补相应的医疗成本，而器械检查虽然占的盈利比重也不小，但毕竟受物力和病情限制，所以目前“以药养医”的体制还未改变。而药品加成15%的政策（规定是不得超过15%，但医院都按上限定价）则鼓励医院用贵药。据专家介绍，三甲医院往往主动要求药厂提高药价。而普通的公立医院为了盈利目标往往是把医生的个人收入和科室创收挂钩的，所以医生就有了过度医疗的动机。加上医生收受医药代表的回扣，开贵药和不必要的药就成为常态。

据专家调研结果，高州医院的药品费用占总费用比例是38%，明显低于大部分知名三甲医院。这个数字也说明媒体报道的高州医院用便宜药，尽量少用药所言不虚。那么他还能盈利一是因为他靠着服务态度好吸引了大量患者，尤其是农民患者；二是因为有胸外科手术这样的特色专科。而专科之所以能盈利，是因为除了器械检查的盈利外，从医疗服务中的盈利比例较大。三是因为杜绝回扣极大压低了进药成本。同样的心脏病手术，广东省三甲医院要五六万元，而高州医院只要三万元。


高州医院低价售药还赚钱的事实说明了药价虚高的确实存在。而药价虚高除了跟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相关外，主要是价格管制，尤其是药品加成政策的恶果。

高州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并不低，但这是医院应该挣的钱。因为药品和器械检查本来就应该完全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应该有暴利，医院本就应该靠医疗服务赚钱。但是据专家介绍，发改委的定价中反而医疗服务最不赚钱。而且一旦形成了“以药养医”的格局还很难改变。因为如果先提高服务价格，老百姓“看病贵”的呼声会更高，而先取消医院的售药利润则医院受不了。

管制除了有“管制俘虏”等弊端，价格管制最大的坏处就是使供需不能平衡，或者说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事实上，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就是这样，病人真正需要的医疗服务是不足的，医院更愿意提供的是出售药品和器

械检查服务。病人说看病贵的时候，都是在说用了多么贵的药，做了多么贵的检查，或者不得不给了多少钱的红包，但没人抱怨说，给医生的挂号费或手术费贵了。高州医院恰恰是在这些群众最为抱怨的地方，也确实是不应该花那么多钱的地方减少了成本。

不过，看病毕竟不同于理发服务，如果没有任何管制，就目前来说，消费者也许就要被榨取的更狠。一个合理的替代办法是由医保机构跟医疗机构谈判价格，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制定价格，因为政府的人力有限，不太可能弄清楚医疗机构的各种服务的具体成本。

高州医院成功了，但大部分去学习的医院却往往说难以复制其模式。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公立医院管办不分，而价格管制只是公立医院被统的过死的表现之一。 

## ■ 制度重于医德

由晨立

*公立医院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上到三甲医院下到村级卫生室的绝大多数医疗资源，成为老百姓不得不选的选择。*

高州医院以其物美价廉的服务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无论学界、媒体，还是广东省政府、中央政府，都对高州医院的成绩交口称赞。而对其成功原因的总结，无非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高州医院的医生和领导“有良心”，一个是高州医院有一整套高效并且实用的管理制度。



由晨立 You Chenli

看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把良心两字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对它的强调超越了对制度的关注。那么，是不是医德真的重于一切呢？愚以为不然。因为倘或真的如此，则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医德教育和宣传早就应当立竿见影，收效显著。我们的品德教育在中小学宣传“五讲四美”，在大学里强调职业道德，在社会上弘扬医生正气、救死扶伤。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因为医生的私利而滥用药物、药价虚高。而医生收受红包更没有因为舆论批评而销声匿迹，反而因此成为大众的基本就医常识。是因为医德沦丧、人心不古吗？我觉得也不是。当医德丧失已经成了医务人员的主流，我们该把目光聚焦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也就是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会让医务工作者集体性失德？这不禁让我想起大学时一位老师说过的话：“我们从来不缺好人，我们缺少好的制度。”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医疗和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并没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在我们已经通过改革了解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时，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持久的强调医疗的公益性和非市场化。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不应该被允许市场化。餐饮业能够市场化吗？当然不能。因为“病从口入”，饮食行业关乎我

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岂容交给市场去处理。房地产行业能市场化吗？当然不能。房子是我们日常起居所在，一旦被市场介入，安全问题如何保障，这同样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全。汽车、飞机制造能交给市场吗？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两个家伙发动起来速度太快，对安全系数的要求也就极高，万一出现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上述种种担心都源于对市场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则来源于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教育中，对市场缺陷的强调和对政府职能的高估。我们这里不对市场的价值和意义作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对市场机能的研究和评论。而无论如何，我想今天很少有人会因为对市场的不信任，而要求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吃集体食堂而不果腹、住集体宿舍而不保暖，就连买辆自行车，都要凭票供应。你可以反驳说市场当然有缺陷，不然为什么会有毒奶粉、楼脆脆等一系列的荒唐事。然而，细加分析，这些都恰恰说明政府管制理由的荒谬性。建筑行业方面，几乎所有的倒塌楼房和桥梁，都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汶川地震中为何校园建筑垮塌的比例远远高于民宅，原因就是教育具有公益性，故而校舍建设须由政府管制。毒奶粉呢？其出现和政府的食品监管漏洞关联甚密。当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无法落实，当政府不容民间行会自由组建和行使职能，那么具有垄断力量的官方食品监督机构肯定就是丑闻和悲剧的症结所在。

我们今天的政府，想要的权力太大，想管的事情太多，导致政府和市场职能大范围错位。当然，究竟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学界也始终争论不休。但是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政府的规模都太大了。今日政府、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应当做的，恐怕是停止对市场大规模的干预和入侵，并且大踏步的后退。

说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大背景，我来试图把话题拉回医疗行业。高州医院为什么能够成功？根据相关调研和报道，原因恐怕集中在三大方面：低价格、低开支、高收入。

高州医院的收费水平为什么低？根据媒体报道，是因为高州医院禁止医生对患者滥用药物、滥做检查、滥收费用。但是，上述的“三滥”是当前医疗服务领域、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常态。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三滥”？这是因为当前政府对医疗行业服务价格进行严格的管制。

目前，由国家规定的挂号费、诊疗费、检查费、化验费以及手术费等等医疗服务价格都和市场的应有水平严重偏离。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已无力供养，因此允许医院自收自支，也就是在管制服务价格的同时，允许医院利用药品买卖差价获得买入价之上 15% 的利润。由于一个医生的培养成本较高，加之国家垄断大部分的医疗资源使得私营医院生存空间极小，使得正规医院医生成为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虽然每年有大量的医学院学生毕业，但是由于医疗服务机构有限，导致大批学生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医生本来供不应求，应该收入颇丰，但是政府管制服务价格使得其劳务付出无法收到应得的收入，因此医生想尽各种方法弥补自身承受的管制收入差距。因为医疗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故而医生可以利用药品零售差价政策并依赖知识上的专业优势，给患者开出大剂量处方、昂贵药品和不必要的检查，以及利用垄断性的医疗技术收受红包。由于医院需要自负盈亏，所以医生的开药利润不仅要为自身牟利，还要为医院的日常经营做贡献。这就无怪乎医生把药品、检查开得越多越好、越贵越好，而医院也根本没有控制医生开大处方的利益激励。而医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保证常年盈利而不被市场抛弃？因为这个行业几乎没有市场。绝大部分医院是公立医院，属于政府管理，其领导的人事任免并不以医院经营状况为基本依据，医院领导也就不会在服务竞争中做文章。而这些缺少竞争者的公立医院，也就乐得各分一块市场、各占一块山头，安安稳稳的坐收垄断利润。（请注意！这里的垄断不是自然垄断，不是市场垄断，而是行政垄断。）

高州医院为什么能够避免“三滥”？因为他们主动通过降低服务价格来争取市场，这就要求避免“三滥”，对医生作出严格要求。医生的收入何以保障？业务收入结构的优化和总体业务量的增加能够充分保证医生的收入水

平。那么问题的根本，在于为什么高州医院愿意作出这样的结构优化和薄利多销决策？我看，这只能归因于高州医院院长钟焕清的企业家精神，而这种人物的出现和成功，恐怕只是垄断体制中的个案。

薄利多销会不会大幅加重医生的工作负担？应该不会。原因在于高州医院的一种“不法行为”——高标准的服务定价。我们可以举一对简单的例子作为对比。假设和高州医院同一级别的另一医院的医生接诊一位普通门诊病人，挂号费 1 元、诊疗费 3 元；病人患感冒，本不需要大量用药，但是医生为了自身和医院盈利，必须赚取药品差价；因此为病人开出 575 元的药品，从而赚取 75 元的药品利润（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药品采购成本中的灰色收入部分）；这一案例中病人花费 579 元，医疗机构方面赚取 79 元，而药品中的大多数都对病情毫无意义。而高州医院对医疗服务进行自主定价，规定挂号费 1 元、诊疗费 100 元；一个患有相同感冒的病人并不需要过多用药，因此医生只为其开出 50 元药物并且不赚取药品利润；这一案例中病人花费 151 元，医疗机构方面赚取 101 元，而药品足够治愈病人。

通过案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高州医院就医成本更低，而受药品侵害较少，病情同样能够治愈，而医疗机构反而利润较高，结果实现双赢。以上当然是一对假想的案例，但是从总体情况而言，这就是高州医院成功模式和现行体制下其他医院以及患者的真实对比。这一现状反应出当下医疗行业管制的基本效果——病人高消费、滥用药、多检查；医疗服务和药品流通两大领域的机构和个人高额盈利。高州医院的成功所在，就是还原医疗服务的真实价格，而大幅降低药品滥用状况。他们当然会因此接收大量的患者，但是即使患者没有增加，他们同样能够通过服务环节的高收费而获得高额利润，却为患者省了钱。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关键在高州医院敢于突破管制部门对医疗服务制定的管制价格。至于厉行节约日常开支，则是医院整体性严格管理的必然一环，和锦上添花的一笔。

医疗行业困局重重，新医改举步维艰，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久治不愈的顽疾。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政府对于医疗行业的全方位管制。要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吗？结果是公立医院成为垄断受益者。公立医院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上到三甲医院下到村级卫生室的绝大多数医疗资源，成为老百姓不得不选的选择。要坚持政府对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吗？结果是公立医院不以市场为导向、不以患者为上帝，唯垄断利益至上、唯上级命令是遵。这样的医疗机构，根本不能被寄予高尚医德希望。要强调公立医院的主体地位吗？结果是私营医院欲投资医疗市场而不得，大量本应进入医疗领域的资金被闲置或转投他用。大量医学毕业生也因为行业资源有限而放弃本业，另谋生路。这一切使得本就不足的医疗资源愈发稀缺。

真要实现新医改的目标？我看，非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这“四个分开”不可。在此意义上，高州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 热议

### ■ 呼唤有政府的野鸡生存——由唐骏事件反思中国教育

孔德继

美国的野鸡学校固然可以鄙视，通过 Pacific Western 大学的被起诉案可以发现一个美国虽然有“野鸡”，但美国还有维护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独立的法庭。



图片来源于昌邑信息港。

就唐骏的博士学位问题，近来的争议大多围绕在对“诚信”价值和“唯学历是举”的看法上，并激起了不在少数的一群人对洋学历的嘲笑。似乎大家都在一个价值观的战斗中不亦乐乎，无论如何，大家起码可以很轻松地嘲笑美国教育<sup>1</sup>和中国的本土商业英雄。学历门凭借对网民巨大的心理慰藉借助网络的翅膀，让唐骏与学历的段子持续热了一周。

我最近在想，在我和唐骏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买了学历，又有什么不好？买学历大不了是一个美

国公司和一个中国客户的交易而已。不承认唐骏的成功一定算是虚伪，如果我们承认成功的唐骏，有能力就读一所非野鸡学校并获取学位的唐骏买博士学位是出于理性的选择，那个这样的选择必然有其理由。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一个在品德上有些瑕疵，工作上很有成就的人作为一个个体出现了。我们如何在批判别人不诚信的同时又能从容地告诉孩子这究竟有什么不好，而不是以为逼着唐某人道歉看人家的笑话。

如果我们非要批判、嘲笑和宣泄些什么，何妨将视角留在大洋此岸？

#### ➤ 野鸡大学与“学而知耻”的美国治理

对于卖文凭的是西太平洋大学，2006年夏威夷政府消费者保护办公室提出了异议并起诉到了法院，独立的法庭对这样的野鸡大学判处解散的极刑<sup>2</sup>。

尽管野鸡大学也生存在美国的社会中，但更多美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公民及其附属的政府和法庭有足够的能力和路径去有效治理这一欺诈行径<sup>3</sup>。就野鸡学校在美国的发展和政府的治理，我愿意用一个不甚恰当的词来概括，

<sup>1</sup>资料来源 <http://tech.sina.com.cn/it/2010-07-18/17414441403.shtml>

<sup>2</sup>资料来源: [http://www.21cbh.com/HTML/2010-7-7/zNMDAwMDE4NTUzNA\\_2.html](http://www.21cbh.com/HTML/2010-7-7/zNMDAwMDE4NTUzNA_2.html).

<sup>3</sup>资料来源: [http://tech.sina.com.cn/it/2010-07-16/11304436920\\_3.shtml](http://tech.sina.com.cn/it/2010-07-16/11304436920_3.shtml).



就是“学而知耻”。

与学而知耻的美国相对，则是我们不难见到的学而不耻的中国教育。

### ➤ 学而不耻的中国家鸡，拒绝改革的高考

中国教育，对一个混迹于校园将近 20 余个年头的我看来，用“学而不耻”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头几届，高考改革那时候也是个争论的小高潮。但无论如何的风吹和草动，高考都被认为是目前环境下最公平地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这个雷打不动的理由下，改革一直是不痛不痒的小打小闹。即便承认高考是一个相对比较不坏的制度，但这一判断的逻辑前提则是只要高校招生有较大的自主权，就相应会有较大的舞弊。也可以说，高考不改革是因为对高校管理者、包括教授在内的高校教职工群体整体道德水平的不乐观。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教育家和教育系统的干部，伟大的政治家对此而进行解释或感到羞愧。

### ➤ 机械化的大学管理

经过了一次复读，我考入了一所首批被列入 211,985 工程的重点高校，但这所高校和其他很多高校一样，在平日的 23 点钟要断电，校网络中心不急给大学生宿舍安装宽带和并管制集体电视房的观看时间（每晚仅开放 18:00 到 20:00）。

我曾对这样的管理提出质疑，并认为这与我校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大学的目标精神上相悖。但校领导的解释是这都是为我们学生好，有了电，夜晚有人不休息就会影响他人休息；有了网络，就会有很多学生迷恋游戏和在线电影；并且电视也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也不否认学校领导对学生的好意和对学生日常生活状态的判断，但即便是这样，起码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不能自律协调好宿舍关系和有效利用网络的学生，还都考入了国内的重点高校。还是我们本来就是野鸡学校，本来就招收野鸡人才，还是其他原因。

### ➤ 教授无为的大学行政

正在对垃圾管理和垃圾校风鄙视不已的同时，我忽然在课上听老师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在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生招生面试中，要力图把本校的考生留在本校读研，尽量杜绝把一些通常被称为考研专业户的高考重灾区的高师院校的学生招进来。其中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我校的学生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当时的我认为，一个历史系每年有将近三四十人被保送研究生，而这三四十人十之八九志趣并不在学术，何不将学习的机会留给那些只有野鸡学历的爱读书的人。院方也并非不清楚这一点，决策者们的考虑是这样可以提高饱受非议的就业率。

我当时真是觉得这个制度烂透了。除了朱学勤、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为个人表达对这种制度的抗议和不合作，大多数教授还是普遍接受和默许这种不合理的制度。

在我的大学生涯走到将近到四分之三处的时候有人说我适合读研，我不怀疑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热情，但我不相信招考制度能给我这样的异类留出口。我真的能够考上理想的导师的研究生吗？我能保证老师能否喜欢我，但不能保证我能够被顺利录取。因为有很多制度限制。



孔德继，独立学者，1982 年生于天津近郊，现居北京。目前主要从事与中国政教关系和土地制度相关的实证研究。

首先的一个制度设置就是复试比重不超过招生计划的 120%。其理由在于限制招考单位的选择权限,也就是说,如果计划招生 5 个人,最终录取的 5 个人只能在初试前 6 名中选出。这样安排的理由在于,导师作弊的机率大大降低了。相反,导师没有了自主权,不擅长、不精于,甚至不屑于将大学将近一半的时光用于考研事业,并不对分数吹毛求疵的人,就没有了被拣选的机会。本来很好的师傅带徒弟的关系,但到头来因为整个师傅群体道德的“不可靠”,使本来你情我愿的师承关系的确定权被交给了洋文老师和政治专家们的第三者。

社会整体包括教育体系在内的道德失范,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买单的就是一个个大师不能选择“能听懂大师讲课的耳朵”。60 年来大学的发展,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教师和学生的边缘化。教授治校<sup>4</sup>的传统丢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校的衙门化。当大学又恢复了副部级的单位制,即便是在硕士尤其博士的招生过程中高校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学校往往有选择固步自封。因为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官场中,手都不希望自己的政治生涯折戟于某个考生对考试不公的控诉。于是灵活的招考制度,又慢慢成为了教育改革口号下的炮灰。

在就读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八年来,总不免因为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受到羡慕。之所以有这些羡慕,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对大学、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真正了解,而是因为学校和各种学位、学历教育各种差等的存在。换句话说,学校与学校相比,总会有些学校要扮演野鸡学校的角色。非学历教育相比学历教育是野鸡,三本相比一般本科院校是野鸡,一般本科院校相比重点高校是野鸡,地方重点高校相比京城名校是土鳖。

综上,即使抛却各大学对学历证书的大量生产和兜售,各正规甚至名牌大学,即所谓家鸡,也是个类野鸡的东西,起码都浮现着浓郁的野鸡气质。在中国家鸡普遍野鸡化的时代,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治理对教育的无为,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即便美国也不能杜绝野鸡学校的层出不穷和蒸蒸日上,但美国教育的繁荣和良性的竞争和发展,却和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教育市场供应				中国教育市场供应	
学历学位证书提供方	正规大学		“野鸡”大学	“文凭工厂”	国立大学	办证公司
产权性质	国立	私立	私立	私营	私立学校	私营
学历教育	真学历		假学历,	假	学历教育 非学历教育 假学历教育	仿真证书  真学历
学位证书	真证书		“真”证书		真学历, 真证书	假证书
是否经过教育认证机构认可	有		没有	非法	有	非法

#### ➤ 国家在公共领域的缺失

美国的野鸡学校固然可以鄙视,通过 Pacific Western 大学的被起诉案可以发现一个美国虽然有“野鸡”,但美国还有维护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独立的法庭。反观我们本土,各种民办大学且不说,各种名校也随时在兜售自己的自考和网络教育的证书。本应占领道德高点的中央和各地的党校,近年来却广受诟病,其学历的水分和合法性

<sup>4</sup>资料来源: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508>.

广遭质疑。

可以说，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国民教育体系，如今普遍成为了教育当权者的淘金机器，而这种本土文凭的兜售形式与美国野鸡的不同之处是公立学校的野鸡化。这种国民教育体系的野鸡化的本质在于公权力的确实和整个教育系统自律性的溃败，也可以说是“学不知耻”。表面上有学历和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却越加崩溃，是非观点越加淡漠。即使是在唐骏学历门如日中天的今天，也没有一个人将清华北大以及各本土名校的野鸡化行为进行质疑和批判，在教育司法的历史上，也没有将国民教育体

系中这些名牌大学送上被告席。

通过中美对比可以发现，美国有野鸡学校，有正规的非野鸡学校；但中国（限大陆地区）表面上很难挑出哪个标准评定出哪些学校是野鸡学校，但一旦将兜售学历作为评判标准，恐怕中国高校中没有哪所不是野鸡学校。除了“办证”的作坊里仿冒的证书，其余兜售的各种学历基本都是经过国家教育体系认证的真东西。各种评价机构不仅充当了运动员，还是其中的黑老大。

遗憾的是，在近来的学历门中，没有中国野鸡学校被揪出来，相比中国没有美国野鸡学校更遗憾的是，中国也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公立的职能政府和超然的价值评价体系。说小了是政府缺位，说大了是国家权威在公共领域的缺失。

### ➤ 三本好就业，野鸡学校的中国式超然


弟弟 2008 年高考，平时学习不刻苦，成绩自然也不优秀。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建议他填报一个能学技术的专科学校，这样到时候兴许好就业一些。因为我了解很多正规的本科文科专业就业都很难。专科起码比他能够报考的三本要强得多。

弟弟马上纠正我的说法，告诉我一般三本学校的就业都比二本还要强。我不明白是何道理。他告诉我愿意华而不实地付较高学费选择三本的有很多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家庭大多能帮他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岗位。而二本和高职（专科）的学生们则不具备这样的群体特点，较一般化的学历优势，也很难使他们在社会中脱颖而出。

对三本略有了解者，都知道三本相对传统高校的野鸡性质。用人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未必不知道应聘者的野鸡学历背景，但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这些招聘者可以“英雄不问出处”。

### ➤ 中国教育何去何从

首先，我真心希望，中国会有野鸡过街的时候人人喊打的一天，天下的学校，不只是野鸡一个品种。呼唤有野鸡的、有政府的、学而知耻的腐朽时代的到来。

如果从操作的层面给中国教育开个药方，兴许真正放开教育市场，让腐朽的垄断主义退去，自由的公益精神进来，是一条圣贤掌舵大船之外的一个出路。 

## 研究专栏

**编者按：**本期研究专栏我们继续连载郭玉闪关于企业理论的系列读书笔记，以及杨孚瑞的《论刑法第 105 条应该废止》，他宣称：“只有废除刑法的 105 条，我国才能融入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政治文明。笔者坚信，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另外，黄凯平在《税收债务关系税与纳税人权利》一文中，梳理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Maurizio Ferrera 教授是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社会和政治研究生院院长，同时还身为欧盟委员会社会政策顾问小组成员。廖若女士 2010 年 5 月 28 日在意大利米兰 Ferrera 教授的家中对其进行了一次专访，话题主要为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福利体系。关于福利制度，在中国一直都有激烈的争论，传知行的基本主张属于经济自由派，对于福利制度的采纳持谨慎保留态度，但是在中国目前民主缺位且高税收的情况下，传知行也赞同国家必须将钱更多投入国民福利。讨论福利制度兴废，当然需要同时了解一些国际经验，所以本期访谈旨在抛砖引玉，供读者扩展视野。

## ■ 企业一定是利润最大化吗

郭玉闪

参考文献：

- 1、The emerging theory of the Firm, Harold Demsetz 1992
- 2、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A.Alchian, 1950, JPE
- 3、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M.Friedman, 195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msetz 说，自大萧条后三十年，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的好奇逐渐消退，转而到对企业增长的分析以及对传统经济学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挑战上来。关于企业增长的话题按过不提，对利润最大化假设的挑战，前后有很多人可以说，包括 H.Simon、A.Alchian、M.Friedman 等等。




郭玉闪 Guo Yushan

H.Simon 就是 1977 年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在商业决定中，由于决策所依据的数据并不充分，因此无法全面理性的计算，所以假设企业家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策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方法是承认人类理性不足，也即“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从有限理性出发，Simon 认为，企业家决策行为的目标是“满意”（satisficing）而非利润最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

Simon 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否定主要来自于理论上的，其实在 Simon 1947 年发表《Administrative Behavior》时已经有两拨反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声音，分别是牛津研究小组（Oxford Research Group）的研究（Hall and Hitch, 1939）以及美国经济学家 R.A. Lester。Lester 对利润最大化的反对张五常常在讨论经济学方法论时曾经提过。他们主要反对理由是经验上的，他们发现现实中很多企业并不是按边际定价原则决策（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相反用的是完全成本定价（full-cost pricing）或者惯例（routine）来决策。

相应的，回应挑战的经济学家也做了一系列有力的辩护。Harrod（1939）提出，现实中不是所有企业都按利润最大化行事，但是引入一个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最后只有那些能接近最大化行事的企业可以最终生存下来。A.Alchian（1950）则对 Harrod 的解释做了更有力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里的企业其实就是个人，个人完全可能由于信息不足而选择按惯例（routine）行事。但是，企业所在的行业（不是单个企业！）则在一个自然选择过程中趋近于利润最大化假设（边际决策原则），那些按惯例决策的企业，由于“幸运”的满足了更优化行为的要求而被竞争保留下来或者保留的更长久。所以在行业层面，利润最大化原则或者边际决策原则依然存在。

A.Alchian 1950 年的文章是经济学经典文献，同时也为他赢得了演化经济学的美声。同时，还有一篇重要文章是 M.Friedman 1953 年写的《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这篇文章里对经济学前提与结论关系的方法论描述，张五常曾经简洁表述为“从 A 推导到 B，如果 A 错，B 未必错，但如果 B 错，则 A 一定错”。也就是说，经济学命题最重要的是验证结论，如果结论错了就必须修改前提，如果结论没错，那么 A 即使错了也不要紧。Friedman 的这个方法论影响非常广泛，被人称为工具主义，也为经济学家赢得了最多的笑话故事。

Friedman 的方法论背后其实是 Popper 的可证伪主义的影响，也是在人类无法从最终知识直接出发构建知识结构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实用态度。当然，直到今日还不断的有经济学家挑战这个知识局限，行为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行为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式简单的说就是从人的生物性出发直接建立人经济行为的真实前提 A。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都属于这类，2002 年 Vernon L. Smith 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而获得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弗里德曼，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 ■ 论刑法第 105 条应该废止

杨孚瑞

“叛国罪用于控制权贵…，戒严令用于吓唬平民，而谋叛罪用来恐吓知识分子。”——维基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了两条罪名，第一款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二款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两个罪名实是 1997 年修订刑法的时候形成的，之前这两个罪名分别是反革命组织罪和反革命宣传罪。

“反革命”是个历史上的政治词汇，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年互相指责对方“反革命”。根据俄国解密档案，从 1917 年 1990 年，苏联总计有 3853900 人以反革命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 827995 人被判处死刑。中国人究竟有多少人被判反革命罪还在保密当中。但根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仅 1950 年代初的镇反就杀死反革命 70 万人。茅于軾先生推测文革年间的反革命犯约有 150 万人。1949 年以来有多少人因“反革命”被关被杀还是个迷。

1979 年制定的刑法专门规定了反革命罪这一章。据说，制定反革命组织罪的初衷是为了制裁四人帮这样的党内手握重权的人，以便把残酷的党内斗争纳入到法制轨道。但实际上 1980 年代被依此条定罪的大多是民间异议人士。反革命组织罪专门对付有反对现政权言行的民间结社行为，而对于从言论和出版物上反对当局的人则规定了反革命宣传罪。尽管相比没有法律时代的滥捕滥杀有了进步，但仍不断有人因结社和言论被投入监狱。

1997 年修订新刑法，把反革命罪改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而相应的两个罪名改成了现今刑法 105 条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尽管政治术语“反革命”变成了法律术语“危害国家安全”，但其本质未变。法院内部请示程序、判断标准以及公检法的办案方式跟以前判决反革命罪的时期都几乎没有变化。所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但刑法 105 条的效果却使这种自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刑法 105 条第一款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这一款的法律表述很难经得起推敲。首先，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提出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对政府政策的严厉批评、对国家领导人表达不满叫不叫颠覆国家政权？政府总是在一届一届的更换，要求更换政府领导人叫不叫颠覆？也许有人认为，只要执政党是共产党就不算颠覆，事实上 1990 年代末有人因为组织“中国共产党改革派委员会”被判刑。公检法部门不少人认为，如果一个组织的纲领或宗旨



林昭，本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 年，以江苏最高分考入北大新闻系。后参与了北大《红楼》诗刊编委，1957 年被打成右派，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60 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 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反革命罪收监，判刑 20 年。1968 年 4 月 29 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图片来源于网络。

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是颠覆组织，可以判颠覆罪。实际也不尽然。以 2001 年“新青年学会”一案来说，其成员不过几个刚毕业及未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宗旨不过是“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但仍然被判颠覆罪，四人被判重刑。

其次，组织、策划、实施如何认定？在公检法看来，成立“非法组织”是关键。按说，凡是没有注册登记的团体都是“非法组织”，考虑到社会团体到民政部门注册的难度，实际上 2004 年底，没有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 100 万，显然不可能把这些 NGO 们都当作潜在犯罪集团。而“组织”后面的“策划、实施”很容易受到随意解释。就“新青年学会”案来说，有人说将来办个杂志、或筹划一个网站等等都可以说成是“策划、实施”颠覆政权的行为。理论上，你就是要结婚生个孩子也可以认为“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因为你思想反动想培养反党的下一代嘛。

再者，“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更是荒谬。某某主义是明显的学术语言，加上制度两字竟然变成了法律工具，谁要反对就要面临高至终生监禁的惩罚，比之君主国的皇权还要神圣。世界上各种主义之所以百花齐放，乃是因为各有所长。社会主义注重平均分配和公共福利，自由主义注重保护个人财产和自由，民族主义强调族群整体利益，民主主义则认为公意至上。此外还有个人色彩浓重的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罗斯福主义等等。认为某个主义是对是错完全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人权。中国政府也承认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第 19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所以反对社会主义不过是人的主张自由而已，而按照我国刑法 105 条却成了重罪。真正的社会主义北欧各国没有哪个要用法律确立社会主义不容动摇的地位，以自由为天命的美国也没有要制裁反对自由主义行为的法律。

虽然 105 条从四人帮后其制裁对象都是平民，但同时也是高层领导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解，中国搞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就等于已经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邓以来这些领导人也就成了触犯刑法 105 条的罪犯。尽管学理上狗屁不通，但堂堂的国家法律条文却仍然这么写，事实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在现任领导人手中。不过假如将来毛派当政，换个解释，就又会另有一大批人为此获刑。这种文不对题、唯当政者意志为解释的条文是人治政府最好的工具，当然也就是法治国家的敌人。

刑法 105 条第二款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表面上，这一款有“造谣、诽谤”等词语作为限制词，使得公检法办案时不容易滥加解释。但实际上，这个和造谣、诽谤并列的“其他方式”就可以无所不包。1998 年，刘某某因为想出一本民间杂志被判煽动颠覆罪。可是他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诽谤，也没有号召读者推翻现政权。但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四年。

实际上，大量的煽动罪根本就谈不上造谣、诽谤，仅仅是揭露某个事实或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就因忤逆上意被判煽动颠覆。比如有些人因为认为八九“风波”不是暴乱，或者讲述自己在那场运动中的所见所闻而被依此条判罪。前不久的四川谭作人案更不符合造谣诽谤的条款，与境外人士通过邮件竟然成了罪行。这个案件在网上传播广泛，大家普遍认为是四川地方当局为了惩罚谭作人的环保行为硬往危害国家安全上靠。事实上，在人治的现实社会，这一招的确有效。从林彪、四人帮到后来“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凡是有了权威历史判断，那么只要谁敢质疑这些判断，谁就可能成为煽动犯。可假如谁也不敢质疑的话，邓小平是毛亲自批倒的，文革是全党全军一致拥护的，刘少奇是被永远开除出党的，这些历史结论怎么就反过来了呢？最初支持邓小平、提议批判文革、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是不是就等于犯了煽动罪（当时还叫反革命罪）呢？

更多的煽动罪的罪行不过是宣传政党政治、三权分立、民主直选等世界公认的政治理念，比如刘晓波案。这

些理念更不是教唆人们去造反，相反，象刘晓波这样的人还一贯反对暴力。仅仅因为下命令的人有力量能够做到把某人送进监狱而不顾法律尊严，那就必然带来对力量的崇拜和对法律的蔑视，事实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早已感到了权力的魔手无所不在以及法制和道德的普遍败坏。跟 1980 年代相比，人们甚至已经放弃了社会还能改良的希望。

迄今为止，许多人实际上还没有摆脱“阶级斗争论”的毒害。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镇压的工具。阶级敌人，现在叫敌对势力或敌对分子，都是危害统治阶级的罪犯。跟他们联系，认可他们的主张，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也就等同于犯了罪。这在 2002 年新疆哈密的“巴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搜网）中看的更明确。巴敦的罪行就是写信跟敌对分子联系，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既然是煽动罪，得有煽动别人造反的罪行才好，可是他的罪行不过是“发泄不满”。他为发泄不满付出的代价就是坐牢 5 年。

有人会说，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宪法，不就是颠覆政权吗？高铭喧教授就认为刘晓波的言论内容违背了中国宪法条文，所以就触犯了法律。其实不然。实际上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就是因为制宪者认识到坚持共产党领导不能用来要求全体国民，所以才不能写入宪法正文，只好写入宪法序言（杨景宇《认真学习宪法 增强宪政意识》）。况且，宪法条文本身就是可以修改的，否则，谁第一个提出对宪法的不同意见谁就犯罪，那么宪法就成了万古不变的僵尸了。笔者在 2003 年的辩护词《言论自由不是罪》中举过一个例子：邓小平 1992 年南巡时提倡市场经济，而当时的宪法还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经济”。邓当时是一公民，他的言论虽然和宪法不符，但正是这个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提议才使得宪法随后得以与时俱进的修改。假如按高铭喧教授的理论，言论和宪法不一致就是犯罪，邓小平当时就该被关进监狱。

1999 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针对邪教出台了一个法律文件，《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 年又发了个公告作出补充解释。从此，有些散发法轮功材料的信徒可以依照刑法 105 条来判煽动颠覆罪了。但这个解释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们的行为是否被定罪只能根据行为本身，而不应该根据其身份和宗教信仰。奥姆真理教的教主因为杀人被死刑，但那些没有参与杀人的信徒依然可以信仰明显是邪教的奥姆真理教。

有些人，如高铭喧教授，认为发达国家也有颠覆罪和煽动罪，我国刑法的 105 条也属于世界惯例。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国外的法律当然有制裁叛国、武装叛乱和暴乱的罪，但是，对于公民在政治上对政府和领导人不满的行为，发达国家现在都没有了相应罪名。不过，历史上确实有过谋叛罪（sedition）。英国 1590 年的伊丽莎白时期出现了 sedition 的罪名，1972 年英国最后一次以此罪名审案，直到 2009 年该罪名被正式废止。在美国，1798 年亚当斯总统时通过一个法案惩罚反对美国法律和总统的行为，后在杰斐逊时期失效。1917 年通过了一个间谍法案，惩罚策动军人叛乱的行为，但该法案 1921 年就废除了。1940 年通过的史密斯法案规定宣传推翻美国政府的行为是犯罪，但该法案主要是针对美国共产党，有点类似于我国针对法轮功制定的反邪教法律。1957 年该法案在最高法院通过实际案例失效了（维基百科）。伊拉克战争时，美国人可以放心的咒骂美国政府是法西斯而不用担心有任何犯罪嫌疑。高铭喧教授指出的瑞典法律有煽动规避公民义务罪和违抗公共机构罪其实不过相当于我国的妨碍公务罪。其他举例罪名也大多可在我国的危害公共安全罪里找到相关罪名。所以我国刑法 105 条的罪名只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曾出现过的 sedition 的国内版。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的 105 条基本上成为限制公民结社自由和言论的工具。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依据此条进行的刑罚往往又反弹起更普遍的社会不满，因此，105 条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正面的社会意义，甚至对维稳都是负面影响。假如没有 105 条，有人想打击谭作人的环保维权就不容易，就算另找借口逮捕谭作人，社会影响也仅限于四川当地。而现在人们因谭纪念八九“风波”而坐牢因而产生的不满则遍布全国，而且抱怨的对象不只是四

川一地，而却指向高层。在国际上，刑法 105 条的存在也被普遍认为违反人权，这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因此，废除刑法的 105 条势在必行。无论为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减少人权灾难，还是为了社会和谐稳定，都应如此。

可是，有人也许会担心，要是真有人借助哥老会这样的组织想要造反怎么办？从长期来说，公民的结社自由如果有了保障，那么结社的过程和社团的活动也就容易受到社团法的规范。社团的活动应该是公开的，有规章可循的。就法律效果来说，对于有政治目的的团体，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犯罪行为，只有参加选举或者监督政府等行为，是对社会有利的，应该依法保护。如果某个团体真想造反，那要么得筹备武器，要么得发动军事力量，这就违反了刑法中其他的条款，比如第 104 条的武装叛乱罪和暴乱罪，可以依法惩处。如果在团体的发展中为了筹资从事了贩毒、诈骗、卖淫、勒索等犯罪行为，那当然更可以依法打击。

如果废除了刑法 105 条，有些人乱骂领导人、骂执政党怎么办？国家体制不是风筝，不是某些人骂骂就能随风飘走的。但如果骂的人多了，那当政者就要想想，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有没有更好的执政方法？至于说领导人个人挨骂，那是当公众人物的代价。实在忍不住，还可以依据刑法第 246 条告骂人的人诽谤。

另外有的意见是把颠覆和煽动颠覆改成“暴力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煽动暴力颠覆国家政权罪”，强调涉及暴力才算犯罪。这个意见出发点很正确，不过，我国的刑法已经对暴力犯罪在其他条款做出了规定。比如对武装反叛有 104 条的武装叛乱罪和暴乱罪和 108 条的投敌罪；对破坏公共设施有 115-119 各条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搞针对政府人员的恐怖行动有 120 条的恐怖组织罪；对涉及武器弹药的有 125-128 各项危害公共安全罪名；等等。对于煽动暴力的，策动武装反叛有 104 条；煽动群众暴力冲击政府的有 277 条；煽动民族仇恨的有 249 条；煽动暴力反抗法律实施的有 278 条；等等。

废除了 105 条后，只有真正采取了暴力行动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才会得到惩处，而根据 105 条进行的判决中，“妄图颠覆政府”、“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妄图推翻党的领导”等等诸多根据“妄图”进行臆测定罪的不合法判决才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只有废除刑法的 105 条，我国才能融入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政治文明。笔者坚信，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T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此处有删改）



## Maurizio Ferrera 教授谈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福利体系

访谈人：廖若

整理人：吴敖祺、廖若

**吴敖祺按：**本次访谈是 2010 年 5 月 28 日在意大利米兰 Maurizio Ferrera 教授的家中进行，访谈语言为英文。中文整理稿尚未经 Maurizio Ferrera 教授审阅。

时至今日，除了少数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还在做纸面上的“意识形态革命家”与逻辑精美的“理论家”，已经极少有人会否认一个统一的、全面覆盖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对于维护公民“社会权利”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正面作用。

在盎格鲁—撒克逊古典自由主义模式发源地的英国，丘吉尔所领导的保守党在二战结束后的大选中黯然落败，为其捍卫的传统英式社会模式敲响了丧钟。工党所推动的福利国家机制开始占上风。向福利国家的转型思路早在英国 1942 年所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中就得以体现，这份报告也深刻影响了二战后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机制建设。

即使在保守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的美国，罗斯福政府在 1935 年推出《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也标志了统一化的社保制度开始在联邦政府层面得以建立。

虽然之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革命”看似从政治意识形态上逆转了“左倾趋势”，但事实上，不管是在“新保守主义”共和党执政时期的美国，还是在撒切尔夫人主政下的英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以及增加妇女和少数族裔工作机会诸多领域的作用都在明显加大，消减社会福利公共支出的声音仅仅是“雷声大，雨点小”。

Ferrera 教授在访谈中所提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羁绊和全国性标准的构建，也是当下正处于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进程的中国需要注意的。中国同样面临着一场在资源有限前提下将呈“碎片化状态（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制度、城镇企业制度、农民工和农村务农人员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予以重组整合、朝着“普遍统一化”国家福利制度方向迈进的重大变革。



Maurizio Ferrera 教授是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生院院长（Political Science and President of the Graduate School in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Milan【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他同时还身为欧盟委员会社会政策顾问小组成员（the Group of Societal Policy Adviser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其最新的研究著作作为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Southern Europe: Fight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Italy, Spain, Portugal and Greece: Fight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Greece, Italy, Spain and Portugal。

点击访问其[个人网站](#)。



**Maurizio Ferrera:** 思考意大利的福利体系，要考虑到一些特点，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发展形成了一个社会福利体系。欧洲国家福利体系改革的出发点是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的，特别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公共债务水平很高。

意大利社会福利体系的特点在于存在一些较大的扭曲。一个扭曲是在对于不同生命周期“呵护”的资源分配，它过度强调对老人的保护，而忽略了对生命周期中早些阶段的保护，如儿童早期教育、社会互利、家庭津贴、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还有失业保险水平等，在这些领域发展都存在不足，不管是在融资方式、还是在机制建设方面都是如此。

第二个扭曲是分配性的扭曲，对于某些社会团体存在特别优待。特别是从教育程度的分类来看，一些团体是享有高度特权，受到高度保护的，比如公务员群体，大企业雇员等。而这些人所受到的高度保护远远优惠于自由职业者或是中小企业的雇员，甚至有时候是以牺牲对老年人的保护为代价——尽管对老年人的保护也存在资源分配过度的情况。

所以这个受到高度保护的类型，就成为所谓的“内部人”（insider），比起那些“外部人”（outsider）事实上享有了多得多的“福利特权”。这种“差别待遇”是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最大的挑战不在于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水平特别高，而是社会支出的内在结构、以及对未来支出水平的预期，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过度保护老年人的制度体系，而意大利现在又正处于老龄化趋势之中。

90年代当我们还在争取加入欧元区的时候，我们的财政部长被他的欧盟同事们这么问，你们的养老体系在三十年内将吸走25%的GDP，你们打算怎么办？

因此我们在养老改革方面必须进行改革，所进行的第一步就是1995年的“迪尼改革”，兰贝托·迪尼是我们当时的总理。这次改革改变了整个养老体系的结构，引入了一个建立在固定缴款（defined contribution）基础上的新配方。虽然这个改革还在逐渐地产生效果，它最终将对养老支出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你看2050年欧盟国家养老支出的预测数字，意大利预计就会排在较低的位置，甚至低于法国、荷兰等国。所以95年的改革再到97年，然后到了2004年、2007年又有一些微调，所以这个改革实际上已经拆除了我们养老体系的一个“时间炸弹”。同时这个改革也消除了一些分配性的扭曲，也就是取消了一些“内部人”的特权。

然后另一个趋势就是“填沟”，针对家庭政策、社会服务等领域。有一些新措施引入来填补这方面的不足，来提高多子女家庭、失业和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因为我们仍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贫困人口较多，特别是多子女家庭，而我们的失业保障体系也还未得以改革。失业者要得到失业救助仍然很难，这往往是因为一些程序上的障碍，特别是那些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他们一旦被解雇将很难得到及时的失业救济。所以我们的失业者中，100个里面可能只有30个能够得到失业救助。

而且我相信在养老改革方面也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需要推进，比如需要推迟退休年龄来释放部分资源用于解决那些保护不足的部门，来解决我们所说的那种“双重扭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就业率，特别是在妇女就业方面，意大利的妇女就业率较低，16岁到54岁之间的女性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不足50%。所以我们必须有政策来调和家庭生活的需要，照顾儿童的设施、产假等，使得劳动力市场更能够吸收女性的就业。

**廖若:** 所以照你所说，意大利的养老改革已经过了“攻坚阶段”，并且就未来长期来看能够产生比较积极的效果，甚至比法国和荷兰的情况更好？

**Maurizio Ferrera:** 是的，而且还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比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分配扭曲现在没有意大利这么严重，这是因为他们开始较晚，所以他们需要时间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特别是在什么风险将受到保护、谁将受到保护的这两个方面。比如葡萄牙，如果他们不进行养老改革，他们将见到一个两极分化的未来，会产生一种社会分配上的巨大扭曲，在养老体系上支出巨大，但其他部门就没那么多。当然最严重的还是希腊。希腊甚至还没有开始改革他们的养老体系，他们现在的情况甚至还不如意大利迪尼改革之前的情况。

**廖若：**你的新书中希腊一章的标题是“双手绑在背后”，他们甚至无法开始改革，原因何在？

**Maurizio Ferrera：**希腊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一个非常碎片化的状况。不只是社会体系，还包括政治体系。他们的政治体系直至现在都还是以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为特征，所以对他们来说要开始改革更困难。他们既有政治机制使得一些小团体都拥有能力一票否决改革政策的出台，所以非常难取得广泛一致。

意大利以前的改革存在一个“外在约束”，我们当时必须改革才能加入欧元区，才能成为欧洲领导力量的一份子。但希腊现在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政治文化不同，他们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非常强，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同样如此。1996 年意大利为了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甚至都为加入欧元区增加了一项额外的“欧洲税”。而在希腊并没有这种紧迫感，他们不会认为为了留在欧元区之内就必须遵守“欧洲义务”。希腊人的反应不是“我们”应该怎样，而是“为什么我们要听欧洲人的指挥”。而在意大利，融入欧洲是 1996 年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动力。现在意大利政府仍然在力争出台一个紧缩法案，希望在未来两年内缩减赤字到 GDP 的 2.5 个百分点，他们仍然在力图遵守“欧洲义务”，他们仍然在说“我们要做好的欧洲公民，要为欧洲着想”，没有多少人对义务的合理性表示质疑，所以“欧洲”在意大利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动力，但在西班牙和希腊就不是这样。

**廖若：**这么说来意大利的改革动力还是比较强的？

**Maurizio Ferrera：**这当然不是说意大利的改革就比较容易，欧盟不会轻易接受一个容易达到的缩减计划。意大利政府很可能也需要继续缩减养老支出，也要削减公务员工资，而受损的利益团体可能也会发起罢工，但他们不会去质疑调整的整体必要性，只是去问措施本身是否合理。他们要的是公正，但不会去质疑说财政紧缩政策是不是真的那么必要，他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这么做，来做一个“好欧洲人”。

**廖若：**也许在这方面跟法国的对比更有意思？法国的体系也是高度碎片化，但工会对改革的反抗非常激烈，所以改革难度非常大。意大利跟法国相比，政府跟工会的关系如何？

**Maurizio Ferrera：**意大利在历史上曾经拥有一个很难达成合意的政治体系，以前的确是这样。我们有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直到 80 年代早期意大利共产党还主张要消灭资本主义，还要退出市场经济模式，到 70 年代中期还要求意大利退出北约。所以要当时要讲改革是非常难的，要实现我们对欧盟、对北约、对西方的国际义务，在当时共产党占到票数的 32% 到 33% 的份额的情况下，甚至在议会内都无法组成一个跨党派联盟。因为共产党有很强的挟持力量（blackmail power），他们可以上街，可以把工人、学生号召到街上，在 70 年代我们还有过一个左翼恐怖主义事件，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被意大利左翼极端组织红色旅（Red Brigades）绑架并杀害。

那时的意大利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对抗很激烈的国家，有很激进的左翼工会。而这种政治体系的极端化和不稳定性也是意大利社会福利体系发展如此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政府需要“收买”一些“内部人”团体，也就是公务员、“蓝领贵族”等等，使他们对这个体系保持忠诚度。长久以来，意大利的这种情况才开始非常缓慢地得以改善。

从我的政治观点看来，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后，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了较大的调整妥协，甚至还改了几次名，成为了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完全接受了北约、接受了西方国家联盟，也接受了市场经济和欧盟。他们没有再去挑战这种欧洲一体化的观念，事实上他们将“欧洲工程”作为他们总体形象的一个基石。

我记得 1979 年意大利加入欧共体的时候，共产党还说我们永远不会接受这种决定——绑起意大利的手脚交给法、德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当时的阶级对抗观念还是非常强的。而到了 1996 年意大利正亟需加速改革来满足加入欧元区要求的关口，当时执政的普罗迪政府就得到了左翼政党“重建共产党”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 (PRC)的支持，事实上也正是他们提出了“欧洲税”，才最终使意大利得以加入欧元区。即使是工会的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候也缓和了很多，他们也是支持 1995 年的养老改革的，支持在几年内实施 wage moderation 政策。所以意大利政治体系得以演变，我也相信意大利的工会将会更负责任，超过希腊工会那是肯定的，很可能比起法国的工会也更负责。

**廖若：**西班牙的工会呢？

**Maurizio Ferrera:** 西班牙的工会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工人委员会”(CCOO, Comisiones Obreras)仍然是一个很激进的工会，但其他几个工会都还是相当负责任的，他们也跟现在的工人社会党政府达成了关于养老保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要改革措施。我想在进行社会改革的政治能力方面，西班牙更接近意大利，而希腊的情况就困难得多。葡萄牙的社会模式比较不一样，他们的就业率相当高，他们比较接近于一个欧洲大陆体系与英国式自由化模式的混合体。他们也有很发达的低端社会服务部门，像英国那样。

**廖若：**如果说意大利能够克服那些历史上的困难开启改革的新阶段，那么你能想象今天的希腊也能做到吗？

**Maurizio Ferrera:** 可能吧，当然这需要时间。不过 90 年代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历史时刻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而希腊现在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了，欧盟正处于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中。当时我们要加入欧元区的时候，汇率的改变方向对意大利是相对有利的。所以我们进入欧元区时，从旧里拉换算到欧元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利的。我们当时没受很多苦，加入欧元区时对我们的经济竞争力是一种提高。但现在，欧元对希腊经济投上一个很大的阴影，特别是对其经济竞争力来说。你知道希腊的竞争力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是偏低的，所以我不敢肯定希腊是否能够开启这样一个改革，如同意大利当时做的那样……

**廖若：**是啊，目前看来希腊的工会还是不太合作……

**Maurizio Ferrera:** 一点也不。

**廖若：**意大利一个特点还在于南北的地区差异。这在福利体系中也有所体现吗？

**Maurizio Ferrera:** 意大利的福利体系是一个全国性标准，所以没有什么南北之间的差异。不过当然南北之间的经济差异是很大的，黑社会组织性犯罪在南方也更明显，这对南方经济发展投下了很重的阴影。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意大利是不是能够缩小南北差距，是不是能在南方继续挖掘增长和发展的机会？但不是整个南方都这样，南方的一些地方也很有活力，即使在西西里岛上也有一些地方显示出了很大的活力，所以现在情况应该是有所好转的。但从宏观结构来说，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机制性的政策实践。我们现在正在走向“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tion)，政府在北方希望通过这种财政模式来解决南方的问题。但我并不确定这一定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细节，而细节究竟如何现在还不知道。

**廖若：**欧洲的福利体系在一些境外媒体上容易受到批评，就是产生了所谓的不进行工作的激励，福利政策让

人们变懒了。相比之下，美国的模式可能更注重工作激励，有人说欧洲是社会福利制，而美国是工作福利制（workfare），也就是说美国是通过工作来得到福利。今天欧洲面临经济危机，是否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哪种模式更好？

**Maurizio Ferrera:** 欧洲的社会模式在不同的地方也是有不同的模式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很成功地调和了活跃市场经济和高社会福利体制，保持了经济高增长率，同时贫富差距也不大，特别是贫困率很低。所以北欧国家已经显示了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

当然也很难把北欧的模式放之四海皆准，特别是在欧洲其他地区。因为北欧模式是在 1950 年代——60 年代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环境很不一样，比较像是把国家经济和国家社会绑在一起，使资本能够为国家服务。但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可能这么做了，因为你已经有了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所以北欧模式当时的那些管制手段，在今天的环境下甚至已经不合法了。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方法，来综合再分配和增长，结合效率和公平，团结和灵活。

我想你看欧洲大陆的旧模式，在 90 年代的时候、甚至是 80 年代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些区域是显示出了效率性的。所谓的激励并不是以一味推动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家庭为理念的，认为一家有一个挣面包的就足够了，妇女应该在家照顾。当然南欧地区，或者更泛泛说欧洲大陆的旧体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不鼓励人们有企业家精神。但所有国家都很清楚这点，也都各自设置了不同的政策议程来提高激励。比如在失业福利方面，很清楚的一点是只领取失业救济的生活肯定不会比工作生活来得更舒适，这就是德国改革的一个重点。而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也开始讨论这一点，虽然还没有太多改革，但这个想法是一直有的。

新的哲学是重新设计福利国家，来创造一个更活跃、对妇女、儿童更友好、更有社会效率的模式。有许多地方是需要改革，为什么不呢，美国模式中的一些部分是应该更多地予以支持的，美国社会比欧洲社会更有活力，更灵活，我不会反对吸取美国模式中的一些观点。但另一方面你也必须看到，美国也在一些方面学习欧洲，比如说在医保体系。

**廖若:** 对中国这样一个刚刚开始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一个整合性的社会福利体系，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Maurizio Ferrera:** 我想最好的方式，对于这样一个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要创造一个全面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层面。如设置一个比较合理的最低收入来根除绝对贫困。在基本保障层面是不应该留给地方政府或是社会服务部门来自主裁定的，而应该是以国家层面的标准参数来决定。然后就是在基本社会保险安全网方面，要将政府的转移支付补助与资助对象的某些特定条件相挂钩，这也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正在做的所谓“有条件的现金转移”（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我想很重要的是在中国一些不发达地区，必须保障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他们能够看医生，要遵守一定的营养指导准则。实行这些基本保障是出于几个理由，一是根除绝对贫困，中国肯定还有一些地方是存在饥荒现象的，然后是保证穷人的孩子通过教育获得基本的“生存能力”，还有医疗保健等，总之要保证他们将来能够拥有自主生活的能力。

最好是建立起一种“社会投资”方式，这在欧洲国家也是比较晚才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单纯的用福利体制来补偿贫困者的“需要”，而是用福利体制来推动人力资本的提高，鼓励更高的营养水平，更高的身体素质和知识能力水平。



采取全面保障的措施，比如教育就应该覆盖面越大越好，医疗保健也应该是覆盖面越大越好，还有社会保险安全网的全面覆盖，并在货币持有方面与这些条件相挂钩。然后组织起其他形式的福利项目，比如为工人们准备未来的养老收入，在基本安全网之上的。

然后再进入第二层面，满足更高的教育水平需要，良好的失业保障等，要保持接近于“保险缴纳分摊”的方式。欧洲在五六十一年一度将养老收入和养老金缴纳之间的联系取消了，这最后成为了一个问题。因为再分配的后果失控，政治开始不顾实际地分配资源来争取选票。所以我想你们应该开始着手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全面的社会保障提供，时刻考虑“社会性投资”，投资于下一代、年轻人，然后是再分配的项目，不要从保险的原则上偏离太多。

**廖若：**现在欧洲国家普遍面临财政吃紧和福利保障之间的两难取舍矛盾。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Maurizio Ferrera：**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人口老龄化，这对养老和医疗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重新定义“老龄”。现在定义 60 岁以上即为老龄，这是我们无法支付得起的庞大人群。现在 60 岁到 70 岁之间的老人普遍还是比较健康的，其中有很多人还能继续工作，他们还能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而现在的期望寿命基本上能达到 80 岁以上，所以我们要向上移。因为当我们在 20 世纪初定义“老龄”为 60 岁以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是活不到 60 岁的，当时的期望寿命只有 62 到 65 岁，所以当 you 到达 60 岁的时候，退休，你可能只有几年的时间在拿养老金。但现在如果你 60 岁退休拿养老金，你可能要拿 25 年或甚至 30 年。

我们的环境已经变了，但老龄的定义还没有变。我们必须把这个老龄的定义跟着其他的情况一起上移。我自己已经 55 岁了，但我想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当然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不像工厂工人做的工作比较重劳动力。但也可以相对地缓和化，退休年龄，我觉得没有道理一些公务员需要早退休，或是一些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

**廖若：**这里的人们似乎很不愿意推迟退休？和中国情况相反。

**Maurizio Ferrera：**是不情愿。不过十年前人们是 55 岁退休，现在是 60 岁。养老体系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情况，也就是一个老龄化的时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从国家领到钱，有时这部分钱是足够你过一种非常富裕的生活的，而且这段时间你是有很多闲暇的。看看现在的一些广告，有些的目标就是老年人，有些广告给你这样的主意，这些老年人，养老金领取者，他们是健康的一对夫妇，能够支付得起长假，可能是游船。甚至银行也在做广告，试着吸引养老金领取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现金流。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做出努力，来挑战这种既定的想法——也就是人们可以在生命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享受这种有收入的假期，因为这段时间有时候甚至长于你毕业和退休之间的时间。

**廖若：**日本的退休年龄平均达到近 70 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Maurizio Ferrera：**我不太熟悉日本的情况，他们的养老金支出水平在国际上来看是非常低的。也许他们从没有过像欧洲这样低的退休年龄。随着我们的期望寿命增长，我们的退休年龄反而在降低，曾经还降到过 55 岁，现在又回到 60 岁了。但是退休年龄和期望寿命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养老金也不得不依赖更多的补贴，所以这是我们面对人口年龄构成改变所要做出的主要应对。

**廖若：**以前提出降低退休年龄，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如果让老龄人口占据工作职位，年轻人将无法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

**Maurizio Ferrera：**但我们都知道这是错的。因为老年人退休后，他们的职位很多就是取消了，因为很多人原来所在的经济部门是在减小的，特别是在意大利那些低教育程度的工作，当那些原来的工人退休，这部分工作就已经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去了，不会停留在意大利。而国家产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真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



济是如何组织及如何增长的。想想当家庭妇女不再留在家里而是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原来那些由妇女承担的家庭产品或服务就要“外部化”，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部门，也就是那些个人看护服务、家政服务、酒店、休闲等等。

**廖若：**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年轻人进入工作。欧洲有一个问题还在于有很多年轻人不足以达到劳动市场的要求。

**Maurizio Ferrera：**是，这是一个问题。必须投资于教育和采取适当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匹配工作供求。特别是在年轻人刚开始要工作的那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他们往往面临着比较不如意的工作和劳动合同。这个问题在南欧尤其显著，一般年轻人都还是在期盼等待那种全时制的、无终止期限的合同，特别是公共部门的职位。但他们必须明白“后工业化”国家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要明白在工作生涯的开始几年，你是有必要牺牲一部分生活水平的，这在欧洲尤其重要。年轻人总是期望，他们在完成学业后，只有在找到一个能够支付得起跟父母的住房水平相当的住房支出的工作，那他们才会搬出父母家去。他们总是期望能够自己住，或者跟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住。但他们不能接受跟人合租，如在毕业后一两年内离开父母跟同事或同学合租。

**廖若：**所以这里年轻人跟人合租的情况很少？

**Maurizio Ferrera：**呵，一个原因也是现在的父母观念上更自由更开放了。年轻人还可以在父母家里跟自己的伴侣很亲热。过去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失去了一个很强烈的动力搬出去了。 ■

## ■ 税收债务关系说与纳税人权利

黄凯平

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这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说法，甚至到今天，对这种说法的是非对错也没有取得全部共识。

从直观上来看，税收法律关系主要是税收的征纳关系，税务机关通过行政强制力收取纳税人的税款，无论是税额的确定、缴纳、稽核、申请退税、税收减免都与税务机构的行政强制力有莫大的关系。基于这些现象，有人认为税收法律的成立依赖于国家的行政权力，国家对纳税人有强制权与优越性，纳税人主要是服从，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梅耶，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托财产权而产生，并在作为权力优位主体的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人民之间的关系”，<sup>1</sup>这就意味着在税收过程中，国家与纳税人并



黄凯平 Huang Kaiping

<sup>1</sup> 北野宏久. 税法学原论（第四版）. 陈刚, 杨建广等译.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年. 4


不是对等的法律地位，国家的征税权是税收法律关系的起点与核心，税收发生要件实现后，并一定发生税收法律关系，只有在征税机构核定税收的行政行为后，税收法律关系才会产生。这一种说法，被称作“权力关系说”。

然后，后来德国法学家阿尔伯特·亨泽尔在 1926 年提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并不是以行政权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只要满足课税条件，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就产生了税收债务关系。而早在 1919 年德国颁布的《帝国税收通则》就提出这一个全新的视角——税收债务，这为重新看待国家、征税机构与纳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平台。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来看，税收法律关系是“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请求作为税收债务人的纳税人为特定给付的法律关系”，<sup>2</sup> 税收并不是因为国家强制力而存在的，而是人民与国家订立了契约，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税收要件规定下来，国家与纳税人是权利平等的双方，其权利与义务都由法律规定，为作行政机构的征税机构没有对税收的创设权。税额的多少、缴纳的程序等纳税人履行义务的一切过程都不是因为征税机构或行政权力的存在为前提，而是在人民与国家事先订立的契约——税收实体法中已规定好了，征税机构的征税程序只是实现税收债权，行政权力只在确认税收债务时存在其应有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是完全的债权债务关系。

虽然“权力关系说”与“债权债务说”都深刻地影响了各国税收立法的发展，对保证国家税收收入来说，这两种学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但对于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这一角度来说，“债权债务说”就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以“债权债务说”来看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征税机构并无特别的权力，他只是实现自己债权，是权利的实现者，而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其对税收债务人并无命令、支配之权，征税机构则只能在契约约定下代表国家向纳税人请求一定的财产让与，其强制执行是也是依据纳税人事先与国家订立的契约，征税机构与纳税人在这个契约面前是平等的，征税机构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并没有优越性，契约双方共同受契约的约束和保护，双方都只能按照事先的约定行事，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

税收之债虽是公法之债，有其特殊之处，但与私法之债也有很多共同的性质，民法制度中关于债权行使、给付受领、债权变更、债权保全制度在税收法律关系均可有所适用。税收之债产生于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即税收实体法。税是纳税人向国家购买公共服务的钱，是人民就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在购买之前，人民与国家之间订立了契约，即通过代议士商议确定国家职能的范围，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然后商定相应的税种、税率、用途等。通过这个契约，人民必须承担相应的费用，这就是税收之债的由来。

从税收债权债务说来看，税起源于人民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契约，税法就是人民与国家订立的契约，政府部门只是执行契约而已。这也必然承认纳税人在税收领域的民主立法权和民主监督权，也必然要求保护纳税人在税收征纳过程的知情权、隐私得到保护、获得礼貌与周到的服务、申请复查与诉讼等权利。 

<sup>2</sup> 刘剑文. 财税法专题研究（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79

## 转型译丛



张大军 Zhang Dajun

**编者按：**张大军先生主持传知行研究所的中国转型研究、转型译丛，目前已翻译了《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等介绍转型理论的专著。本期“转型译丛”我们继续连载张大军先生的最新译著《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如需阅读已刊登过的部分请去[传知行主网页](#)下载往期《通讯》。

## ■ 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之三）

——人民力量的爆发：南非和菲律宾

著：Kurt Schock

译：张大军

南非的种族平等运动是一场漫长的抗争，持续了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其最后冲刺的动因是 1976 年 6 月索维托的一次事故，当时，举行示威以抗议将南非荷兰语强制设为教学用语的学生受到致命武力的对待。国家武力谋杀学生的做法激起全国范围的反抗，这一反抗持续到 1977 年，尽管没有成功地颠覆种族隔离体制，却促发了草根活动的风潮—正是这些草根活动让城镇中的非武装反抗在 1980 年代延续下来。到 1980 年代末时，对政治组织的禁令被废除了；政治犯们（包括自 1962 年以来一直被监禁的纳尔逊·曼德拉）被释放；通过谈判实现向统一、非种族化的民主国家转型的路径已经开辟。非洲人国民大会于 1994 年 4 月赢得南非首次全国性普选，曼德拉就任总统职位。

与南非长达几十年的反抗种族压迫的抗争不同的是，在菲律宾，从小贝尼格诺·阿基诺被暗杀到马科斯独裁政权垮台只用了三十个月的时间。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在流亡美国三年后返回马尼拉。他是与费迪南德·马科斯争夺菲律宾总统宝座的长期对手。在他于马尼拉国际机场从飞机旋梯踏上停机坪的那一刹那，阿基诺就被一颗射向其头部的子弹夺去了性命。虽然对马科斯的反抗在 1980 年代初期就一直在升温，阿基诺的被暗杀却引发了不合作和公民不服从运动，其高潮是 1986 年 2 月 22—25 日的“人民力量运动”、马科斯



1994 年 5 月 9 日，南非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后当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图为曼德拉（右）与南非第一副总统姆贝基在国民议会会议上宣誓。图片来源于网络。

的退位、以及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当时，贝尼格诺·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就任总统职位。

当然，暴力伴随着上述的非武装反抗。在 1980 年代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派别—国家之矛，该组织自 1960 年代初起就一直在活动—正加强他们的暴力破坏运动和对军事目标的攻击。在黑人城镇，暴力被用来对付那些据称与种族隔离政权合作的人，以石块—偶尔是枪支—武装起来的年轻人与安全部队展开战斗，而且有时人们会被强制参与到抵制运动中来。在菲律宾，从 1969 年开始进行毛主义式反叛的新人民军一直在提升其效能，而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能力一直在下降。不过，在南非和菲律宾，暴力抗争本身都无法推翻政府，而正是非暴力行动方法而非暴力成为对政府的最为严重的挑战，并以民主转型而告终。

我们如何才能解释这两场基本上算是非武装反抗的成就？这两场抗争中都存在着可以对比的让政治关系发生转变和推动政权更替的作用机制么？对运动战略以及国家和第三方反应的考察将有助于阐明这些问题的答案。

## ➤ 南非

南非联邦于 1910 年据以成立的宪法将黑人排除出政治生活。<sup>1</sup>作为回应，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于 1912 年。从 1910 年代到 1940 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主要通过建制性的管道挑战当局，比如请愿要求政治权利并为此游说；不过，这些方法在推动政治变革方面是不成功的。当国家党于 1948 年上台并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时，政治环境就变得更加受限制了。

## ➤ 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抵抗

黑人抗议的第二个时段出现于 1949 年，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纳了一种集体行动的计划。拒绝服从运动于 1952 年被发动起来，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在运动中，人们不遵守公共场所的隔离规则。运动成功地动员起相当比例的非白人民众，不过后来，在几千人于 1952 年 6 月到 11 月间被捕以及政府通过限制性法律（比如禁止政治性会议和示威的压制共产主义法案）之后，运动衰落了。在 1950 年代期间，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开始批评运动的所谓温和策略以及与白人的合作。作为回应，泛非洲人大会于 1959 年组建。泛非洲人大会在 1960 年组织群众示威，抗议通过限制黑人迁移自由的法律。在约翰内斯堡以南三十五英里的夏普维尔，警察向人数达 10,000 人的人群随意开枪，在人群逃离警察时，警察打死了至少 69 人，打伤了 178 人。<sup>2</sup>随后，国家宣布



南非黑人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图片来源于南方都市报。

进入紧急状态，几千人被捕，大大削弱了泛非洲人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在确定非暴力手段在对付种族隔离制度方面无效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他们的共产党盟友组建了国家之矛，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暴力破坏和武装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于 1960 年被禁，安全警察抓获了国家之矛的领导人，包括分别于 1962 和 1963

<sup>1</sup>对南非政治排斥状态的抵抗历史的简要回顾来自马福森（Mufson）（1992 年）。

<sup>2</sup>官方的死亡数字是六十九人，不过，世界的数字不为人知，很可能要高得多。参见弗兰克尔（Frankel）（2001 年）。



年被抓获的纳尔逊·曼德拉和沃尔特·斯苏路（Walter Sisulu）—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到1960年代中期时，政府已经镇压了所有公开的活动，并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洲人大会的大部分地下活动连根拔起。

黑人抵抗的第三个时段出现于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初期，其先锋是黑人意识运动。南非学生组织（成立于1968年，斯蒂夫·毕克（Steve Biko）任总裁）和黑人大会（成立于1972年）是该运动的主要组织平台。根据毕克的想法，为了促成政治变革，有必要将黑人们从他们自己的卑躬屈膝和低人一等的态度中解放出来（毕克，1978年）。和泛非洲人大会一样，黑人意识运动拒绝白人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任何作用；不过，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挑战国家的战略，因为它更关注的是培育黑人的文化自豪感，心理上的自主性，以及反霸权主义的体系，也关心组织识字运动和文化活动（普莱斯（Price），1991年，49–50页）。

## ➤ 索维托之后的抵抗

与通常属于暴力性质的自发的索维托叛乱形成对比的是，1980年代的抗争在采取非暴力行动战略方面变得日益具有组织性和复杂化。反种族隔离抗争之战略和组织的转变是相对于政治环境之机会和约束的有针对性的回应。在通过富有创意的非暴力干预利用组织化的机会的同时，政治环境的约束因着抗议与说服的方法、破坏性非暴力干预以及尤其是不合作方法的被采用而有所改变。结果是，国家权力被削弱、精英间分裂的扩大、第三方支持的拓展以及最终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在1980年代末时）。

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讨论1980年代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三个主要的社会运动组织：（1）联合民主阵线及其附属机构，（2）南非工会大会，（3）非洲人国民大会。<sup>3</sup>其中的焦点是，这些组织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征和行动：从理论上讲，应该与非民主环境下的抗争通过非暴力行动推动政治变革的能力有关的特征与行动。

## ➤ 联合民主阵线及其附属机构

1980年代初期的特点是地方团体的扩大，而这些团体产生的目的是捍卫和推动城市黑人民众的利益并抗议住房、租金、交通、教育以及其他城市服务方面的政府政策。联合民主阵线成立于1983年8月20日，其用意是反对政府的旨在将种族隔离统治合法性的新宪法提案，并协调和整合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地方性斗争。在其成立时附属于联合民主阵线的565个组织包括工会、青年组织、学生团体、妇女团体、宗教团体、专业组织以及公民社团。在其高峰时，联合民主阵线宣称有约700个附属机构服从于它，而这些机构覆盖了全国各地每一个重要的人口集中地区或者领域（洛基（Lodge），1992年；普莱斯，1991年；希金斯，2000年）。

联合民主阵线是一个伞形组织，将各地不同的草根运动联结起来，并提供必要的协调和指导，以推动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抗争。联合民主阵线的优势在于它的分散化的草根组织机构以及自主团体网络，这形成了一种沟通和动员的渠道并提供面临镇压时保持活力的手段。附属于联合民主阵线的组织都有自觉的民主诉求，要求其领袖承担责任并得到其成员的授权。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宣称，对草根附属机构的忠诚高于对集中的一元化组织的顺从，而且许多决策权力掌握在基层手中（洛基，1992年；莫罗比（Morobe），1987年；普莱斯，1991年；希金斯，2000年）。

附属于联合民主阵线的机构采用抗议与说服的方法—比如示威、游行、集会和政治葬礼，以推动解决各地的民怨问题、反对修改宪法的提议、让政治犯获释，并纪念那些被国家杀害的人。联合民主阵线所协调的第一场重大不合作运动是反对选举运动，也即对南非1984年8月宪政改革倡议的抵制。尽管白人选民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

<sup>3</sup>当然，三个社会运动组织在资源和人员上有交叉的情况；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视自己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或支持者，而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普遍认可为民族党的最终继承者。

了该计划，抵制运动却成功地对国家体制改革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为混合种族的合格选民的投票率低于五分之一，而合格的印度裔选民的投票率只有七分之一（洛基，1992 年；希金斯，2000 年）。

在全国性的选举抵制之后，联合民主阵线及其附属机构将不合作的方法应用于地方社区的抗争之中，其方式包括拒付租金和抵制服务、学校和商业。由于拒付租金和抵制服务，国家权力在很多城镇崩溃了（洛基，1992 年；希金斯，2000 年）。事实证明，不合作运动对当局是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至于南非在 1985 年 7 月 21 日宣布部分地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南非自 1961 年以来第一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过，镇压只是激起了民变，包括好战的年轻人突然以暴力行动抗拒军事占领城镇。除了向警察和军事人员扔掷砖块、石头和燃烧瓶之外，好战的年轻人还偶尔与安全人员展开枪战。针对据认为是种族隔离制度合作者的黑人城镇居民的暴力也升级了。黑人城镇市政会成员以及黑人警察的家遭到轰炸。通过将燃烧着的轮胎套在他们的头上—这种行动被称为“戴项链”，纠察队暴徒将所谓的合作者烧死。在 1980 年代中期，以此种方式丧生的有几百人。

在吸取 1976–1977 年索维托叛乱的教训的基础上—在那场叛乱中，学生和失业的年轻人的无组织和常常是暴力性质的集体行动受到国家残酷的镇压，联合民主阵线有意识地制订出一套“人民力量”战略。在承认索维托叛乱在激发起大众政治活动中的作用的同时，联合民主阵线坚称，进一步的自发式暴力骚乱会轻易地被国家镇压所粉碎。人民力量战略的目的是建立地方性的、难以被国家压制的分散的结构，阻止好战的年轻人直接的暴力行动并将其导入到更有建设性的抵抗形式之中，以及采取富有创意的非暴力干预方法，以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结构。

在处理黑人合作者和告密者的问题上，街道和社区委员会鼓励采用非暴力的方法，比如抵制黑人合作者的企业以及在社交上疏离城镇市政会的黑人成员和黑人警察。各委员会试图在人民力量的非暴力行动和责任机制与“超级好战的”年轻人的不受约束的暴力行动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并推动高度组织化的、不会带来不必要的暴力的抗争形式。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提倡非暴力原则的做法不是基于对暴力行动的道义上的谴责。事实上，联合民主阵线是准许用于自卫的暴力的，并且从未谴责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行动。不过，联合民主阵线意识到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战略上的好处，并理解，相对于暴力而言，国家权力更有可能通过非暴力行动加以削弱。因此，联合民主阵线采取了一种更为策略性的办法，包括与那些采取暴力行动的人士开展建设性的交往—这就要教育那些暴力行动者有关非暴力行动的实际好处并提供以非暴力方式抵御国家的选项。比如，在不提倡“戴项链”的同时，它鼓励“去掉面具”—安全警察和告密者的名字和照片借此被公布出来，目的是让他们的活动失去效用并且在社交上孤立他们（司马茨（Smuts）和韦斯特科特（Westcott），1991 年）。根据一位学者的说法，“街道和社区委员会帮助活动人士控制住好战的年轻人，其方式是，将青年小组分成更有纪律约束的、能够依附于街道或社区委员会的更小单位。事实证明，他们在反制镇压方面是相当有效的。地方性的紧密组织有助于减轻因领导人被羁押、失踪或死亡而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斯威灵（Swilling），1988 年，104 页）。

联合民主阵线的附属机构采取富有创造性的非暴力干预方法是一种故意而为的行动，目的是以“人民力量”取代国家权力，并在这样做时形成一种有利于权力平衡发生转移和南非实现政治转型的双重权力格局。地方机构承担行政、司法、福利和文化职能。公民社团作为地方治理的机构发挥作用，而这些机构超越于由国家所控制的社区委员会，在地方上形成一种双重权力格局（洛基，1992 年；马克思，1992 年）。于 1986 年 3 月发起成立的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组织起“人民教育”。因采取“人民课程”而被国家解聘的教师们得到社区所募集的资金的支持。替代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也出现了，因为附属于联合民主阵线的医疗专业人士开始在国家运营的诊所之外治疗病人，并培训社区里的急救员，以救治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普莱斯，1991 年，211–15 页）。

在分散化的草根结构的帮助下，对不合作方法的推行无视于国家紧急状态继续进行。到 1986 年时，拒付租金扩散到全国的五十四个城市，将大约 500,000 个家庭卷入，并且每个月至少耗费国家 4 千万兰特的资金（译注：

兰特是南非的货币单位,大约7兰特相当于1美元)。到1987年时,全国城镇租金赤字达到1.78亿兰特(希金斯,2000年,207页)。拒付租金导致国家所控制的许多社区委员会崩溃,因为它们收入依赖于租金。

1986年,许多因素汇合到了一起,导致国家对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镇压大大升级。首先,国家得出结论认为,它的政治改革政策和妥协尝试失败了。其次,美国正要废除经济制裁措施,由此终结因国际制裁加大的威胁而形成的对镇压的约束。第三,精英中的“保安官僚”部门支持针对意想中的种族隔离国家体制之敌人的“全面战争”战略。他们取得优势地位,并且在开始时不受其他精英团体的制约。当政府于1986年6月12日第二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镇压变得更有系统性。从1985年7月21日到1986年3月7日的第一次紧急状态覆盖了普勒陀利亚-维特沃特斯兰特-威利尼经以及东开普地区的三十六个行政区,其目的是阻止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和抗议与说服的方法。第二次紧急状态是全国性的,其目的也是消除不合作方法。鼓励、参与或者宣传抵制或缺工被宣布为非法行动。富有创意的非暴力干预方法-“人民力量机构”-也被当作镇压的目标,因为参与替代性机构被宣布为叛国行为(普莱斯,1991年)。

尽管第二次紧急状态严重削弱了联合民主阵线的全国性组织结构,其分散化的地方组织网络依然富有活力。紧急状态导致反对政府的群众性抗议示威的减少,不过,它无法消灭以社区为依托的网络的组织基础。由社区之外的人所不熟悉的人士担任街道委员会的领导会让领导人显得低调,对拘押和限制有很高的抵抗力,并提供有利于抗争的沟通渠道。拒付租金行动在继续,索维托的官员被迫与联合民主阵线就终结拒付行动展开谈判,显示出即便在紧急状态下,联合民主阵线仍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削弱国家权力(洛基,1992年;普莱斯,1991年;希金斯,2000年)。

另外,随着开始于东开普地区的抵制消费活动散播到全国各地,联合民主阵线继续扩大非暴力抗争。抵制活动最为成功的时候就是它们被用来支持地方社区的倡议-比如降低租金、改善住房和城市服务、废除店铺的隔离制度、以及撤走军事人员-之时。针对白人企业的消费抵制活动迫使他们在店铺中终止种族隔离做法,并有助于在中产阶级的白人店主与国家之间制造分裂。地方商会被迫在城镇市政会上游说政府终结隔离制度,将警察撤出城镇,释放政治犯,并为黑人建造新的学校(斯威灵,1988年)。联合民主阵线与其附属机构还组织活动,让人们关注政治犯的不幸遭遇。一项活动让人们关注正被羁押的少年犯。另一项1989年的活动组织被关押的联合民主阵线活动人士进行有协调、有纪律约束的绝食抗争。六百多名犯人参与了此项活动,并要求立即把他们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在抗争继续进行时,一百多位犯人因为身体情况的恶化而不得不被送入医院。这让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治压迫情况的关注增加,而且大部分政治犯最后被释放(普莱斯,1991年,268页;希金斯,2000年,240-41页)。

持续的非暴力运动成功地削弱了国家的压制能力并有利于进一步的动员。尽管镇压的加剧所带来的后果是使得抗议与说服的方法受到限制,不合作和非暴力干预的方法却在面临镇压时坚持下来。正如安东尼·马克思所报道的那样,面临镇压时的持续的抵抗运动具有这样的效果:“削弱国家以压制方式进行统治的能力和意愿...与此同时,南非黑人拒绝他们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能力和意愿增长得更快了”(马克思,1992年,162页)。也就是说,“政治柔道”的态势被激活了。

## ➤ 南非工会大会

在南非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变得愈益依赖于一个规模更大、更为城市化的黑人无产阶层,而正是这种依附性让黑人拥有了对国家的潜在影响力。不过,只有通过有效地将劳工人员组织起来以及有纪律约束的集体行动,这种力量的战略价值才可能发挥出来。当从1973年的德班罢工之中诞生出南非独立工会运动时,这种潜力才开始被发掘出来。为了将劳工冲突建制化,控制劳工关系,阻止工人们的政治化并笼络劳工阶层,也是为了应对发展

中的劳工运动，国家于 1979 年在官方的产业关系体系之内正式承认了非洲的工会组织。然而，劳工改革没能带来意想中的效果，因为获得合法性的工会没有采取工会经济主义的立场，而且还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斗争（阿德勒和韦伯斯特，1995 年；巴斯金（Baskin），1991 年；梅里（Maree），1985 年；马克思，1992 年；普莱斯，1991 年；希德曼（Seidman），1994 年）。

南非工会联合会于 1979 年组建，将十二个投身于民主组织产业工人、坚持非种族主义原则和致力于劳工阶层抗争的产业工会中的两万多名工人团结在一起。在 1980 年代，特别是在联合民主阵线于 1983 年成立之后，工会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社区事务和工厂事务。为了应对 1985 年 7 月的国家紧急状态以及加剧了的对工会活动人士之政治活动的镇压，对推动政治和经济议题的全国性联合会的需要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借着南非工会大会—一个工会的联盟组织—于 1985 年 12 月的成立，这一需要得到了满足。南非工会大会的成员数从 1985 年的 46 万名工人增加到 1980 年代末的 115 万名工人（巴斯金，1991 年；菲尼摩尔（Finnemore）和凡·德·莫维（Van der Merwe），1992 年）。

南非工会运动将工会形式上的组织特征与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和较松散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被称为“社会运动工会主义”（阿德勒等人，1992 年；阿德勒和韦伯斯特，1995 年；赫希松（Hirschsohn），1998 年；莱姆波特（Lambert）和韦伯斯特，1988 年；希德曼，1994 年；和韦伯斯特，1988 年）。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将针对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人自主性的工厂斗争与针对人权、正义和民主的更为广泛的社区性和全国性政治抗争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与地方性的社会运动组织和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一起合作，同时保持自主性。其次，工会组织是分散化和民主的。第三，“激进改革”战略得到落实，根据这一战略，制度化的集体讨价还价战略与非暴力行动的方法结合在了一起。

上述所有特点都适用于南非的工会运动。首先，运动聚焦于工厂问题没有导致它回避更为普遍的政治问题，因为大部分工会采取的立场是，它们也应该介入社区性和全国性的抗争。南非工会大会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政治活动，并凭借与其他劳工、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全国性联盟，巩固它在工厂方面的优势以及与草根社区组织的联系。到 1980 年代中期时，南非工会大会已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结成战略联盟，不过仍然独立于它们（阿德勒和韦伯斯特，1995 年；巴斯金，1991 年；马克思，1992 年；普莱斯，1991 年）。

其次，南非工会大会采取分散化的组织方式，以在面临镇压时保持活力，并采取民主的组织方式，以促进对工人的动员和工人人们的献身精神，并阻止专业领袖的发展—他们可能会被吸纳进国家的劳工关系部门之中。工会谈判代表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需要承担起责任并有被罢免的可能。另外，当选的工人代表必须是全职的工人（阿德勒和韦伯斯特，1995 年；巴斯金，1991 年；马克思，1992 年；普莱斯，1991 年）。

第三，在参与制度化的集体讨价还价过程的同时，工会没有规避非建制性的非暴力行动方法。除工人罢工之外，工会还组织和实施其他的不合作办法，比如缺勤。在公开集会和示威被禁止后，缺勤成为一种抗争的方法。缺勤的工人或学生（以及民众中支持他们的人）会待在家中，以支持各种不同的经济或政治诉求（阿德勒等人，1992 年）。1984 年 11 月特兰斯瓦尔的缺勤有八十万名工人和四十万名学生参加，而 1988 年 6 月纪念索维托起义的缺勤成就了该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大罢工。三天的缺勤活动让 70% 的地方受到影响，并让南非经济承受大约五亿兰特的损失。1988 年 9 月纪念夏普维尔屠杀的缺勤活动让东开普地区大多数规模最大的产业出现将近 100% 的缺勤率（普莱斯，1991 年，196 页，267 页）。在 1986 年到 1990 年之间，南非因不合作而损失的工作日多于之前七十五年的总额（伊尼斯（Innes），1992 年）。富有创意的非暴力干预方法也被采纳。比如，南非工会大会为工人们开发出替代性的教育计划，并建立全国失业工人协调委员会以提供由国家所供给的那种集体物品，比如作为未来员工之来源地的合作社提供培训和支持（马克思，1992 年，212 页）。



当联合民主阵线于 1988 年被禁时,南非工会大会承担起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责任,发起成立大众民主运动,并为重新动员公民、妇女、学生和青年组织提供支持(赫希松,1998 年)。紧急状态时期镇压的加剧没能干扰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工作基本上是在工厂和矿山之内进行的。根据格伦·阿德勒和艾迪·韦伯斯特的看法,“一系列的工会活动、抗议、未经批准的行业行动以及工厂车间的破坏活动说明镇压在终止动员方面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另外,集体行动对雇主造成了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支持压制性的立法”(阿德勒和韦伯斯特,1995 年,82 页)。总而言之,劳工运动在面临镇压时依然保持活力,并造成了资本家和国家之间的精英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南非的权力平衡发生变化。

## ► 非洲人国民大会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现为南非执政党,简称非国大,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惟一跨种族的政党。1912 年 1 月 8 日,非国大在布隆方丹成立,最初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 年改称现名,现有约 100 万党员,另有大量支持者。资料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简单地说,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能力来为该国内部的政治活动提供详尽的指导和协调,而正是国内的这些活动—而非国家之矛盾悄悄的活动—有推动政治变革的可能...非洲人国民大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方是加强联合民主阵线在该国内部的领导地位”(292-93 页)。

对于反种族隔离运动来说,比武装反抗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在索维托起义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重新恢复其在公众中的地位,并且提供一种抵抗的文化和深受欢迎的反种族隔离的体系。由于最初于 1954 年被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的自由宪章在城镇中传播扩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望重新振作起来;对纳尔逊·曼德拉以及自 1960 年代初以来被监禁的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兴趣重新恢复;而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记、歌曲和口号被更广泛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所采纳。不过,更广泛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所采纳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体系、标记和暴力言辞不应该与暴力行动混为一谈。根据杰洛米·希金斯的研究,“抵抗的标记是被流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记...歌曲颂赞非洲人国民大会...歌词称赞武装反抗,而非非暴力战略;而且政治集会上覆盖在棺材上的旗帜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颜色”(希金斯,2000 年,23 页)。“除所有这些有点夸大的革命言辞之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领导人更多地是将武装斗争看做是‘武力宣传’—以转变南非黑人和白人的意识,而非要实际地进行武装夺取国家权力的活动”(希金斯,2000 年,8 页)。因此,与通常意义上的武装反叛不同—其中的平民大众被置于一个辅助武装反

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都有着同样的目标:终结种族隔离制度并转型到一个非种族的统一的民主国家体制。因此,就其政治目标而言,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应当被视为比联合民主阵线或者南非工会大会更为“激进”。当然,战略上的分歧是有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倡以暴力推翻种族隔离的国家体制。不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派别从未对国家构成军事上的威胁。到 1980 年代时,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抗争并从苏联集团那里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培训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派别无法通过暴力的方法对国家构成挑战。到 1980 年代中期时,甚至苏联也认为武装抗争是适得其反的,并反过来建议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取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谈判(普莱斯,1991 年;乌里格(Uhlig),1986 年;祖恩斯,1999b)。

根据杰洛米·希金斯的研究,到 1987 年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无法让很多军事人员潜入到南非,对内部的反抗者只有有限的策略性的影响,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建立南非内部的统一政治—军事指挥架构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希金斯,2000 年,207

叛者的角色，南非的抗争可以更精确地被描述为非武装抗争—其中，平民是主要的行动者，而辅助他们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象征性抗争。

到 1980 年代中期时，除增强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地位之外，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意识到发生于城镇中的非武装反抗的能量。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下组织被用来将资源挪用给南非内部的政治反叛行动—这生动地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意识到，抗议、不合作与富有创意的干预所蕴含的力量比武装反抗更有可能将种族隔离政权推翻。

除了体系构建并将资源输送给非武装反抗之外，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调动国际资源以及利用第三方方面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利用了索维托起义之后国际媒体对城镇中镇压行为的报道，以及国际社会重新复苏的对南非的兴趣，非洲人国民大会得以在 1970 年代晚期和 1980 年代初期快速地扩充其对外的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驻扎于赞比亚卢萨卡的涉外事务部门管理着一个国际办公网络。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二十多个国家有外交办事处，在联合国有代表，并且有很多在海外开展活动的团体。通过这些网络，非洲人国民大会推动第三方对南非施加压力。外交网络还争取经济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并在国际上树立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合法性，同时也削弱南非国家体制的合法性。美国和西欧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团体在这些国家推动反种族隔离运动，并且在撤回投资运动于 1980 年代在大学校园涌现时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哈莫尔（Harmel），1997 年；洛基，1988 年）。

### ➤ 从政治转变到政治转型

精英中的“安保官僚”部门反对对种族隔离体制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并于 1986 年取得普勒陀利亚决策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它负责实施 1986 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加强对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镇压（普莱斯，1991 年，252 页）。不过，正如早前讨论过的那样，镇压的强化无法压制住抗争，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抗争的组织和策略。通过维系面临镇压的抗争，反种族隔离运动改变了政治环境；维持镇压的成本日益高涨，第三方被调动起来，而且精英间的分歧加大。根据罗伯特·普莱斯的研究，“镇压的失败以及与之相关的对自给自足经济战略之不可行性的认知让执政的精英内部突然出现了分歧。分歧的一方是安保官僚们—那些与负责国内与国外安全之政府部门有牵连的人士...执政集团内分歧的另一方是经济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官员【也即国际化的改革者】”（普莱斯，1991 年，275–76 页）。

国际化的改革者与资本家们都认为，持续地无缘于外国资本，再加上罢工和抵制活动，就意味着永久的经济衰退。他们还意识到，有意义的政治变革对于结束内部的不安定并克服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通过与反种族隔离运动谈判实现民主转型是解决南非当地危机的唯一路径。只有在国家紧急状态有所松弛的情况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的合法参与才能够实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被解禁；对组织交流和政治活动的限制被废止；而且政治犯—尤其是纳尔逊·曼德拉—被无条件释放。由于精英中的国际化改革者在 1989 年取得相对于安保官僚的优势地位，通过谈判实现民主转型的路径变得畅通了。1989 年 10 月，在德克勒克取代博塔成为国家总统之后四个月，南非的安全机构被解散。在 1990 年议会的开幕式上，德克勒克宣布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的禁令，放松国家紧急状态，并释放曼德拉。反种族隔离运动成功地迫使政府通过谈判实现向一个统一、非种族化的国家体制的民主转型。

### ➤ 菲律宾

费迪南德·马科斯于 1972 年 9 月 22 日宣布戒严标志着菲律宾形式上的民主政治（尽管其是精英化的）的终结，以及新家长制的独裁体制的诞生。马科斯宣称，为了压制共产主义的反叛运动，消除腐败和实行土地改革，戒严是必要的。更加符合实际的是，宣布戒严是为了阻止总统选举—在选举中，马科斯非常有可能被贝尼格诺·阿

基诺取代，并且是为了便于马科斯积聚财富。马科斯依据戒严法削弱了与之竞争的权力核心，将之前分散化的家长制政体加以集中化，并将其经济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国家垄断，他将重要的经济部门分包给其亲属和朋友，供其侵吞。借着美国的援助、国际银行的贷款以及国家垄断，马科斯及其亲信聚敛了巨额财富。马科斯在凭借着镇压继续掌权的同时，也依靠合法性论证并举办了一系列的公决和投票，以试图为他的统治背书。这些手段带有威胁和欺诈的特征，并且最终没能为当局提供它所想要的那种合法性（阿基诺，1987 年；哈奇克罗夫特（Hutchcroft），1991 年；奥威尔霍尔特（Overholt），1986 年；提姆伯曼（Timberman），1991 年；沃菲尔（Wurfel），1988 年）。

## ➤ 反抗马科斯

在贝尼格诺·阿基诺于 1983 年被暗杀之前，反对马科斯的力

## ➤ 改革派的反对

在戒严法于 1972 年实施之际，传统的政治党派分崩离析，因为大多数政治反对派成群结队地转向效忠马科斯，以从他的酬佣体制中获益。由于无法获得经营它们的家长制机构所需的资源，政治党派失去其群众基础，并且在面临收买和镇压的局面时分崩离析。之前以党派为基础的反对方力量的剩余成员组成一个改革派的反对势力，坚持人权、民主程序和罢黜马科斯。除这些共同的目标之外，改革派反对人士处于分裂状态，在有关经济变革的范围和与美国的关系等议题上尤其如此。只要他们不团结合作或者发动支持他们的群众，马科斯就会容忍改革派反对人士（沃菲尔，1988 年，204—6 页）。

改革派反对阵营中的主要人物包括政治人物，比如何塞·迪奥科诺，劳尔·芒拉珀斯，杰拉多·洛克瑟斯，约维托·萨隆加，以及洛伦佐·塔纳达。不过，对当局最早和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是前参议员和马科斯的政治对手贝尼格诺·阿基诺。阿基诺在宣布戒严之后不久就被逮捕，并在监狱中一直待到 1980 年 5 月—当时他被允许到美国接受治疗。在美国时，他与反对派保持联系并游说美国政府撤回对马科斯的支持。

在戒严的前六年中，改革派反对阵营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大部分反对派领袖要么在监狱，要么在流亡，要么在与当局合作。不过，到 1978 年时，为了抓住表面上的民主所提供的机会（马科斯利用这种表面上的民主试图维系合法性），改革派反对阵营开始动员起来。仍在监狱中的贝尼格诺·阿基诺组建了国家力量（缩写为 LABAN，该词的意思是“斗争”）这一机构，由参议员塔纳达任主席，目的是参加于 1978 年 4 月 8 日举行的临时国民大会的选举。尽管自由党抵制 1978 年的临时国民大会选举，国家力量却参与进来，但不令人奇怪的是，由于政府的欺诈和威胁，它被马科斯所领导的新社会运动击败，未获一席席位。

联合民族民主反对派是改革派反对人士的大联盟，组建于 1980 年—当时，由一直与马科斯合作的何塞和萨尔



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1917—1989), 菲律宾的第十任总统与独裁者。马科斯家族敛财估计高达一百亿美元，前第一夫人伊美黛（Imelda）有鞋子三千双。根据《亚洲脉动》2005 年七月的调查，马可仕的满意度高达七成，比所有继任者都高。资料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瓦多·劳雷尔所领导的民族党的这一派叛逃到改革派反对阵营。联合民族民主反对派由伊娃·埃斯特拉达·克劳、萨尔瓦多·劳雷尔、杰拉多·洛克瑟斯、以及美国的阿基诺和芒拉珀斯领导。改革派反对阵营就下述事项达成共识：抵制预定于 1981 年 4 月 7 日的公民投票以及 1981 年 6 月 16 日的总统选举。公民投票获得批准，结果是对宪法进行第九次修订，以允许马科斯即便在戒严解除之后也合法地保留其权力，而总统选举的结果是让马科斯享有另外的六年任期。当然，没有人认为这些结果是合法的。<sup>7</sup> 尽管有迹象显示反对阵营中的改革派人士之间的合作增加，他们与其他抗争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改革派反对人士一般都局限于中产阶级民众而且缺乏大众的支持或者经济精英的积极支持（沃菲尔，1988 年）。

## ➤ 革命派的反对



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是菲律宾国内的叛乱武装部队，是菲律宾共产党的武力。由施顺（José María Sison）于 1969 年成立。目前被菲国、美国等国家列为恐怖组织。资料图片来源于互动百科。

在 1968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的生日，何塞·玛利亚·斯松和一批不满于共产党菲律宾支部（PKP）—自 1930 年以来一直活动于菲律宾的那个共产党—的支持者成立了新的菲律宾共产党（CPP）。几个月之后，它发起成立了一个武装派别—新人民军。在 1972 年实施的戒严将成百上千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赶往乡村参加革命游击斗争之后，以马列毛思想为基础的菲律宾共产党和采取毛泽东式游击战战略的新人民军的重要性增强。新人民军受到猛烈的军事攻击，不过镇压非但没有摧毁新人民军，却反而将抵抗扩散到全国境内。由于对马科斯新社会计划和压制性策略的不满在整个七十年代增多，新人民军势力增强，成为萨马尔（Samar）、尼格罗斯（Negros）、维萨耶斯（Visayas）和棉兰老岛与伦佐（Luzon）地区的实力最强者。到 1980 年代时，新人民军覆盖了菲律宾的所有地区（沃菲尔，1988 年，223–27 页）。

新人民军还试图扩大城市中的支持基础，于 1973 年 4 月组建全国民主阵线，以汇聚成一个拥有更广泛基础的运动。与改革派人士不同，革命派的反对阵营有一个清晰且互相认同的夺取权力的战略—武装抗争。然而，尽管其联合阵线政策的用意是动员城市中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力量，其暴力行动战略却会阻碍它们动员支持力量的工作。另外，由于菲律宾共产党僵硬的意识形态，其整合基督教支持力量的想法没有实现。尽管教会中的进步人士希望结成一个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体，菲律宾共产党不愿与教会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对话的做法妨碍了它扩大支持基础的努力（沃菲尔，1988 年，227–31 页）。<sup>4</sup>

## ➤ 天主教会的反对

当戒严迫使反对派政治活动转入地下时，天主教会成为表达政治异议的重要渠道，因为在马科斯统治时期，它是全国唯一一家具有自主权和信誉的机构。虽然在戒严开始时天主教会对于马科斯政权总的政策是“批评性合作”政策，天主教会中的部分人却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马科斯的独裁政权，并卷入到改革派、革命派和进步人士的反对活动中（沃菲尔，1988 年）。

也许，最为重要的角色是马尼拉的大主教吉姆·辛—他是教会等级体系里面温和派的领袖。早在 1974 年，辛大主教就开始批评戒严，当时，他主持一个祷告仪式，抗议军队袭击一家神学院并逮捕几十名民众。五千多人参加了那场祷告会，那是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反对戒严的抗议。辛大主教继续发言，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和酷刑。

<sup>4</sup> 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就的一个团体是争取民族解放基督徒组织，其意识形态试图将解放神学与世俗的毛主义结合起来（谢伊斯密斯（Shoesmith），1985 年，86-89 页）。



在 1980 年代保持一种批评性合作的立场的同时，辛大主教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变得更加猛烈。另外，他拒绝使用暴力反对马科斯并试图缓解日渐加剧的两极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天主教会部分人士激进程度的增加以及新人民军力量的增强。这最终有利于反对派不同流派之间的合流（沃菲尔，1988 年，220–22 页）。

### ➤ 进步人士的反对

位于反对阵营之改革派与革命派支流之间的是有着进步倾向的草根运动。来自进步人士组织和天主教会的活动人士既不信任共产党领导的集中化的军事和民事阵线组织，也不信任由精英主导的政治党派，而是着重于在被边缘化的民众中组建草根组织。结果是，关注与特定社会群体——比如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和城市中的穷人——有关的议题的部门性组织形成了网络（祖恩斯，1999a）。

天主教会中更为进步和激进的人士认同解放神学，并在农村地区组建了基督徒基础社区。他们参与到提高政治意识和要求纠正当地人冤屈状况的工作中来。作为活动人士的神职人员与农民结成的新的联系增强了以教会为基础的动员能力。当许多劳工联合会从政府所控制的菲律宾工会大会中脱离出来并于 1980 年劳动节创设五月一日运动时，非共产党的左翼人士力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五月一日运动是作为独立工会联盟出现的，采用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的战略（雷恩（Lane），1990 年；斯珀斯（Scipes），1992 年，1996 年）。

### ➤ 变革前奏：“正常化”与精英的分裂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和国家经济组织的压力（前者对日益扩大的共产党反叛感到担心，而后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日渐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局面和腐败感到担心），一段“正常化”时期在 1978 年开始了。马科斯宣称，这是他的“宪政威权主义”统治实现政治自由化的开始。正常化是一个过程，当局借此试图让它自己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试图维持美国和经济精英们的认可。马科斯于 1981 年 1 月 17 日解除戒严，不过，像他所采取的其他表面上的民主措施一样，这对政治关系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沃菲尔，1988 年，234 页，248 页）。

对马科斯统治的不满以及来自国外的变革压力让精英间出现分裂：双方分别是受益于马科斯统治的人与没有从中受益的人。到 1980 年代初时，精英间的分裂沿着四条路径展示出来：马科斯的亲信相对于旧有的经济精英，经济民族主义者相对于技术官僚，军事官僚相对于文职官僚，以及军队内部的分歧——马科斯的亲信相对于军事专业人员（沃菲尔，1988 年，237–40 页）。与反马科斯抗争有关的最为重要的分歧是经济精英的分歧（在亲信人员和非亲信的资本家之间）以及军事精英的分歧（在那些其职位主要依靠其对马科斯效忠的军官和更加注重专业的军官之间）。

所谓的亲信是指费迪南德·马科斯与其夫人伊梅尔达所支持的新的经济精英人士。他们是马科斯家族的亲属和亲密朋友，通过获取政府信贷和合同，这些人发达起来，并且在与外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方面享有优先权。巨额钱款从国库和政府银行流向亲信人士的公司。他们的崛起增加了旧有经济精英人士以及当代企业家的敌意，有助于反对当局的动员。马凯提企业俱乐部于 1981 年创立，目的是清楚阐明企业阶层中非亲信人士的商业利益（沃菲尔，1988 年）。

由于马科斯将军队个人化以及武装部队内部的腐败问题，军队内部精英的分裂于 1970 年代晚期显现。到 1980 年代时，武装部队内部的争斗是在下述两方之间展开的：一方是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和胡安·庞斯·恩里尔（Juan Ponce Enrile）将军，另一方是费比安·沃尔（Fabian Ver）将军。拉莫斯被视为专业精神的代表人物，并得到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低阶军官的尊重。他的主要对手是沃尔，后者是马科斯的亲戚和前司机，其权力是个人效忠的酬报。恩里尔将军最终会领导改革武装部队运动——这是武装部队内部的改革运动。

到 1983 年时，经过五年的“正常化”之后，成就很少。共产党的武装反叛运动在扩大，旨在收买改革派反对人士的努力失败了，改革派反对阵营中的部分人开始与左翼人士合作，精英间的分裂变得更加突出，而天主教会则对马科斯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再加上马科斯的健康状况恶化，贝尼格诺·阿基诺感到好机会来了，他不愿错过这一时机，就从美国返回菲律宾，要求马科斯下台。然而，在他于 1983 年 8 月 21 日返回菲律宾时，阿基诺被一名护卫军人暗杀于马尼拉国际机场，当时他正下飞机。

## ➤ 阿基诺被暗杀后的抵抗：人民力量运动



阿基诺被刺后抬上警车时的情景。资料图片来源于中国网。

在暗杀事件后的日子里，几十万人列队走过阿基诺敞开的棺材，而且大约有来自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两百万人聚在一起观看阿基诺的葬礼。阿基诺成了反抗马科斯事业的烈士。在阿基诺被暗杀之后最初的震惊和愤怒过后，反对马科斯的反对人士加倍努力地动员民众，各个不同的抵抗派别开始合流。尽管革命派反对阵营和进步人士的草根团体多年来一直在反抗马科斯，并且成为当局暴力镇压的主要受害者，阿基诺被暗杀却成了催化剂，让中产阶层和商业阶层以及天主教会里的主流人士从被动的认可转为积极的反对——这些群体后来都支持改革派的反对运动。

阿基诺的被暗杀违反了菲律宾政治生活中这一心照不宣的规则：有精英背景的改革派反对人士不会受到致命的镇压。马凯提商界于 1983 年 9 月 14 日在马尼拉的马凯提商业区组织了首次反马科斯的示威和集会，后来这发展成每星期一次的活动。大

约十万名在写字楼工作的人员沿着街道示威，从沿途摩天大楼的窗户中扔下的黄色纸屑纷纷落在他们身上。1984 年 2 月，中产阶级民众组织了一个赛跑，“从塔拉克到塔马克”，也即从阿基诺的家乡省份到马尼拉国际机场，沿途动员了大约五十万名民众（汤普森（Thompson），1995 年，115-20 页）。<sup>5</sup>

阿基诺像基督受难一样的牺牲对菲律宾虔诚的天主教徒有着巨大的直接的宗教意义（汤普森，1995 年，116 页；提姆伯曼，1991 年，128 页）。天主教会中的主流人士站出来公开反对马科斯并为民主抗争提供建制性的支持。到 1983 年时，由马尼拉的辛大主教领导的温和派人士站到教会反对马科斯政权的第一线，并利用其全国性的通讯设施动员抵抗力量。

在改革派反对阵营一致抵制 1981 年公民投票和选举时，有些团体选择了参与 1984 年 5 月 14 日的国民大会选举。联合民主反对力量（现在由萨尔瓦多·“杜伊”·劳雷尔和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克莉”·阿基诺领导）、菲律宾民主党—国家力量、<sup>6</sup>以及前自由党的由伊娃·克劳领导的那一派别参加了选举，而自由党的约维托·萨隆加派系则继续抵制选举。<sup>7</sup>尽管他们没有预期会有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改革派的参与者觉得，选举至少提供了一个让他们的动员机构和组织恢复活力的机会。对应于政府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全国自由选举运动<sup>8</sup>成立了，作为自主

<sup>5</sup>根据雷恩的看法（1990 年），“抗议赛跑”是作为一种策略出现的，当时，中产阶级成员将他们对赛跑的休闲兴趣与他们将马科斯赶下台的政治兴趣结合在了一起。

<sup>6</sup>菲律宾民主党-国家力量成立于 1982 年，当时菲律宾民主党与国家力量合并。在 1984 年的选举中，许多菲律宾民主党-国家力量的成员打着联合民主反对力量的旗号竞选，这提高了改革派反对人士的凝聚力。

<sup>7</sup>菲律宾共产党也坚持其抵制选举的战略。

<sup>8</sup>全国自由选举运动最初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于 1951 年，目的是确保雷蒙·马格塞塞“自由公正地”当选，可

的选举监督机构。

尽管有欺诈和威胁的问题，1984年5月的选举比预期更为公正，这主要得益于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措施——它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所在的城市地区的选举欺诈行为。尽管新社会运动享有压倒性优势，反对派也赢得国民大会两百个席位中的六十一个席位，而且如果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话，肯定会赢得多数议席。另外，高投票率（几乎90%的选民参与了选举，这是自宣布戒严以来最高的参选率）鼓励非共产党的左翼人士中的大部分其余人员参与以后的选举之中，让菲律宾共产党孤立地顽强坚持对选举的抵制和武装斗争（汤普森，1995年，131-32页）。

在中产阶级、企业阶层以及传统的政治人物终于开始公开反对马科斯的同时，已有的草根民众运动——包括独立工会、农民组织、学生和教师协会、妇女团体、人权团体以及城市穷人团体——在阿基诺被暗杀后加紧行动。普遍的策略包括人民自由游行以及群众性示威——这被称作“街道上的议会”（提姆伯曼，1991年，131-32页）。

在紧接着暗杀事件的几个月内，进步的左倾团体——比如为阿基诺争取正义，为所有人争取正义（简称争取正义组织）——组织了很多抗议。在前参议员何塞·迪奥科诺和阿加皮托·“巴慈”·阿基诺——他——是被暗杀的阿基诺的弟弟——的领导下，争取正义组织在1983年10月到1984年2月间组织了一百多场抗议示威。到1984年5月时，争取正义组织已经被恢复民主联盟所取代。恢复民主联盟组建的目的是抵制1984年5月的国民大会选举，可是，在许多反对派团体参与选举之后，它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的不合作方法，尤其是人民罢工。人民罢工包括工人总罢工，但其含义更为宽泛，因为所有店铺会关门，所有公共交通会停止，而且社区人员会筑起路障，阻止私人车辆通行（斯珀斯，1992年，91页）。第一场人民罢工于1984年初在达沃奥市举行。这一策略暴露出政府在面对大规模不合作时的问题，并扩散到其他城市。到1984年底时，交通行业的罢工瘫痪了大都市马尼拉的部分地区和中鲁让以及南部的城市（比如达沃奥、布图安、凯加岩·德·奥罗、贝克罗德和赛布）。巴塔安1984年12月的人民罢工关闭了整个省份将近80%的交通系统。在有些地区，罢工让高达95%的人群受到影响（提姆伯曼，1991年，132页；祖恩斯，1999a，134-35页）。

新民族主义联盟于1985年5月脱胎于恢复民主联盟。它是一个将许多进步派系的组织联合——包括全国农民运动和五月一日运动这一劳工联合会——在一起的伞形组织，目的是推动反对马科斯政权的不合作运动。1985年5月2日和3日，一场大规模的人民罢工在整个棉兰老岛举行。为了抗议巴塔安半岛正在建设中的核电厂以及从更为普遍的意义对马科斯的腐败的资本密集型发展项目提出抗议，一场人民罢工于1985年6月18-20日举行。大约10,000名民众参加了工厂中的集会，同时，交通行业的工人在罢工。巴塔安出口加工区的大约6,000名工人集体停工加入人民罢工行动。1985年2月有一场历时一天的大罢工，来自187家工会的140,000名工人在罢工中抗议屠杀工会领导。在同一个月，来自中鲁让农民联盟的大约7,500名农民游行到马尼拉，并在农业部门口静坐了九天（祖恩斯，1999a，134-37页）。到1986年时，新民族主义联盟宣称在全国有两百名会员，包括600,000名五月一日运动的成员和100,000名全国农民运动的成员，并与大约500家草根组织有联系（提姆伯曼，1991年，133页；祖恩斯，1999a，134页）。

## ➤ 政治转变与突然的政治转型

到1985年时，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已经几乎将马科斯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力剥夺殆尽。为试图巩固其统治，马科斯在11月初提出提前在接下来的2月份举行大选。由于对他举行欺骗式选举以及威胁显然处于分裂状态的反对

---

是后来被解散（博内尔，1987年；沙洛姆，1981年）。全国自由选举运动于1984年再次出现，而且尽管它从海外（比如美国民主基金会）获得资助，却一直独立于外部的控制并且比其前身更成其为本地化的草根运动，获得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

派的能力充满信心，马科斯完全相信他会继续执政。

改革派反对阵营于 1985 年 12 月 11 日聚集在联合民主反对力量的旗帜之下，以科拉松·阿基诺和萨尔瓦多·劳雷尔为候选人。自由的社会民主党也参与了总统选举，而共产党人则继续抵制选举。竞选活动一开始，克利·阿基诺就敦促支持者接受非暴力的纪律约束，并明确表示，针对对手的暴力袭击——这在菲律宾混乱的选举历史上并非稀罕事——是不可容忍的（祖恩斯，1999a，142 页）。

与此同时，由新民族主义联盟领导的进步人士反对阵营决定抵制选举，理由是改革派反对阵营不曾致力于社会的进步变革。新民族主义联盟还希望利用预期中的 1986 年总统选举中的败绩来增加对其以后不合作运动的支持以及对预定于 1987 年 5 月举行的地方选举的支持。事后看来，由于抵制了总统选举，进步人士的反对阵营将后马科斯时代的政治主导权让给了改革派人士（提姆伯曼，1991 年，141–42 页）。

联合民主反对力量从天主教会和全国自由选举运动那里获得至关重要的支持。由于马科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大马尼拉地区的所有电视台和大部分电台与报纸，天主教会所拥有的真理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在报道联合民主反对力量的竞选活动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在构建阿基诺-劳雷尔，以及更为普遍地促进改革派反对阵营人士的联合方面，辛大主教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 1986 年 1 月 19 日发出一份牧函，呼吁民众投票给那些诚实和尊重人权的候选人。在同一个月，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大会敦促作为天主教徒的选民通过非暴力抗争的方式抵制选举期间的威胁要妨碍人民表达其意愿的阴谋（提姆伯曼，1991 年，145–48 页）。

与天主教会紧密相连的是全国自由选举运动。这是一家与官方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平行的独立选举监督组织。全国自由选举运动动员和培训了超过 500,000 名志愿者监督全国大约 90% 选区的选举工作。全国自由选举运动在选举日的计票工作被认为是可信的，而选举委员会的计票则受到怀疑。选举过后，全国自由选举运动和选举委员会的票数统计的差距扩大。马科斯的地位已经因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活动而受到损害，而当选举委员会的三十名负责电子化计票工作的员工于 1986 年 2 月 9 日愤然罢工以抗议正在发生的选举舞弊行为时，他的地位受到进一步的削弱。选举委员会宣称马科斯-托伦蒂诺这一竞选组合赢得超过 53% 的选票，而全国自由选举运动则宣布阿基诺-劳雷尔大约 52% 的选票（提姆伯曼，1991 年，145–48 页）。

由新社会运动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大会于 2 月 15 日确认了选举委员会所报告的选举结果，并宣布马科斯以 53.8% 的选票获胜。作为对宣称马科斯获得选举胜利这一明显舞弊行为的回应，克利·阿基诺于 2 月 16 日领导了一场大约两百万人的集会，宣布她自己 and “人民” 获胜，谴责马科斯，并勾勒出人民胜利这一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轮廓。该运动呼吁从 2 月 26 日——这是马科斯计划中的就职日的第二天——开始举行总罢工，从七家由【马科斯的】亲信所控制的银行中大量取出资金，抵制由亲信和政府所控制的媒体，拒绝支付公共事业费用，抵制由亲信所控制的生力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夜间发出大的噪声，并采取其他适当形式的非暴力行动。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大会呼吁支持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新民族主义联盟和全国民主阵线则支持将于 2 月 26 日举行的大罢工，呼吁其两百万成员参加罢工（埃尔伍德（Elwood），1986 年，4 页；祖恩斯，1999a，144–46 页）。

计划中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肯定会将马科斯政权推翻，但在这一运动付诸实施之前，为期四天的“桑托斯大道革命”爆发了。<sup>9</sup> 国防部长恩里尔将军以及改革武装部队运动中一群军官计划袭击马拉坎南宫，以迫使马科斯下台。当他们的计划被沃尔将军发现后，恩里尔带领两个营的士兵于 2 月 22 日发动兵变，躲在马尼拉城外的两个主要的军营——克雷默和阿古尔那多兵营——里。与恩里尔一起行动的是副总参谋长拉莫斯将军，他们宣布脱离马科斯政

<sup>9</sup> EDSA 是桑托斯大道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略词[译注：中文版根据意译翻译，没有出现 EDSA 这一用语]，它穿过阿古尔那多和克雷默兵营——这两个军事基地位于马尼拉近郊的奎佐城。



府并支持阿基诺。那天晚上，辛大主教敦促民众支持兵变，作为回应，几万名支持民主的同情者聚集在桑托斯大道。另外，独立媒体违抗马科斯有关审查的命令，民众们公开违反宵禁的规定以及让他们离开叛军所盘踞的军营周围地区的命令。

马科斯命令两个营的兵力去军营镇压兵变，可是，当他们的坦克接近兵营时，由修女和教士所带领的徒手空拳的民众在坦克和军营内的叛军之间组成一道人墙。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有效地瓦解了马科斯所派遣的部队，随后就撤退了。上述富有戏剧性的事态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士兵和军官叛逃现象。被命令要攻击军事基地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拒绝执行命令，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大面积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伤亡。到2月25日时，几十万名平民聚集在军事基地的外面。重要的是，非暴力原则从头到尾得到了维系。迎接士兵的是友好的表示，而非辱骂。在安抚大众和约束针对依旧忠于马科斯的士兵的挑衅行动方面，受过非暴力行动培训的活动人士与修女和教士们一道发挥了领导作用（埃尔伍德，1986年；祖恩斯，1999a，146–52页）。军事哗变成功的原因不在于恩里尔和拉莫斯将军的受欢迎程度或者他们的军事实力，而在于他们从几十万名平民那里获得的有组织、有纪律约束的支持。与对上述事件的普遍解释相反，人民力量运动的成功并不是军事哗变的结果。更准确地说，真相恰恰相反—军事哗变的成功时人民力量运动的结果。有些人所谓的“平民支持的军事哗变”可以被更准确地称为“军人支持的平民反叛”（祖恩斯，1994年，1999a）。

2月25日早晨，一个平行的政府组建起来，当时克利·阿基诺宣誓就任菲律宾第七任总统。平行政府包括副总统兼外交部长萨尔瓦多·劳雷尔和庞斯·恩里尔，以及菲律宾新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菲德尔·拉莫斯。当天晚上，四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将马科斯及其随从人员从马拉坎南宫运到马尼拉以北的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第二天早晨，马科斯以及他的大约三十名随从人员—包括他的家人和沃尔将军—被美国军队用飞机运到关岛，然后到达夏威夷。飞机上有价值110万美元的新印制出来的比索（译注：菲律宾货币）、珠宝以及据报道值三千万美元的其他资产，还有外国银行存折（提姆伯曼，1991年，150页，161页）。大部分菲律宾民众对阿基诺政府的效忠以及马科斯匆匆的逃跑终结了多头政府时期，并引向突然的民主转型。

## ➤ 非暴力行动和政治转变

从某种程度上说，南非和菲律宾的非武装反抗具有第二章所描述的特征和行动，而从理论上说，这些特征和行动应该有利于非民主条件下非武装反抗的成功：有着松散协调型的分散化组织网络、实施一系列广泛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并撤回对国家的支持和通过其依附关系动员对国家施加压力。这些特征让它们更加能够活动于压制性的环境之中，削弱国家权力，触动第三方，加剧精英间的分裂，并促成脱离体制的行动；也就是说，它们有助于重新塑造政治环境，让其变得更加有利于实现抗争者的目标。

## ➤ 维系抗争

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地方抵抗派别，它们后来被伞形组织联结在了一起。南非的城镇在1980年代初经



科拉松·阿基诺（1933——2009），全名玛莉亚·科拉松·“柯莉”·柯峻科·阿基诺（Maria Corazon "Cory" Cojuangco Aquino），菲律宾及亚洲首位女总统，于1986年至1992年在位；她是被刺杀的贝尼格诺·阿基诺的夫人，在贝尼格诺被刺杀后，逐步卷入政治，最终在1986年的大选中作为反对党候选人打败了马科斯。资料图片来源于互动百科。

历了社团生活的爆炸性增长时期。新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组织强调草根型的社团形式，比如社区、青年、妇女、劳工、学生和政治团体。尽管服务于多少有点不同的地域、阶层、性别和功能群体，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拒绝政府的有限改革并终结种族隔离制度。在联合民主阵线松散的协调下，这些组织后来成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核心力量。联合民主阵线成立时附属于它的 565 家地方组织在几年内增加到超过 700 家地方组织。在第二次紧急状态取缔了联合民主阵线后，南非工会大会支持的大众民主运动成为联盟组织，继续动用和协调各地的抗争。

在菲律宾戒严时期，来自天主教会和进步人士组织的左翼活动人士在草根层面上将妇女、农民、工人、学生和城市穷人组织起来。其动员结构的特色是联谊团体，也即小型的、具有自主性的活动人士团体与类似的团体互相联系，并在非暴力运动中走到一起（祖恩斯，1999a，131–33 页）。这是建立分散化部门性组织网络的更大运动的一部分，而那些部门性组织是独立于精英所控制的政党和等级式共产主义运动的，也是独立于国家的。

到 1985 年时，菲律宾有几百家群众性和部门性组织，它们构成并重组各种漂移不定的联盟。将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的许多联盟组织出现了，包括共产党的全国民主阵线以及进步人士的争取正义组织、恢复民主联盟、以及新民族主义联盟。全国民主阵线由于它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妥协立场而没能争取到非共产党人士的支持，新民族主义联盟则成为菲律宾最大和组织得最好的联盟组织，宣称在全国拥有将近两百万名成员，包括五月一日运动的 600,000 名成员和全国农民运动的 100,000 名成员，并与 500 多家以省为基地的组织有联系（提姆伯曼，1991 年，132–33 页）。新民族主义联盟的势力越来越大，而且动员起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人民罢工。不过，当 1986 年举行提前选举时，新民族主义联盟的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而其抵制而非参与选举的决定确保了联合民主反对力量在反对派民主人士中的领导地位。尽管新民族主义联盟能够在选举后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该运动肯定会推翻马科斯政权—中使自己与联合民主反对力量结盟，由于桑托斯大道革命的爆发以及美国和军队所支持的改革派政府的成立，其影响力再次受到削弱。

从组织上说，这两个案例的另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是劳工运动都采取了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的立场。尽管相比于反抗马科斯的运动，它对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作用肯定更为重要，这两个案例中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都增强了劳工运动抵御压制和削弱政权的能力。根据格伦·阿德勒和艾迪·韦伯斯特的观点，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的特征是，组织模式适合于与威权敌人做斗争的运动：领导权被下放到地方，群众性抗议策略和战略手法很多，以及与社区和政治团体结成联盟”（阿德勒和韦伯斯特，1995 年，89 页）。南非和菲律宾劳工运动都有这样的特点：分散化的结构让抗争在面临严酷镇压时具有韧性；民主化的结构阻碍了官僚化、被收买和建制化；与地方社会运动和全国性政治运动有联系，但又独立于后者；采取大量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方法。

在南非和菲律宾，各运动所采取的方法的多样性提高了它们在压制性环境下持续抗争的能力（见表二和表三）。没有一场抗争是单独依靠某一种抗争方法的，而且两场抗争都采取了很多种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抗议与说服、不合作和破坏性与建设性干预。当国家将其压制力量集中于某一种非暴力行动时，抗争者就转向其他的方法。每一种方法会强化其他的方法，增强抗争的韧性并促使抗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升级。

表二 南非主要的非暴力运动和事件，1983–1990 年

行动	日期	地点	非暴力行动方法
集会成立联合民主阵线	1983 年 8 月	开普敦	抗议与说服
抗议性示威和集会，反对	1983 年 10 月	全国	抗议与说服

只有白人参加的政治改革全民公决			
百万人签名运动	1984 年 1-7 月	全国	抗议与说服
支持抵制竞选的集会	1984 年 8 月	全国	抗议与说服
抵制三院制的议会选举	1984 年 8 月	全国	不合作
占领英国领事馆	1984 年 9 月	德班	破坏性非暴力干预
停工	1984 年 11 月	索维托	不合作
支持占领英国领事馆的集会	1984 年 12 月	德班	抗议与说服
政治性葬礼	1985 年 7 月	克拉多克	抗议与说服
消费抵制	开始于 1985 年 7 月	全国	不合作
建立人民力量组织	开始于 1985 年 8 月	城镇	建设性非暴力干预
停工	1986 年 5 月	全国	不合作
停工	1986 年 6 月	全国	不合作
拒付租金	1986 年 6 月	城镇	不合作
祷告	1986 年 12 月	全国	抗议与说服
停工	1987 年 5 月	全国	不合作
停工	1988 年 6 月	全国	不合作
占领美国领事馆	1988 年 6 月	约翰内斯堡	破坏性非暴力干预
抵制地方选举	1988 年 10 月	城镇	不合作
群众性绝食抗议	1989 年 1 月	全国	破坏性非暴力干预
对隔离法的公民不服从	1989 年 8 月	全国	不合作
停工	1989 年 9 月	全国	不合作
抗议性示威	1989 年 9 月	全国	抗议与说服
联合民主阵线的自我解禁	1990 年 1 月	全国	不合作

注：基于希金斯（2000 年）和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局（1983-90 年）。

表二 菲律宾主要的非暴力运动和事件，1983–1986 年

行动	日期	地点	非暴力行动方法
政治性葬礼	1983 年 8 月	马尼拉	抗议与说服
抗议性示威, 马凯提商业区	开始于 1983 年 9 月	马尼拉	抗议与说服
大长征	开始于 1983 年 10 月	马尼拉	抗议与说服
人民罢工	开始于 1984 年 1 月	最初是达沃奥市, 后来是其他城市	不合作
塔拉克到塔马克赛跑	1984 年 2 月	塔拉克到马尼拉	抗议与说服
左翼人士、进步人士和自由改革派反对阵营部分人士抵制国民大会选举	1984 年 5 月	全国	不合作
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组建和运作	开始于 1984 年 5 月	全国	建设性非暴力干预
农民的静坐	1985 年 2 月	马尼拉	破坏性非暴力干预
左翼人士和进步人士抵制总统选举	1986 年 2 月	全国	不合作
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罢工	1986 年 2 月 9 日	马尼拉	不合作
联合民主反对力量的集会	1986 年 2 月 16 日	马尼拉	抗议与说服
公民不服从( 公开违反审查和宵禁的规定 )	1986 年 2 月 22–25 日	马尼拉, 奎恩市	不合作
以人墙包围军营	1986 年 2 月 22–25 日	奎恩市	破坏性非暴力干预
组建平行政府	1986 年 2 月 25 日	马尼拉	建设性非暴力干预

注：依据雷恩（1990 年），提姆伯曼（1991 年），祖恩斯（1999a）和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局（1983–86 年）。

在南非，派上用场的抗议与说服方法包括游行、集会、政治性葬礼以及纪念被国家暴力杀害的人士的守夜活动。所采取的不合作与破坏性干预方法包括对选举、学校、租金和消费的抵制；拒绝支付税款；罢工和停工；非



暴力的阻挠、占用、静坐和突袭；政治犯的绝食抗议；以及对隔离法律的不服从。所采用的建设性干预方法包括建构替代性的“人民力量”组织，比如由街道和社区委员会组建的地方政府和人民法院、由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组建的学校、以及由南非适当社会服务组织所组建的合作社、社区诊所、和法律资源中心。

在菲律宾，派上用场的抗议与说服方法包括游行、集会、示威和抗议性跑步。所采取的不合作与破坏性干预方法包括人民罢工和停工、静坐、建立人墙、以及不服从紧急命令。所采用的建设性干预方法有许多不同的实施手段，比如通过建立替代性的教育机构和通讯中心，组织农村合作社（它们试图建设在国家和跨国公司控制之外的本地化经济），组织全国自由选举运动（以此作为与政府控制下的选举委员会平行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并最终组建一个由克利·阿基诺领导的平行政府。

为了应对政府的限制和压制，这两场斗争中都出现了策略性的创新，并且新方法借此得以实施。这些新的行动有效地克服了政治环境的约束，并防止运动出现停顿现象。在南非，停工是为了应对政府对抗议的压制。为了应对政府收买城市黑人民居的企图，人们集体抗付房租并组建替代性的城镇政府。在菲律宾，人民罢工为应对对抗议示威的镇压而发展壮大起来。和南非的停工行为一样，政府针对人民罢工的暴力举措几乎毫无力量。两个国家的抗争者都了解到，当镇压集中于集合性的方法—比如公共场所的抗议性示威—时，分散化的方法—比如抵制和大罢工—就必须要被采纳，以维系抗争。

## ➤ 削弱国家权力

由于在面临镇压时能够持续不断地抗争，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反对马科斯的运动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和资源，借此推动了政治上的变化。造成上述结果的直接方式是削弱国家源自社会内部的权力，间接方式是割断国家与源自外部的权力来源的联系。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劳工的依赖直接为工会运动提供了契机。正如图示 3 所示，南非的罢工活动随着独立工会于 1973 年的出现而增加，接着，在索维托叛乱之后因严酷的镇压而减少。到 1980 年代时，罢工活动再次开始增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 1985 和 1986 年实施紧急状态后，罢工活动升级，反映了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战略抵御压制性环境的能力。<sup>10</sup>

图示 3 南非的罢工，1970–88 年（图略）。<sup>11</sup>

不同年份的数据来自南非政府全国人力委员会。这些数值依据政府所采集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会低估工人的不合作活动，因为数据基于雇主的报告—雇主只须报告因雇佣条件方面的纠纷而出现的停工或者根据劳工关系法之定义属于合法的罢工。所以，同情心罢工、怠工、政治性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不合作没有官方的记录。

这些趋势在图示 4 中得到更明显的体现，图示 4 表示因不合作行动而损失的工作日的数量。在 1973 年德班罢工浪潮以及 1976 年索维托叛乱的前后，不合作行动有暂时的增加；不过，这两个态势都受到国家的压制。在 1980 年代初，以联合民主阵线 1984 年的反对竞选运动为开端，具有自主性的组织出现，不合作升级。后来，各种不合作运动升级，而尽管实施了两次紧急状态，国家却无法压制住抗争，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抗争的分散化组织和它们所采取的一系列广泛的方法。罢工和停工的持续进行直接侵蚀了国家的资源以及它控制政治局势的能力，致使外国资本流出南非，并促成了资本家和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种族隔离政府内部精英间的分歧。

<sup>10</sup>南非非武装反抗长达多年的持续时间让整理纵向的数据成为可能。本书中的其他五场非武装反抗没有这种年度纵向数据，因为它们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

<sup>11</sup> 编者注：由于图片格式较大，在此略去。

图示 4 因不合作行动而损失的工作日的数量，1972–88 年。（图略）<sup>12</sup> 不同年份的数据来自南非政府全国人力委员会。

种族隔离体制对外国资本和国际认可的依附关系也被反种族隔离运动所利用。除罢工活动外，非白种人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直接削弱了国家在国内外的合法性。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际压力是反种族隔离运动拒绝政治改革和持续开展集体行动的结果。如果运动接受当局的政治改革或者被当局的镇压所击垮，对当局的国际压力就很可能减弱。

图示 5 揭示了针对南非的制裁的数量。图示 6 揭示了南方所遭受的经济和武器禁运的数量。这两组数据都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在 1976 年索维托叛乱的前后以及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制裁和禁运增加，后来在 1970 年代晚期和 1980 年代初期出现下降，而自 1984 年以后则有显著的上升。这些数据说明，自发且常常带有暴力性质的索维托叛乱所产生的效果是让国际社会注意到南非非白种人的苦难，不过，当叛乱因镇压而被粉碎时，国际上的第三方的兴趣和压力就减弱了，正如 1970 年代晚期和 1980 年代初期制裁和禁运的减少所揭示的那样。反种族隔离运动在 1980 年代初根据政治机会重新组合，并且在实施非暴力行动方面变得更加组织化和成熟。对 1984 年政治改革的抵制以及不顾 1985 和 1986 年所施行的国家紧急状态而继续采取抗议、罢工和抵制行动的能力有助于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的压力，并借此削弱种族隔离政权的资源、合法性以及控制政治局势的能力。结果是，国内所施加的持续压力有助于获得来自国外的压力。

图示 5 针对南非的制裁，1946–88 年（图略）<sup>13</sup>。数据来自雪伊曼（Schoeman）（1988 年）。数据包括实际所实施的制裁，以及外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教会、银行、工会、教育机构、社会运动和地区与国际组织所发出的制裁、抵制、撤回投资、取消投资和使其孤立的呼吁。1988 年的数据只包括该年度的前十个月。

图示 6 针对南非的经济和武器禁运，1962–87 年（图略）<sup>14</sup>。数据来自墨兹阿（Mozia）（1991 年）。

在菲律宾，罢工活动让马科斯政权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菲律宾的罢工数量从 1983 年的 155 起，增加到 1984 年的 282 起和 1985 年的 405 起，而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的数量从 1983 年的 50 多万，增加到 1984 年的 190 多万和 1985 年的 240 多万（斯珀斯，1996 年，32 页）。除直接削弱马科斯的统治能力之外，罢工还因使企业环境不稳定和促成资本从菲律宾外逃而间接削弱其治理的效能。在 1986 年总统选举之前的那段时期，资本外逃加剧了，而在非暴力运动计划于 1986 年 2 月 16 日宣布之后尤其如此—该计划包括停工、从马科斯亲信所控制的银行中取出资金，抵制马科斯及其亲信所拥有的企业，以及拒绝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祖恩斯，1999a，143–44 页）。

持续的抗争也削弱了马科斯的外部支持力量。对民主反对派和扩大中的共产党反叛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导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议会中的议员与里根政府和国防部决裂—后者继续支持马科斯，并且认为，鉴于他的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以及继续控制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的重要性，这种支持是合理的（博内尔（Bonner），1987 年；汤普森，1995 年）。

由于积极地扶持军队中由恩里尔将军所领导的改革派力量，美国政府中的部分人士对加剧菲律宾军队内部精英的分裂也起到关键作用。为了阻遏新人民军的扩张并扩大民主反对派的力量，美国政府中反对马科斯的力量为人民力量运动中的改革派人士和军队内部的改革运动都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一旦出现反对马科斯的军队支持的平

<sup>12</sup> 同上。

<sup>13</sup> 同上。

<sup>14</sup> 同上。

民叛乱，甚至马科斯的亲密朋友和最为坚定的支持者—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不再支持马科斯了。

## ➤ 镇压的两难


借着让面临暴力镇压的非武装抗争延续下去，“政治柔道”的态势就可能出现。在这种态势下，抗争者的决心增强，官方通过镇压保持控制权的能力下降，而且第三方的支持会出现。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所采取的作为抵抗手段的非暴力行动影响了从一般大众到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南非白人。根据斯蒂芬·祖恩斯的想法，“在白人少数族群的眼中，武装革命会确证他们将非洲人视为‘暴烈的野蛮人’的最恶劣偏见，而且会强化他们的‘被包围’心态...另一方面，非暴力行动不仅对有关‘黑人恐怖分子’的普遍印象提出挑战，而且还挑战‘卑躬屈膝的私人管家’的印象，并在白人中导致态度上的重大变化”（祖恩斯，1999b，165页）。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支持。根据罗伯特·普莱斯的观点，“1985年7月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不仅对于控制民众反叛是一个具有灾难性的不成功尝试，而且它还促使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们要求实行经济制裁”（普莱斯，1991年，250页）。尽管武装反抗肯定会被军队击垮，主要是非暴力性质的一系列广泛战略的实施增强了抗争的韧性。另外，持续的非暴力抵抗得到国内外的支持，特别是西方的支持。而如果抵抗主要采取武装反抗方法的话，抗争就非常不可能得到这些支持。

同样的态势也出现于菲律宾。根据大卫·沃菲尔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残暴和随意施害于人的做法感到震惊。羁押和酷刑可能阻止了某些有组织的异议表达，但是许多菲律宾人却在其中发现了对政府感到不满的理由”（沃菲尔，1988年，127页）。贝尼格诺·阿基诺的被暗杀大大方便了动员，而暗杀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是将他转变为反马科斯运动的烈士（伊雷托（Ileto），1985年）。对于政治柔道态势来说，殉难是一个有力的催化剂；也就是说，谋杀手无寸铁的活动人士凸显了当局的残暴性，并鼓励以前漠不关心的人士加入到抗争事业中来—而谋杀一位暴力活动分子不会具有这样的效果。资本家和天主教会的主流人士以及普通大众因阿基诺被暗杀而被动员起来，而暗杀游击队员或恐怖分子绝不会产生如此的效果。一旦这些人士被动员起来，暴力镇压和强制就无法阻止有组织的群众性不合作了。

与军队拒绝对“人民力量”运动使用武力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军队在使用武力对付新人民军的武装抵抗运动时的效能和意愿—以及所获得的美国的支持。如果人民力量运动是暴力性的，那么，美国就会宣称，防止运动夺取权力的军事政变或者更有戏剧性的军事干预是合理的（祖恩斯，1999a）。因此，作为抵抗方法的非暴力行动具有将反对阵营中的很多人团结起来的作用，而且它成功地消除了美国以武力介入冲突的合理性。

## ➤ 结论

南非和菲律宾的抗争说明下述说法是有问题的：非暴力的抵抗形式在反对压制性政权时无效的。尽管外在于抗争的因素会影响它们的轨迹和结果，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运动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外部力量的成效。对结构性因素的过度强调没有充分考虑到战略和抗争态势是如何让政治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抗争者的。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和菲律宾的反马科斯运动证明，在非民主的条件下，存在着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通向政体转型的反抗路径，而且这种路径可以取代游击战争。非武装反抗可以推动精英协商式的民主转型（如南非的情形那样），或者它们可以推翻不愿进行协商的独裁政权（如菲律宾的情形那样）。然而，第三波民主化中的所有非武装反抗并非都促成了政体的变革。下一章要考察的是缅甸与中国的两场不成功的非武装反抗。 

## 大学论坛



(图为夏霖律师在讲座现场, 黄凯平/摄)

**编者按:** 本期“大学论坛”选登了夏霖律师6月2日在国际关系学院做的报告《我在北京当律师》。夏律师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妙语迭出, 十分精彩, 比如: “北洋时期是是中国司法制度与律师制度的黄金时期, 中国现今并没有所谓的司法独立。”“法律是一个世俗的科学, 它更多的是一种经验, 当今学习法律的同学普遍缺少具体的实践, 实务上的具体操作应当加以注重, 社会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对于司法领域的从业人士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三个至上’的口号实质是司法体制的退步, 200 多人的最高法院团正是这一畸形司法体制的具体呈现, 我们希望通过做一些公益案件回馈社会, 透过这些案件慢慢对于中国社会, 从一个权力化高度

专制社会向法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通过法律可能改善, 所谓的律师是要在体制内解决问题, 这种点点滴滴的改良方式对于解决一个问题来说是一种缓慢的效应, 但是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 对于化解社会冲突, 化解社会利弊, 化解社会独立情绪是行之有效也是至关重要的, 遗憾的是有关当局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他们已经习惯于专制的思维, 这更要求我们法律人要坚守我们经常所讲的正义观, 价值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改变!”

## ■ 我在北京当律师

夏霖

**夏霖:** 同学们下午好! 来学校跟同学这样交流让我确实很紧张, 比我去法庭开庭要紧张很多, 请同学们原谅。离开学校有 20 年的时间了, 现在又重新回到学校来和同学们交流, 确实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比较紧张。在座的同学都是 80 年代末或者 90 后的人了, 我也不知道同学们关心什么问题, 关心什么话题。今天主持人给我的题目是“在北京做律师”, 我想跟同学们先商量一下, 大概 2 个小时的时间, 我把它分成两段, 我可能主要讲 45 分钟或者 1 个小时, 然后留更多的时间跟同学们交流, 这样自由交流能够充分一些。

大概想了几个有关律师行业的话题, 开始之前我希望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希望讲什么。讲律师行业的现状还是讲我自己办案的心得体会, 也可以讲一讲给同学们的建议, 因为都是法学院的学生嘛, 怎么样在法学院里更迅速地形成一套法律人的逻辑思维以及训练体系。我不知道同学们关心哪些问题。刚才你们法学社唐同学和我说, 希望我讲一下案例, 我不知道讲案例的话, 同学们关心哪几种案子, 因为我代理的案子有很多, 有些是死刑案件, 有些是涉及到民生的案子, 有一些甚至是政治性的案件, 有一些像去年社会关注比较高的邓玉娇的案件, 还有前



几年杀城管的案件，都是我做的代理。我不知道同学们希望听哪一块？听哪一块我就可以讲那一块。

学生：邓玉娇。

夏霖：就是案子上讲邓玉娇案子。那么我就简单的串起来讲，我大概讲一个小时左右。

从哪里说起呢？同学们经过了在法学院的学习，应该对中国的律师制度有所了解，但我想再用简单的几句话把中国律师行业的现状跟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介绍。中国的律师制度，中国的古代是没有这个律师制度的，都是一些讼师或者说那种绍兴师爷，充当了一些现代律师的功能。清末沈家本、伍廷芳修律，从日本介绍进来了一套法律制度，因为日本的法律制度完全拷贝德国，他们就引进了大陆法系的一套制度。但是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来讲，他最希望引进的就是一套纠问式的法庭审理制度，这就跟我们以前古代的县官或者州府老爷坐堂，能够衔接起来。对抗式这样一种诉讼制度，当时考虑就放弃了，专制统治者不会喜欢对抗式。

当时沈家本修律，从日本拷贝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拷贝一套完整的律师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只考虑注重法庭、法官或者县太爷纠问式的一套程序，把它完整的拷贝过来。结果就导致了在清末修律的时候，是1902年，当时沈家本是清朝的一个翰林，伍廷芳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英国 bar 律师资格的，伍廷芳是一个新加坡的华人。他在英国留学，后来回国。当时伍廷芳反对，这就代表着第一次，英美法的对抗式的审判制度跟大陆法发生的冲突。在清末朝廷的力量很小，伍廷芳后来投奔到南方的革命党，投奔到孙大炮这一批人。

辛亥以后南北和谈，伍廷芳还是作为南方的谈判代表，大家需要关注一些，大家可能都学过一些法制史，但是我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伍廷芳。伍廷芳的命运就代表着第一代法律人在中国专制传统非常深厚背景下的经历，他从英国获得律师资格以后，他在中国做的种种法制改良的努力，以及他为何后来投奔“孙大炮”，成为辛亥以后代表南方跟袁世凯签订和谈协议，他作为南方代表签的字，这是伍廷芳。如果大家以后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个人的话，对中国的法制史理解会更深一些。

清末修律以后，在1908年颁布的一个《律师暂行章程》，后来没有来得及施行，辛亥的炮声一响，枪炮一响肯定法律无声，不用说律师制度了，什么东西都已经砸碎了。直到1912年袁世凯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在北洋时期的时候，很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们引进了一套律师制度，而且在上海、浙江、南京他们都有自己的律师公会，纷纷组建了律师公会。当时中国第一代律师，他们出现在社会面前完全不同于以前大家理解的绍兴师爷或者是状师，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律师制度创立的黄金时期，就是在北洋时期。

北洋时期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性很大的案件，比如宋教仁被刺杀，当时的上海法院还发出传票，传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出庭，这是上海的地方法院，同学们想一想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地方法院传召现任总理出庭。赵秉钧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自杀身亡，当然另外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把他毒死的，



伍廷芳(1842~1922)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资料来源[互动百科](#)。

当然这个跟我们的话题无关。我想说什么呢？北洋时期是前 100 年中国法律史上，组建了一套独立的司法，司法的独立性程度以及法官的专业水平，还有对抗的诉讼体制最完整的时期，就是从 1911 年到 1927 年北洋时期，是前一代法律人最黄金的一段时期。无论是律师制度还是诉讼制度，以及法律对地方生态的影响，都是一个最完整的时期，那确实是一代黄金时期。

当时的法官，理性的程度是最高的，所有的法官不得加入任何党派。当时政治上是两大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梁启超的进步党。法官是居中裁判的，他是一个中立的裁判，任何做法官的人经过司法考查，做上法官的人都必须要放弃他原来的政党立场，你不能够预设政治立场。因此，在司法的中立程度上北洋时期是最好的时期。到了 1927 年国民党北伐，国民党完成北伐以后，把司法这一块完全用党化的这套理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一套东西完全污染了司法独立。这个传统到 1949 年被共产党发挥得更加极致。

所以我们现在讲司法不独立，党控司法，以一个政党的意志来控制司法，让法院不能够进行居中裁判，现在的人攻击的话就攻击到 1949 年以后，是在共产党取得天下以后。实际上我们应该放在国民党身上，就是 1928 年以后他们用党化天下的方式在控制司法，就把北洋时期刚刚进行草创，使得学习德国一套完整的大陆法系制度建构的努力就化为乌有，从国民党时代开始，而不是始之共产党。

到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这种司法现状跟我们经济比较落后了许多，以前司法不独立的状况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现在的法院、法官，有些地方法院就是一个地方的法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政府机关，很多法官也很无奈。像我们办的案子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判决书，法院的院长出来一份，盖着法院印章的判决书出去以后，上面打招呼，或者是政法委书记或者是县一级的党委书记，他们可以公然把法官叫到党委去，一把把判决书撕掉，“哪能这么判，你重新去写”。这是我亲身碰到过的。法院不独立的话，他就完全失去了组建这一套中立仲裁程序的意义。如果说嫌程序麻烦的话，还不如恢复到我们古代中国的传统，我们古代中华的话至少还有一个中华法系，虽然说民刑不分，有很多问题。当时法官就是一个县太老爷，他是一个县官同时他兼任法官，他不能够推诿，不能说这个案子今天来到，县老爷推了，我不受理，没有这种事，他必须受理，你去击鼓鸣冤，他必须要开堂受理，公开审理。虽然说他先要打板子，但是他至少受理。不像现在我们一些案子，你要去立案，老百姓碰到很多民生的案子，经常连案子都立不起来。司法现状如此，这个司法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前几年最高法院可以发文，《通知》说什么呢？涉及到老百姓拆迁的案子法院一律不受理，或者涉及到证券公司二级市场上交易问题，法院也一律不受理；凡是碰到一些敏感、复杂，或者说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法院就得听从党委的指示，不能够受理类似的案件。前两年电影局禁了汤唯，还有《苹果》这部电影。当时《苹果》被电影局禁了，他甚至都没有发一个明确的处罚通知，就是发一个短信，告知导演你这个影片被禁了，不得在市场上进行放映。这个案子我们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个案，那我就去北京中院要求立案，电影局对我这是一个行政处罚吧，那么我们不服这个行政处罚，我可以去提一个行政诉讼，法院是没有理由拒绝受理的。法院收了状纸以后，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7 天的时间必须要告知我是否立案，但是实际上法院他们转头就跟电影局协商，电影局说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告电影局的，电影局是不能够成为被告的，那样到法庭上很丢脸，他们心目中成为被告是很丢脸的事情。

我想起来了是范冰冰演的电影《苹果》，后来汤唯又被禁，我们所做的法律诉讼上的努力，因为法院不立案，从一开始你就进入不了法律程序。因此，希望通过法制的努力改善一些冲突性很大的社会事件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你进入不了程序的话，法院的功能就很少了，它就只是一个行政部门或者说它是行政部门的附庸，这就是中国司法的现状。

我 1992 年开始做律师，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做律师。从 1993 年开始，邓小平南巡之后才允许律师 3 个人可以合伙成立一个合伙所，1992 年以前的律师，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那些所谓的律师都是官办律师，都是属于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我毕业之后，我们当时的分配制度还是政府包分配，我当时毕业分到了公安局，我有点讨厌做警察，后来就去做了律师。

到 1994 年，推行司法制度改革，就是允许律师成立合伙律师所，就是 3 个专职红本律师，就可以自己开一个合伙所。我就跟另外三个同事在贵阳开了这样一个合伙所，现在这个所发展的还是很好，算得上贵州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所，叫辅正所，我是该所原始的合伙人。我的经历先跟同学们交流一下。

那个年代科班出来的学生是很少的，80 年代的话法学院不像现在遍地都是，当时司法部的院校有 5 个，5 大政法院校，我是西南政法毕业的。像西南政法、北京政法、华东政法、中南政法、西北政法，这个排名是按照重要性排名的，这是 5 大政法院校。其他的还有像北大、人大、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这些是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80 年代的话也就是这样，但是像政法学校的话，因为培养的目标不一样，很明显这几个学校完全是为公检法培养干部。因此，像我们这种实务上的训练跟综合性大学有所不同，像我们刑事侦查这一方面课程就很多，比如说法医、痕迹鉴定、布控、预审，当时我们都学。所以毕业了，我就直接分到了公安局。虽然我没去，但是在刑事侦查的训练让我们在后来的律师生涯当中办理一些刑事案件能够更容易的抓住要点。

前两天跟中国政法大学同学们交谈的时候，现在法学院的同学在实务上的训练往往是不够的。实际上法律是一个很世俗的科学，它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在学校里面大家能够完成一个什么呢？能够完成一个法理上的积累，就是基本法律素养，形成法律人的一套思维逻辑。你要走上社会以后，更重要的是实践，这种东西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它不一定特指法律上的经验，很多是社会经验的积累。一说同学们都知道，像美国的律师，美国的法律人才培养先有一个本科 4 年，无论其他什么样的学位，拿到一个本科，然后才能够去读法律本科，毕业之后应该在 27 岁左右，然后你才可以考取司法牌照，考取律师牌照，才开始执业，这样年龄的话就在 28 岁左右了。这个年龄会对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大陆法系不一样，一般高中生直接进入法学院，读完大学，4 年以后就可以考取法官，如果你的成绩很优秀，请同学们注意，这种成绩优秀仅仅指考试成绩的优秀，在实务办理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这样的学生就可以直接当法官，做了法官，你就可以判断人的生死，确定人的生死，这是很有问题的。你的社会历练不够，你对社会感觉、经验都有问题，人家讲法官，那是决定生死的职业，那是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西方法律传统讲法官是上帝衣袍里面的跳蚤，只有他最接近正义。你在这个年龄阶段就要去做法官就要去定人生死，我觉得那是有问题的。

因此英美法这样一套制度，他从律师当中选取法官。刚才我介绍了，到了 28 岁以后做了律师，再经过 10 年的训练，他才能够去做一个法官，一个优秀的法官，这个时候法官的年龄在 37、38 岁以上，这样他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法官。而我们大陆法系这样一种培养体制，在这个问题会有局限。前几年贺卫方老师提倡司法改革，好不容易把“三合一”放在一起，就是律师跟司法官、检察官合在一起进行考试。在法学院教育方面，在大学里面开设了法律硕士，这个就有点像英美制的法律本科。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会有有效的减缓这一点上的缺陷。

但现在这个司法改革在新一届领导人上来之后，特别是现在最高法院王胜俊上台以后，因为他不是科班出来的，他比以前的肖扬差了许多，肖扬是 60 年代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胜俊完全就是一个党国人，同学们可以看到他上台以后做了什么？提了一个口号，什么三个至上，什么叫“至上”？完全很搞笑的一个东西，这个逻辑完全讲不通。然后判不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那你这个还怎么判刑呢？判不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比如说去年成都的交通肇事，酒后驾车撞死很多人，那就是一个交通肇事嘛，交通肇事就是过失的；如果他是酒后



故意高速，就像杭州飙车的一样，可能就涉及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样最多也是一个间接故意。你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他撞死了很多人不判死刑不行嘛。媒体大量报道，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就判了死刑，好像是二审改判了。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审级和最高审判机关，是唯一由宪法规定的联邦法院。1869 年根据国会法令规定由首席法官 1 人和法官 8 人组成，9 位大法官中，有 1 位是美国首席大法官，其产生过程与另外 8 位大法官一样。法官均由美国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只要忠于职守，可终身任职，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种提交的案件，一般由 9 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资料来源[互动百科](#)。

的这些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他们科室就留下两个带队老师，其他的人全部休假。他们就去度假或者去海边。警察局预审科留两个人，检察官起诉组留两个人，法官也是，就由这些同学完全接手。经过半年的办案训练，你就可以完全熟悉整个司法的流程。

这种经验的学习是你在学院里面怎么样都学不到的。比如说弄一个模拟法庭（我不知道你们法学院有没有），像这种东西不是真刀真枪的。我们这样去做，你完全是进入真正的司法程序。当时我就在警察局，我们 5 个人，我们 5 个同学在警察预审科里面实习，加上 2 个警察，一共 7 人，接管这个县整个预审，所有的案子全是你办，效率特别的高。同学经过一个月的磨合以后，上庭全是同学，比如说检察官是我们同班同学，法官也是同学，律师也是同学。通过这方式，你是在办真实的案件。比如说我在看守所负责预审，预审的警察当时有预审制度，就是现在公安局的审查起诉的法制处。1997 年改革以后没有了预审制。当时我就在做预审，嫌疑人进来以后，你做笔录，判断他可能构成什么罪，然后把它移送到检察院去。同学们大概知道这些流程吧，法学院学生应该还是知道的。

同学们办案，同学们也获得很好的体验，然后呢？当地的老百姓也觉得很好，这一帮子年轻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办案的效率特高，而且还不收礼，连烟都不收，效率特别高，同学们工作又很努力，效率非常的高，同学们

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西方法治国家那是戴假发的人，穿上上帝的衣袍定人生死的。这样一个大法官提出一个“要不要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看谁的感受啊？如何统计人民群众的感受啊？完全没有法律逻辑。提出一套完全走回头路的方式，他们推行这些措施是在对 90 年代以来司法改革的反动。90 年代进行的一整套司法体制改良举措，是走在正路上，是向着法治、向着技术化、向着法律职业精英化，以期能够形成一个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在做努力。那么现在的这种非法律出身的官僚，去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我感觉，现在法学院培养体系恐怕有一定的偏差，刚才我讲了在执业过程当中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推崇我的母校西南政法这样一套训练学生方式，第一年通行的进行法理，包括一些程序法的基础知识，最主要的是法理。第二年再进行一些程序法的训练。第三年整整实习一学期，当时我们实习是怎么样做的呢？我们一个班 40 个同学，这 40 个同学分成公、检、法、司 4 个小组，每一个小组 5、6 个人。这 40 个同学到一个县城，当时我们是到江北县，现在是重庆边上的一个区。我们就完全接手公、检、法、司，公、检、法、司原来的



也获得很多的体验。经过这样半年的训练，进行实务上的培训，实战半年时间。大四完成毕业论文，再选择你的专业方向，完成你的积淀。这样的话出去以后很快就能适应，无论你是到公、检、法、司干什么，法律四大职业你完全可以适应接受。我当时就直接分到警察局了，但是我不愿意去做警察，然后我就选择做了律师，因为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

为什么 90 年代做律师容易些呢？因为当时科班出来的在社会上做律师的人还是比较少，当时一些律师很多都是军转干部或者是司法局招干生什么的。我们当时做律师的时候不像现在，当时科班出来的年轻人，你有一套完整的法律逻辑，你可以很快的脱颖而出，可能现在的话失去了这个条件。当时我一接手，就是贵州的一个商标案件，贵州有一个茅台酒厂大家都知道，茅台酒厂跟另外一个贵州醇酒厂两家因为商标，一个是外观设计，一个是贵州茅台酒商标，双方发生争议，一边起诉你侵犯我的商标权，一边起诉你侵犯我的外观设计。当时的時候，我们刚刚出去就能够接手这样一些知识产权的案件，当时的律师因为他们缺乏这些方面完整的训练，没有学过国际私法，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像这种案子做好以后，你就迅速站稳了脚跟，马上脱颖而出。我在 24 岁的时候就做了老板，自己作合伙人，然后自己办律所，当时律师所发展的很快。我在 26 岁的时候我就带了十几个人的律师团队，到 1996 年以后我们就转向，主要是为了赚钱，就做了很多非诉的案件，当时的工厂改制、股份制改造，公司改制以后，原来是工厂制，把它组建成现代企业制度，把它变成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把他们改制上市，或者原来那些军工企业改制转型，我参与了很多。来了北京以后，可能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刑辩律师。实际上我在非诉讼方面，我在贵州是做了很多的，算得上是做非诉的好手。当然你说刑事辩护的话，那是一个律师的看家功夫了。

就像刚才我跟同学们介绍的一样，因为我们当时在西南政法接受的一套完整的实务训练，所以后来无论做什么，你上手很快。90 年代底，2000 年左右，生活状态完全有点游戏人生，玩世不恭，整天的生活状态就是吃喝玩赌了。到 2000 年左右，当时我 30 岁了，我觉得人生好象不能够这样混，也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2001 年我就跑到北大来读书，还希望深化一下自己理论的积淀。这两年我琢磨，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法学界大家的话都是政法院校毕业的很多。法学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西南半天下”，为什么呢？当时他有一个传统，在抗战时期，他是国民党时候的中央法政大学，跟一个私立的朝阳大学，当时有一个说法北朝阳，南东吴。抗战的时候这些学校就迁到了重庆，这帮法学家在 1949 年以后，共产党接管重庆以后，他们完整的留了下来。无论是英美法的，还是大陆法的，这一帮法学家的基业留存了下来。到 60 年代期间砸烂公检法，他们虽然去劳动改造，学校停办，但是他们仍然集中在一起劳动改造。1978 年西南政法复校，他们就回到学校里面，就马上开始培养下一代的法学人才。

现在同学们可能知道法学界的大家，像贺卫方、许章润、王人博、梁治平，都是在这个年代出来的。当时一届招 500 人，这种训练方式能够让人迅速成长，就是这种偏重于实务性的训练，能够让人迅速成长。跟这种综合性大学，当年像北大、人大，他们完全是苏联的那一套，虽然也叫法学院，也叫法律系，实际上就是政治系，讲的多是苏联这一套维辛斯基法学，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法学方面的积淀是比较少的，到后来才有一些变化。因此，在我看的话，五大政法院校跟当时综合性大学培养的人才，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笑傲江湖》华山派一个叫气宗，一个叫剑宗，不知道同学们看过《笑傲江湖》没有。五大政法院校有点像剑宗，容易速成，综合性大学像北大、人大、吉林大学他们有点像气宗，不知道这个比喻合适不合适，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就是实务的训练容易速成，如果说再加上自己的一种天资或者经验的积累，再加上五大政法院校人多势众，在法学界更容易出头。

我自己的律师历程，在贵州的时候觉得人生没有方向了，就到北大来念书，又在北大交友不慎，碰上贺卫方、陈瑞华这些人，受到他们一些鼓舞，你现在不是找不到方向吗？你们 80 年代的大学生，你们是受国家培养，是老百姓养活的，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自己掏钱交学费，我们当时是国家全免学费的，甚至每个月要发 39 块钱的生活费，30 块钱伙食费足够了，9 块钱还可以买点香烟抽，当时 39 块钱是很管钱的。受他们的影响，应该要用自己实务的经验，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案件。我在北大读完书以后，04 年就把律师档案转到了北京，跟北京的几个同学合伙。曾经还专门开办了一个法律援助的律所，跟全国律协人权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一个所，义派律师事务所，我作了第一届主任。这个所赚钱的都不做，用全部精力来做法律援助案件，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用我们的一些经验做一些社会公益案件，做一些影响性诉讼，通过这些案子慢慢之于中国社会，从一个权力高度专制的社会向法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我们认为通过法治进步可能改良中国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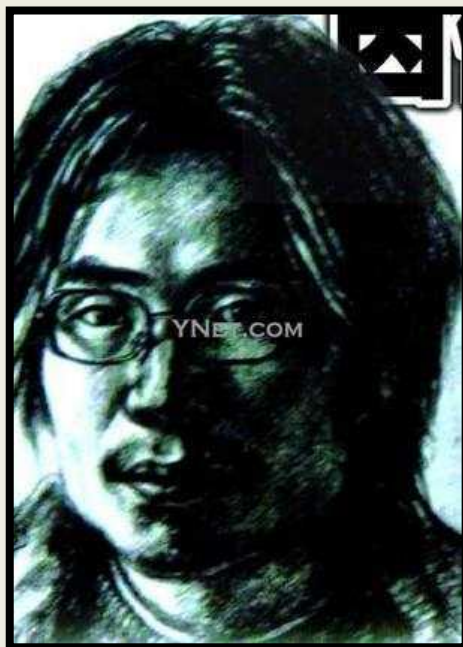
03 年孙志刚事件，这样一个典型案件推动了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的废止。受此案件的影响，我们希望用一些典型性的案件做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通过法律来化解一些社会戾气，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现在这种官民冲突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社会冲突矛盾非常大。底层百姓的不满，同学们可能在学校里面感受不到。就在昨天，昨天发生的案子湖南枪杀法官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已有媒体报道，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司法不公正引发的暴力事件。中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事情对法官具有这么大的仇恨，他动用了枪支。

07 年甘肃还有一个案子，法院年终开总结会议，有一个受了冤案的老百姓，抱着一个炸药包，因为冬天开年度总结会议，他就穿上棉大衣，冲到法院会议室，当场引爆。现在这种方式的话，社会冲突已经到了很重的地步，一般的官员思维，冲突越大，施加管制就越大，要维持稳定，他通常的思路就是暴力镇压，用各种非常手段来维稳。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法律人认为是不利于化解社会戾气的。法律最终是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如果说维护稳定，你不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去着手，仅仅用暴力或者各种非常手段来维持的话，这样的稳定只是一个短期的稳定。

我昨天留意了一下法官被杀后网络上的一些评论，你可以看到满眼戾气，暴力的张扬，大家在歌颂杀手。我相信网民还是知识分子，能够上网，能够打字，能够到网络上发言，基本上还算不是特别底层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满网络的评论都是一片欢呼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冲突已经到了很厉害的程度，我真的很担心。我们在寻求做一些法治的改良，能够提高我们人权进步的幅度，我们想通过做一些影响性案件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这种方式我到目前仍然认为是一个消除社会冲突，化解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像高压锅一样，需要得到一些释放。你必须最终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邓玉娇案件以后，我回到北京，《纽约时报》北京社长他来采访我，我们就谈到了，因为他也是哈佛法学院的



孙志刚案于 2003 年发生，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此事件虽经官方声称收容所员工犯罪的个案，却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中国政府之后颁发新法规，废除了广泛被认为是弊端漏洞、并有违宪指责的收容遣送制度。资料来源[互动百科](#)。

一个学生，在美国也做过律师，他有法律背景，于是是他来采访我。我们就深层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政治事件，在美国任何一个政治事件最终会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庭上得到解决，法庭上的解决毕竟是一个文明的解决方式，不能把任何问题变成一个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几千年的治乱循环都是一个更强的暴力打倒一个暴力，完成一个循环以后，几百年又来一次，又来一次，这个社会是没有进步的，还在原点上打转，没有社会进步。整个社会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暴力活动当中又化为乌有。



邓玉娇案，2009年5月10日晚发生于中国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出于正当防卫目的失手刺死、刺伤镇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此案引发强烈的社会轰动，邓玉娇也被许多民众称赞为“当代烈女”。夏霖律师为本案委托律师。资料来源[互动百科](#)。

法治化的努力可以使得任何一个危险的问题都化为一个法律问题，他可以去寻找律师，他可以寻求一个法律救济途径，让他的情绪得到一个缓解，他可以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律师总是诉诸于法律，他不会说“走，兄弟们上梁山”，他不会说这个话，他总是在体制内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改良方式点点滴滴，当然他会不爽。但是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就像温水煮青蛙，是一种缓慢的效应，但是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法治化的努力对于化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戾气，化解社会对立情绪是很有效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有关当局恐怕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习惯于专制的思维，他们习惯于每逢出现什么问题他一定进行强力的打压。比方说上访，北京上访的群众很多，80%都可能是一些冤假错案。你不去及时的解决这些案件，每一个地方发生上访，昨天还有一起事件是一个上访的老百姓，东北的，他来上访，县里面为维持官员的考评，就派人到北京劫访，派人把这些人采用各

种方式绑架回去，结果昨天那个女的在火车上连续捅伤9个人，昨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本来这个案子有具体的对象，最多是一个判决不公平，她的情绪有具体的指向。那么官员采取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的时候，她就把这股情绪变成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因此她就不加区别在火车车厢上捅伤他人。前一段时间杀幼儿园的孩子的案件，这些都是说明我们现在社会冲突已经到了非得解决不可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进行化解，而仅仅采取强力镇压的形式，这个后果我真的不敢预言。

我们还是回到律师制度上来。同学们在实务当中，我觉得现在谈实务的话为时过早，学校里面的教育，同学们应该在大一、大二完成基本法理的训练，适当的把程序法要精读，实体法就是泛读了，因为现在都是电脑操作。实体法了解一些法理，学会这套法律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是程序，然后法理通了，再多了解一些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比如说经济、中文、历史，多进行综合性学养的吸收，会对同学们以后有好处。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需要你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需要更多的历练，这些历练有可能从书本上来，有可能还需要同学们走上社会以后才能获得。要更多进行各种社会知识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对社会更有感触，对我们法律逻辑很清晰，坚守我们法律人所讲的正义观，坚守我们法律人所有的价值观，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资深的法律精英、法律职业人。

我今天就简单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有一些经验之谈，可能拉拉杂杂讲了很多，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我真的很紧张，比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紧张很多。谢谢同学们！





## 封面·三峡防洪



**编者按：**7月，普现洪灾的长江，三峡大坝“蓄”、“泄”之间，引起舆论的密集关注，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牵动了国人的神经。

在三峡及官方，一切似乎波澜不惊，正好证明筑坝高峡的明智。而公众，却在三峡防洪能力的“万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以及“能力有限”、“不能全指望”等诸种说法之间，无所适从，“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一朝骤雨三峡崩，共做长江鬼”之类的段子更是流传网间。

自八十年代三峡工程论证以来，官方对三峡防洪能力的宣传都是“非三峡不可”基调，如今大坝建成，官方的宣传口径却悄然改变，戴晴女士的文章对此有尖锐的说明，另一方面，在汤耀国文章里采访到的官方专家却辩解道，三峡防洪作用一直都很明确，甚至认为对三峡防洪作用的质疑是歪风；南方周末专访主持三峡建设的陆佑楣，他也坦诚交代，“三峡工程开建时，宣传得有些过分”以及三峡工程不可能解决全流域洪水灾害等。

长江防洪非三峡工程不可的神话破灭了吗？我们在此收集了一些文章和资料，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 ■ 昂贵的三峡工程防洪

戴晴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这些日子，百姓关注异常天气和全国南北洪水（特别长江流域）的当口，一则群发链接，给正抖着花翎亮相的三峡工程头面人物之鼻梁正中，涂了一小片白：“牛皮吹破”——原料来自新华社和 CCTV 历史报道：

2003 年新闻，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 年新闻，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 年新闻，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 年新闻，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此帖一出，网民哗然，工程主管官员忙不迭给出解释：没人吹牛啦，这是只认得汉字却不懂得水坝工程的人，把“媒体给出的标题涵义误解”了。也就是说，你们读到 2003、2007 年新闻，欣欣然以为这是在说三峡工程巨大的防洪效益，岂不知道我们专业人士指的，其实是坝基的选址与造坝的水泥标号。具体说，洪水再大，建在花岗岩之上的高标号水泥三峡坝体也冲不垮！这景象，黄万里曾经给出解说：“在三斗坪筑坝，像是把（作为建坝原则的）峡谷效用倒着用：坝前

只有 500 到 1000 米，坝身倒有 2000 米长：2 公里的坝拖着一条 600 公里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

大坝很结实没错，对此陆佑楣还专门到北京大学演讲，弄得爱国热情洋溢的学子们一个劲儿鼓掌——至于大水来了究竟用这结实大坝为武汉而拦洪，还是为重庆而泄洪，那就再说了。

这说的是 03 年和 07 年的豪言。08 年的“抵御百年一遇”是什么意思呢？三峡工程官员解释说，指的是通过“大坝的拦蓄调节，让下游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原来的‘防十年一遇的洪水’变成‘防百年一遇的洪水’”。

这一说法本没错——哪怕依旧有以“不明确说”来忽悠读者之嫌——可惜是到了 2010 年，也就是说，到了三峡工程终于铲平不同意见、推进到国民掏腰包（“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建成、经办人坐收电费、再拿发电机组抵投资上市圈钱的时候，才做这样平实的叙述。想当初在八十年代的论证阶段和九十年代力争工程大上快上把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气魄（或可称作“对领导和外行的掇弄”）可没这么平实。出现在《工程报告书》上的豪言，是“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能有效控制中下游洪水主要来源”，“只有兴建三峡工程才能有效地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



戴晴，原名傅小庆、傅凝，生於四川重庆，著名自由作家，独立评论人士，环保活动家。自 1989 年公开对三峡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异议。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基金、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研究基金、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研究基金等，并获 1992 年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1993 年康狄·耐斯特环境保护奖和戈德曼环境保护奖。

对此,当年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的防洪组专家陆钦侃说得非常明白:

1949 年以来,长江洪水有三种类型:一为 1954 年那样的全流域大洪水;二为 1981 年上游很大而中下游不大的洪水;三是上游不大而中下游很大的洪水。对于第一类,三峡水库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来水,对中下游的湘、资、沅、澧和赣江、汉水等众多支流不能控制;对于第二类,根据那年重庆寸滩实测洪峰流量达 85700 立米/秒,到宜昌因江槽储蓄而降为 70800 立米/秒,中下游没有洪灾,不需要建坝拦洪;至于第三类,不言自明无须细说。

到了 1998 年,在回答本笔者关于三峡官员所强调的“如果三峡工程建成了(那年正在施工中),可以把长江上游洪峰水量拦蓄在水库内,减少长江上游洪水下泄流量,对保证长江中下游人民安全度汛有很重要的作用……”,他更就洪水期来水总量(而非瞬间流速)给出解说:

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作用



细心的网友给正抖着花翎亮相的三峡工程头面人物之鼻梁正中,涂了一小片白。图片来源于网络。

究竟有多大,让我们看看具体数字:…… 1954 年洪水 6—8 月三个月长江上中游八里江以上干支流来水总量达 6570 亿立方米。其中,上游宜昌来水 2976 亿立方米,占 45%;中游诸大支流来水 3594 亿立方米。这是防洪库容 221.5 亿立方米的三峡工程得以控制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三峡水库库容相对较小,对减轻中下游洪灾是有限的。

“牛皮吹破”第四句来自官媒 2010 年新闻:“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说这句话的,是须对整条江负责的长江水利委。三峡官员此刻怎么说呢?他们不再笼统地使用“防洪”二字,改为“三峡工程从容地发挥拦洪、削峰、错峰作用”,这就是说,虽然“三峡有约 221.5 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防洪功能巨大。但如果‘只进不出’,如遭遇新一轮大洪水,水库的拦洪能力将受到库容限制。”

说到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几个描述洪水是否将酿成灾害的概念。它们是:(1)固定观测点的水流速,如今年 7/20 入库水流峰值 7 万立米/秒;(2)固定观测点水位,如该日监利水位与城陵矶水位——由此确定三峡水库的下泄流量和是否开启荆江分洪;(3)一段时间内总的洪水量——峰值过后还会有峰值。水库能否大包大揽、非我其谁地彻底防洪,要看其库容与该河道一段时间洪水总量。如果三峡库容大到 2000 或 3000 亿立米以上,他们说

过的大话就能付诸实施了。

但三峡防洪库容 200 多，已经启动并发挥防洪功能。问题是，这个建了 20 年，动迁平民百万、淹没 47 万亩良田、耗资数千亿的举世大工程，在今年的全流域洪水期，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几个数值请大家注意：

长江流域南部的强降雨，赣、湘两省夏初就开始了，然后从东向西移。按一般说法，洪水季是 6—8 月。三峡当局为争取高水头发电，6 月下旬、7 月上旬还蓄水，到 7 月 10 日、15 日，湖南、湖北、江西支流已经有大水入江的时候同时泄洪。虽然到目前还没有报出干流各测点严重超警戒水位，但在如此险情下“综合调度”，很显出三峡工程之霸气：“没水的时候，为发电守住水不放——加重下游干旱；水太多的时候，开闸放水以自保——加重下游的洪灾”（蒋高明语。同样的意思也可见记者报道：“7 月 26 日清晨，长江三峡水库下泄的洪水如期而至江西九江段。在数万军民的严防死守下，九江城防大堤安然无恙……”）。

即使霸气冲天，在可能超过 98 年的大洪水到来之际，三峡当局不得不服从了长委和国家调度。但“现有的库容量能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洪峰？”CCTV 记者问。三峡官员的回答是：“作为三峡枢纽来说，本身是具有 221.5 亿的防洪库容，作为枢纽本身应该是安全的。”原来，该真刀真枪上阵了，三峡当局就只肯保证“枢纽本身安全”了！

那么，三峡是否真有“221.5 亿防洪库容”来保证“枢纽本身的安全呢？三峡当局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让我们很难不对这一数字细究一番。

“221.5 亿库容”本是一个设计数字，是根据“正常高水位”（175 米）与“汛期防洪限制水位”（145 米）之差计算出来的。计算之后从动工到建成，已经过了近 20 年。在这些年，三峡库区水库垃圾壅塞、泥沙淤积、堤岸崩塌、泥石流……屡屡发生，真实的（而非纸面理论的）库容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其一。

第二，三峡当局几次招认，工作水位一直没能升到 175 米。所以，这一四则运算须打折扣；第三，该工程首席专家、工程/科学双院士张光斗早在 2000 年就请郭树言转致国务院领导（《“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谈话记录”》），“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 135 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十年过去，此情不仅没在“社会上”公开，为了保证发电，水位并没有降到 135 米，号称的防洪库容当然也不保。

其实，防洪功能有限，还不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通过今年洪水，我们想要追究的，第一，坝前水位究竟可以运用到多高？在突破 160 米甚至 170 米之后，660 公里外的重庆水位，依照峡谷型水坝工程比降原理，到底有多高？我们已经知道，09 年 8 月，在坝前水位达 145 米时，重庆朝天门水位达到了 183 米。还有白岩松说的按照官方设计的移民水位（175 米），还有近三万没能及时搬迁的移民。我们知道，移民搬迁试点早在论证时期就开始了，20 年过去，怎么还有数万人——他们居住地到底在海拔多少米处？如果将坝前水位升到 175 米，他们是否连房子带人都到水底下了？

第二，在三峡官员吆喝“首次迎战大洪水彰显巨大防洪威力”中，为什么只字不提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机，

也就是陆钦侃、方宗岱他们不肯在论证报告上签字、孙越崎<sup>1</sup>他们一再恳求中央罢手的主要考虑：泥沙淤积。1988年，孙越崎等十名政协委员给中央上书：“三峡水库为了蓄洪，势必大量拦沙，就要引起库尾严重淤积而可能碍航，并将壅高重庆洪水位，进一步增加四川的洪水灾害。”上马方当时拍着胸脯的保证是“蓄清排浑”，淤积不会发生。可惜今年水库防洪启动，我们看见的只有“蓄浑”，以及重庆码头上，环卫部门怎么使用大型设备清除淤泥。

那么，自揣掌握了现代技术的中国政府，面对伴随中华文明二千年的滔滔洪水，究竟如何打算？

早在1980年，水利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sup>2</sup>。这一平实、质朴、无任何光辉伟大或者“世界第一”、耗资连三峡零头都不到的长期计划，由于“投资不足”，而拖延、耽搁，终于铸成今天昂贵的、贻害多多的、大量隐患仍在隐瞒之中的高坝大库工程“有限防洪”。

黄万里曾经说，“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是绝不应“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的。临终，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长江洪水。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他最后嘱咐他的学生：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

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汛期还没有过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新消息：7月28日，在长江部分流域遭受暴雨1个月后，作为武汉水位监测点的武汉关水位将第一次超警戒（27.3米），达到27.4米，最高上涨到27.6米。湖北仙桃和武汉市蔡甸区接到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命令，连夜转移部分民众，约30000人。

已有网友跟贴：我父母昨天凌晨转移出去了，舍弃了一年的辛苦劳作。舍小家，为大家。只是想不通的是，98年特大洪水我们都不转移，如今有了三峡，还要转移。

三峡水库是否为减轻武汉压力加大蓄水了？未见报道。 **T**



图为武汉市蔡甸区接到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命令后，连夜转移部分民众。图片来源于凤凰网。

（原载自由亚洲）

<sup>1</sup> 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带领整个机构迎接中共建政的大功人士。

<sup>2</sup> 《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主要措施为：

一、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0米；城陵矶由33.95米提高到34.4米；汉口维持29.73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为10.58米；上海定为5.1米。对其他堤防，由各省分别制定标准。

二、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湖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和湖口附近区，共分洪500亿立方米。

三、停止围垦湖泊。

四、整治河道扩大滞洪能力，加强防汛。



## ■ 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南方周末专访陆佑楣

陆佑楣

七月，长江洪水肆虐，三峡防洪能力到底是防万年一遇、千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的问题饱受关注。曾主持三峡建设的陆佑楣院士接受南方周末专访，谈及三峡决策以及建设过程中的宣传问题。对本次访谈我们全文转载如下：

**南方周末：**今年7月长江洪水时，长江委、三峡电力各级领导，都通过媒体解释三峡防洪能力万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的问题，是否这次三峡各部门内部的压力很大？

**陆佑楣：**我们为什么要建三峡？首要任务就是防洪，我把它看成建三峡的必要条件。我们一直对防洪强调了很多，会造成一种舆论：长江防洪不是有三峡吗？这次长江闹洪水，老百姓反过来说，三峡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正好长江水利委员会又说：三峡解决不了长江所有的洪水问题。这个话道理是对的，但老百姓回头一想，当年吵着非要上三峡，不就是为了防洪吗？就造成现在的反应。要我看，最好来一场特大洪水来考验一下。

**南方周末：**那不是很危险吗？

**陆佑楣：**没危险，真的没危险。三峡工程本身设计标准非常高。今年这场水7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还不到20年一遇。为了保证大坝安全、可靠，它的设计标准是千年一遇的，也就是9.88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

**南方周末：**您说的是大坝本身没危险？

**陆佑楣：**是，本身的安全，就是不会漫坝。

**南方周末：**大坝不会毁，但不代表其它地方没事？

**陆佑楣：**大坝抗洪能力的设计标准很高。至于防洪功能，那是另一个概念。防洪功能就看出下游荆江大堤，三峡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解决荆江大堤安全。所以，它的防洪功能跟大坝自身的设计洪水标准是两回事。

**南方周末：**是的，人们很容易理解成三峡都能防万年一遇了，肯定就安全了。

**陆佑楣：**从防洪功能上说，没有三峡工程，荆江大堤的防洪标准就只有10年一遇，加固后大概可达到20年一遇。有了三峡水库，可以把荆江大堤的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保护荆江大堤里面60万人口。当时最担心荆江大堤，这才是建三峡的主要目的。但能不能解决全流域所有的洪水灾害呢？不可能。

**南方周末：**这次洪水其实也没有多大，不过20年一遇，但上游也淹了，下游也淹了。

**陆佑楣：**对，但这跟三峡大坝没关系。下游发洪水，不是长江干流来水，是下游来的水大。上游来的水今年7



陆佑楣，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权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84年8月至1993年1月，历任水电部副部长、能源部副部长、武警水电指挥部政委、三峡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1993年1月至2003年11月，先后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实际主持了三峡工程建设。图片来源于网络。

万立方米流量，不算太大。

**南方周末：**三峡大坝起到了间接作用？

**陆佑楣：**对。它只能控制干流，下游支流它根本控制不了。但下面紧急时可以拦一点，减轻下面的负担。发电不是水利部的利益

**南方周末：**三峡工程前后论证了 30 年，现在民间声音越来越大。这次争论，可否说是人们对于几十年前不透明程序的反弹？

**陆佑楣：**对老百姓当时的民主程度来讲，我觉得在那个历史时代应该够了。

**南方周末：**说到水位，2008、2009 年两次 175 米实验性蓄水，我都在库区，两次都没有蓄到 175 米设计蓄水高度。

**陆佑楣：**去年国务院确定 9 月 15 日开始蓄水，结果 9 月 15 日来水量一直下降，蓄不上去了。应该 8 月底、9 月初就要考虑开始蓄水，要看天气趋势。但现在水利部门害怕后面再来一场洪水怎么办？所以一直不让提早蓄水。

**南方周末：**这里有个发电效益的问题。

**陆佑楣：**每次争论，都是在水利部和三峡电力（公司）之间。水利部害怕再来一场大水，出现问题是他的责任，发电不是他的利益。

**南方周末：**发电是三峡电力公司的利益。

**陆佑楣：**三峡总公司也不是傻瓜，要考虑发电效益，同时也会保证安全。（两家）就为每年什么时候开始蓄水吵呀吵，最后由国务院拍板。从长江洪水流量看，9 月 1 日蓄水，就可能蓄到 175 米。蓄满一库水，一直用到第二年的四五月，可以多发多少电？

**南方周末：**7 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对电力公司来讲显然是好事。

**陆佑楣：**假如从发电效益来看，现在少泄一点，下面也不缺水。你备高一点水，发电量就大得多。

**南方周末：**我看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长江规划有一种说法，说能点亮半个中国。

**陆佑楣：**现在没有了。北京市一天用电量大概 3 亿度，三峡就解决北京一个城市的用电。我 1993 年搞三峡工程，之前看报道，每年春节，湖北、湖南的书记、省长都要上大堤检查，多少民工在那儿加高加固。有了三峡工程就不需要了，安全感大大提高，所以防洪功能对三峡工程上马是必要条件。三峡工程要大量投资，如果没有发电功能，要上也有一定困难。发电可以用经济效益来偿还债务，所以我把发电功能称为充分条件。三峡这次洪水就反映了发电效果非常好，一天就发了 4.3 亿度电，一直到现在是满发，超发。

**南方周末：**1998 年 8 月底，您作为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在《人民日报》上预判：2009 年竣工时，三峡基本可抵挡这种（1998）千年一遇的洪水，就是 9.8 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如果有万年一遇的洪水——您当时的原话是 12.4 万立方米每秒流量，三峡大坝可以超量蓄水到 180.4 米，库容能增加 400 多亿立方米。可今年，7 万每秒的流量只能算 20 年一遇，为何三峡就不蓄了，泄洪了呢？

**陆佑楣：**这个是防总决定的，要是我，我胆子大（就会蓄）。

**南方周末：**他们不太敢？

**陆佑楣：**对，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往上蓄，如果上游继续来大水，我下泄的要更多，对下游也有一定危险。

**南方周末：**洪水期间，我们走访了武汉、九江等下游地区，这时三峡泄一滴水对于下游都是多余的。下游对三峡的质疑是，我们的警戒线就只差零点几米了，你还泄。

**陆佑楣：**只要下游安全，就可以泄。现在是，三峡调度流量不大也要你多放。下游有时是枯水时段，（为了下游通航），三峡大坝建好后保证下游的流量不低于 5000 立方米每秒，而天然的长江在枯水期只有三四千流量。但现在要 6000，三峡也要放，保证下游在枯水期的各种需要。

**南方周末：**此次汛期损失大的是下游，尤其是一些支流。当年三峡工程最后拍板时，对外表述上基本把长江防洪当做一个整体，说三峡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

**陆佑楣：**实际上长江防洪要靠一个防洪体系。如洞庭湖、资、沅、澧四水，鄱阳湖下面很多支流，本身就要有防洪能力，不能全压在长江干流上。长江防洪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干流、支流、河道两岸大量工作要做，三峡只是防洪体系中的关键工程，就是保荆江大堤。三峡工程开建时，宣传得有些过分

**南方周末：**上世纪 80 年代，陆钦侃先生曾在《人民日报》刊载文章，说三峡对整个长江的防洪工作尤其是支流防洪作用不会很大，三峡解决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洪水。

**陆佑楣：**是的，谁也没有说过（能解决）。

**南方周末：**科学家确实谁也没有打这个包票，但真正到对外宣传报道表述的时候，就会给人们这种印象。

**陆佑楣：**这是一种误导。

**南方周末：**相信很多官员也这么认为，有一种很乐观的情绪。

**陆佑楣：**甚至中国的高级领导也会有一个概念，好像有了三峡，就什么都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

**南方周末：**但从三峡开工一直到建成，有一种情绪，就是三峡上了，就基本上解决长江洪水这个心腹大患了。

**陆佑楣：**三峡的防洪效果要看什么地区，太乐观了就有一点不讲科学了。靠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思想肯定不对。三峡工程开建时，宣传得有些过分，不是用科学态度宣传，什么三峡库区放鞭炮，这种气氛应该避免。说实话，当时要搞三峡工程，没有一股精神也支撑不下来。我当时站在江边上看这么一条江，也很迷茫，干得起来？干不起来？也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

**南方周末：**现在回头看 30 年来对三峡工程的表述，不少具有浪漫色彩的想象和乐观主义的情怀。直到最近，对三峡工程的表述才变得专业、理性起来。如一位三峡负责人在谈及多少年一遇的问题时，连续引用了十多个专业数字。

**陆佑楣：**实际是原来宣传的口径有点过分。感性的东西太多，理性的东西太少。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理性的科学工作者，您和您的同事们只是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工程最后拍板的是政治家，这里面的政治考量和科学考量，哪个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陆佑楣：**还有一个哲学家，你别忘了哲学家。

**南方周末：**当年三门峡工程拍错了。

**陆佑楣：**是的。但飞机有可能要坠毁，就别干飞机了？不行。三峡工程要保护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区鱼米之乡要不要保，沿江土地要不要保？我觉得，这种大型工程最终不是治水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人该不该干这件事情，科学家、工程师只能把客观情况反映清楚，对未来的预见有科学推理，决策是政治家、哲学家的事情。人在地球上总归要干事情的。曾经有一股风要崇尚原生态，地球上哪有原生态的地方？恐龙时代也不是原生态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整个宇宙都在不断进化，是不是？所以重大工程往往要靠政治家决策，该不该干，本质上是从哲学的观点看人要不要干这件事。

**南方周末：**但人其实是害怕改变的，尤其事关他切身利益时，肯定有疑虑。

**陆佑楣：**人必须改变。人在地球上做的事情多了，何止一个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在整个人类活动中是很小的事。新疆输气管送到上海几千公里，中间出现一点事，上海没有气，一天都过不下去。所以越是现代化的人，生活风险越大。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现在没有瓶装水、桶装水，有人不敢喝自来水，20年前哪有这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即究竟人该怎么活在地球上。

**南方周末：**从三峡建成到现在发挥作用，您的想法有什么改变吗？

**陆佑楣：**我基本上是一致的。三峡工程是应该建的。

**南方周末：**我觉得三峡工程受到一些质疑，也受到很多工程论证不完善的影响，大家怕了。科学家可以实验，我普通老百姓要……

**陆佑楣：**科学家还是进行了很充分的论证，就怕一些当政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就要出问题。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

## ■ 洪水考验下的三峡工程

汤耀国

十年前，水利专家陆钦侃等 53 人上书中央高层，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提出三峡工程在 175 米蓄水前应经历一次大洪水的考验。两度 175 米试验性蓄水之后，今年 3 月，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表示：“我倒是希望来场大洪水来检验一下。”

考验终于来到。7 月 20 日 8 时，三峡入库流量达到 7 万立方米/秒，峰值为本世纪第二高位，超过三峡成库前的 1998 年洪水。经大坝拦截，出库流量减为 4 万立方米/秒。浑浊的水柱从 9 个泄洪深孔喷涌而出，坝下激起漫天水雾。坝区，数千名游客专程前来观看泄洪壮景。大坝下游，居民也泰然处之。宜昌、荆州等地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记忆中，以前一到夏天，总上要堤防汛，若有大洪水，分蓄洪区



汤耀国，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长期关注三峡工程。



里的人还要担心分洪、转移。

国务院三峡办技术与装备司副司长周宪政对本刊记者说，此次洪水，还算不上一次大考，“7 万立方米每秒而已，不到二十年一遇。按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洪水来得再大点也不用担心。”防洪是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截至 7 月 23 日，三峡大坝已在今年汛期累积拦蓄洪水约 120 亿立方米。经历多年利弊之争后，在主事者看来，此次防洪正是三峡工程大显其利的表现机会。

然而，洪水中仍然有“口水”。

## ► “汛期泄洪”

三峡集团是三峡工程的业主，但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主人”，尤其在汛期。三峡集团枢纽管理局局长张曙光向本刊介绍，正常情况下，当洪水小于 25000 立方米/秒时，由三峡集团负责调度；当洪水在 25000~56700m 立方米/秒时，由长江防总负责调度；当洪水大于 56700 立方米/秒时，由国家防总负责调度。特殊情况下，上级防总可以直接调度。

6 月入汛以来，长江流域已历三次集中强降雨阶段。从 6 月 19 日到 7 月 20 日，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下称长江防总）连续向三峡集团发出 14 道调度令，指挥其控泄拦洪。7 月 10 日 8 时，三峡入库流量高达 36000 立方米/秒。除 26 台 70 万千瓦发电机组满负荷发电泄水外，三个泄洪深孔泄洪也先后开启，是为今年汛期首次开闸泄洪。此后两天多，下泄流量控制在 32000 立方米/秒以内，部分洪水被拦蓄，坝前水位有所抬升。

时值长江中下游遭遇暴雨袭击，干流多个站点水位继续上涨。于是，不少民间专家、网民质疑：长江下游汛情告急之际，三峡大坝却为何不断向下游泄洪？鉴于三峡防容库容还剩下大半，有不少中下游百姓还希望，三峡大坝能多拦蓄一些洪水。

周宪政解释，三峡水库汛期的防洪库容有 221.5 亿立方米，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发挥防洪作用。一是拦洪，拦蓄超过下游安全泄量的洪水，确保下游河道行洪安全；二是削峰，在下游防汛形势紧张时，削减上游来的大洪峰，减少水库出库流量并均匀下泄，缓解下游的防洪压力；三是错峰，防止上游洪峰与下游洪峰相遭遇，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一旦下游防汛形势好转，则抓住有利时机，加大出库流量，降低水库水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可能发生的大洪水。

张曙光说：“不到危险的时刻，我们不能把底牌亮出去，子弹不能一梭子打完。”

7 月 20 日，三峡下泄流量达 40000 立方米/秒。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蔡其华对本刊记者表示，此泄量并不大，下泄之后，沙市、武汉江段俱在警戒水位以下。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的调蓄作用，此次洪水将使长江干流宜昌以下河段全线超过警戒水位，部分河段的防洪形势将极为严峻。”蔡其华说。

水利部副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刘宁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夏洪水发生以后，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总总指挥回良玉批示，要合理地、科学地调度三峡等水利工程，兼顾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和库、湖、塘这几个方面的水情，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综合效益。

据此，刘宁所介绍的三峡工程现行调度方式是：当入库流量小于 50000 立方米/秒的时候，控泄 34000 立方米/秒；当大于 50000 立方米每秒的时候，控泄 40000 立方米/秒。一方面控制荆江大堤沙市河段水位不超警，另一

方面即使拦蓄了洪水，也不至于顶托而影响上游嘉陵江的行洪，以尽可能减少重庆市受淹的范围。

## ➤ “巨大”与“有限”

在“汛期泄洪”的质疑声中，有不少论者在互联网上称：此举印证了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逆调节”说法，即汛期泄洪，枯水期蓄水，“防洪功能形同虚设”。

本刊记者查找黄万里有关三峡工程的重要文稿，并未见到“逆调节”以及导致“防洪功能形同虚设”之说。

黄万里反对三峡建坝的主要理由是砾卵石淤积问题。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他在一次上书中称：“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三峡水库的运行方式为从黄河三门峡工程教训中总结出的“蓄清排浑”，水丰沙多的汛期“排浑”，汛末或汛后“蓄清”，枯水期补水。“排浑”不仅可起到排沙效果，汛前将水位降至 145 米左右的汛限水位，也正是以备防洪之需。汛限水位与正常蓄水位 175 米之间有 221.5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三峡工程防洪作用到底几何，在本次度汛期间引起争议。

近日，诸多网站转载一篇题为“三峡大坝，到底可以抵挡几年一遇的洪水？”的文章，文中列举了几则新闻，标题分别是：2003 年新闻“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2007 年新闻“‘三峡’将全面发挥防洪功能 可抵御千年一遇洪水”，2008 年新闻“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 年新闻“长江水利委：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另有一幅截图将前述四条新闻连在一起，有评论讥之，“三峡折旧速度，一年不如一年。”

看到前述文章后，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感到很奇怪，他说：“作为专业人员，从三峡开始争论那一天起就知道三峡的防洪作用非常明确，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把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如果配合分洪措施，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至于‘抵挡万年一遇的洪水’，是指大坝本身的安全性。”

张博庭是位屡屡与“反坝人士”打笔仗乃至上法庭的“挺坝人士”。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出现前述非议的原因，有误解，也有误导。他用“歪风”来形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一直是欺人之谈”的说法。长江水文局局长王俊教授对本刊介绍，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范围，主要是保护中游的荆江河段，对城陵矶地区亦有辅助性作用，另外还可延缓洞庭湖的淤积，提高武汉防洪调度的灵活性等。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三峡工程论证期间，有关防洪功能的论战要害并不在于上述作用本身的是非。大体而言，一方认为上述作用巨大，三峡工程不可替代；一方认为上述作用有限，有替代方案或其他优先方案。三峡工程防洪作用另有一些基本局限在学术圈内的分歧，如 221.5 亿立方米实为静库容，真正调蓄洪水时的动库容会有一些变化，具体为多少尚无定论，与洪水大小等因素有关。周宪政介绍，设计方在初步设计时即已考虑动库容，并经复核认为，动库容与静库容的差异，并不在质的方面影响三峡工程防洪功能和长江防洪安全。据他介绍，221.5 亿立方米的静库容也并非完全一成不变。目前，145 米的汛限水位可视情上浮 1.5 米、下降 0.1 米。175 米的最高蓄水位也可在极端洪水情况下打破，超蓄至 180 米。

## ➤ “防止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从可行性论证通过至今，三峡工程在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的地位一直被表述为“关键性骨干工程”。

蔡其华说，三峡水库今年首度拦蓄长江大洪水，即显示出在长江防洪体系的不可替代的骨干作用。7 月 20 日前后这一轮拦蓄上游洪水 70 多亿立方米，使长江上最为险要的荆江河段水位降低 2.5 米左右，保持在警戒水位

以下，从而告别昔日千军万马上堤防汛抢险的景象。

监测结果显示，此次洪峰经削峰通过宜昌河段后，长江中游主要控制站沙市、汉口水文站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长江中下游仅九江、洞庭湖及鄱阳湖水位处于超警戒水位。同期可比的是1998年7月24日，宜昌洪峰流量5.17万立方米/秒，荆江河段的石首、监利等水文站水位就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三峡集团枢纽管理局高级工程师赵木森对本刊记者表示，三峡工程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相当于4个荆江分洪区的容量，其“防洪作用巨大，但也不能包打天下”，“切不可因有了三峡工程而掉以轻心。”1958年中共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他；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长江防总专家介绍，长江防洪体系是以堤防为基础，以三峡工程为骨干，干支流水库、分蓄洪区、河道整治以及蓄、引、提水等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体系。

1998年洪水过后，李锐、陆钦侃、翁长溥等一些水利水电界人士批评前期水利建设之失，如“重水库、轻堤防”。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国家真的开始痛定思痛。”刘宁日前介绍，国家于1998年后加大投入力度，对长江干堤进行加固、修缮，3900公里的长江干堤已经全线达标，1998年大水以后进行建设的29个项目全面完成，这些都为今年的防汛抗洪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撑作用。

长江防总专家分析，尽管长江中下游现状防洪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遇一般洪水，依靠堤防，经过严密防守，基本可以安全度汛，但仍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荆江地区目前依靠堤防的防洪标准仍较低，一旦发生类似1870年洪水，可能会发生荆江南北两岸堤防溃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毁灭性灾害；

二是城陵矶附近区遇大洪水分洪量还较大，如遇1954年洪水，城陵矶附近区分洪量320亿立方米，要淹没近400万亩耕地，涉及约260万人，淹没损失将很大。

支流的堤防等水利建设缺陷，以及分蓄洪区人口规模的扩大，也令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对长江防洪体系不敢太乐观，他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体而言，现在仍然有差距，还有完善的空间。”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此处有删改）

#### 【扩展阅读】

- 1、[防洪论证报告主要结论](#)；
- 2、[《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报告》中关于防洪的内容](#)；
- 3、[怪老天爷 还是怪自己——就1998年长江大水访防洪专家陆钦侃](#)；
- 4、[三峡水库缘何汛期泄洪](#)；
- 5、[洪水检验三峡](#)；
- 6、[三峡大考：二十年一遇洪水惊动长江全流域](#)；
- 7、[三峡答问：怎样抵御“万年一遇”洪水](#)；
- 8、[解读三峡防洪标准，慎用“百年一遇”](#)；
- 9、[三峡大坝“牛皮吹破了吗”](#)；
- 10、[为什么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

## ■ 附：三峡防洪史上的其他声音

**陆钦侃：**近年来长江中下游发生多次大水灾，这三年长江中下游洪灾损失共达二千余亿元，还给沿江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痛苦，甚至人身丧失，以及许多间接损失。合起来也超过 2000 亿元了。三峡建设总公司的负责人至今还在强调：“如果三峡工程建成了，可以把长江上游洪峰水量拦蓄在水库内，减少长江上游洪水下泄流量，对保证长江中下游人民安全度汛有很重要的作用……”

1954 年洪水 6—8 月三个月长江上中游八里江以上干支流来水总量达 6570 亿立方米。这是防洪库容 221.5 亿立方米的三峡工程得以控制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三峡水库库容相对较小，对减轻中下游洪灾是有限的。

……对长江中下游当地暴雨造成的涝灾，三峡水库也是无能为力的。今年长江洪水比 1954 年还小些，上游来水也不大，就算三峡水库已经建成，可拦洪减少中下游洪灾损失也不可能很多。所以说，加固加高堤防的作用还是主要的。

—— 戴晴《就 1998 年长江大水访防洪专家陆钦侃》

**李锐：**关于“三峡工程可以根本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这个游辞巧饰的说法，几十年来主其事者常含糊笼统地这么宣传，从上到下，大家也都跟着这么说。……要知道，三峡工程只能控制川水(长江一半流域面积)，根本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中下游湘、鄂、赣、皖田亩受淹，多因本地先涝后洪，与川水无关；四川发大水首先四川遭灾，中下游不一定遭灾。不论有无三峡工程，中下游堤防还是必须加强加固的。这些问题，1958 年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工程的决定，早已明确指出。

—— 李锐《1992 年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

**李锐：**防洪不仅是个水利工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大型洪灾是多少年才遇一次，如果投入巨资修三峡这样的水库，只是为了防御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而水库修好后多少年内又未遇到这样的洪水，那么所投入的资金及利息就浪费了，其损失是非常大的。若投入几千亿元资金修防洪水库，几十年内却没有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几十年内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达到几万亿。水利部门长期以来只管花钱、不算经济帐，这是他们主张单一的水库防洪方针的一个根本原因。在防洪问题上，还应当考虑非工程措施，就是实行防洪保险，万一发生洪灾，由国家和银行按照承保数额提供赔偿。

—— 李锐《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林一山：**据多年研究，在上游兴建三峡水库，控制宜昌以上洪水，是主要办法，在中游，我认为采用荆被放淤，是上策，既能起防洪作用，又可能产粮食。

—— 林一山《必须充分重视荆江防洪问题及其三峡工程的相互关系》

**李海波、陈炎炉、郭永金：**一次大洪水年的分洪损失，比修建一个三峡大水库所花的投资和迁移的人口还多，而三峡工程却是一次投资，世代受益，即除害，又兴利。

丹江口水库拦洪蓄水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该工程可控制汉江来洪量的 75%，由于它的建成，配合下游堤防建设和分洪区的运用，已将汉江防洪标准由三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这一生动具体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兴建三峡水库的必要性。

—— 李海波、陈炎炉、郭永金《也谈长江防洪的正确途径——与陆钦侃同志商榷》



## 副刊

**编者按：**当举国将成功模式奉为人生的圭臬并顶礼膜拜之时，世存先生在《中国人生的圣经》里提醒我们，人生还有另一种生存范式，民国的卢作孚等人就是其典范。他们向我们昭示了人生的丰富性，生活的内涵，以及伟大的真正尺度。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圣贤之路，这正是我们当前的时代所最为缺乏的。慕彦臣先生《“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一文，重点介绍了我所上月付梓印行的《思想的蝴蝶》一书，我们在此刊登。

远在澳洲的李程远先生为我们惠寄了《对话黄有光》一文，在采访黄有光教授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身上，充满年轻人的活力。作为一名华裔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一直很关注中国经济，近年来又多次赴中国访问，本次访谈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 ■ 中国人生的圣经——序《回到卢作孚去》

余世存

就在中国人对成功人士献媚或成功人士洋洋得意之时，社会戾气空前地高涨。普天之下，莫非暴民，率土之滨，莫非暴行。这种残暴之横行，成功人士也在所难免，甚至是攻击的重要目标。

### 一

三四年前，我到厦门访友，遇到一位做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年轻朋友。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从北京到海南，又到厦门，放弃了现代都市人的正常生活，默默地跟农民工一起，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奋斗。在深入交流后，我问他何以走上这条道路，他说得极其平静：有一天，他读晏阳初先生的传记，夜深人静，无以排遣，一人放声大哭，哭过之后，决定了现在的生活。

这是我能够理解的。我还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从一个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清末以来的中国，出现了无数堪称人生楷模的圣贤、仁者、志士。这些人立身处世之正念正精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望之难以企及的高标。他们留下的人生遗产，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都难以忘怀，在毛泽东的心里，有着一个长长的感念的名单：张之洞、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章士钊、李鼎铭、陈光甫、鲁迅、孙中山……

这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圣贤君子之风教，即

我们从自家文化中找到人生的教益。它使顽者廉，

使懦者立，使天地得以复其心，生民得以立其命，使世道人心得以维系。直到今天，市场经济如此发达之际，我们社会仍要不断地推出值得人们学习借鉴的人物，以满足我们当代人生自我完善的需要。

遗憾的是，尽管有毛泽东以及年轻朋友的实践，我们当代人的眼界多是向外看的。在我们跟清末以来的民国人物之间，有一道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的市场宠儿宁愿花几百万元跑到美国去跟巴菲特之流共进一次午餐，我们的企业家开口闭口都是德鲁克、盖茨、索罗斯、松下……我们的知识人笔下多是哈耶克、哈贝马斯、哈维尔……我们的市场消费也多是卡耐基人生哲理箴言、罗兰小语、刘墉经典语录……人们就这样迷失其中，乐而忘返，找不到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这样的情形连域外人士都不免惊讶。据说，美国汉学家墨子刻先生在一次跟中国学人交流时，郑重指

出，你们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穷究福柯、哈贝马斯的学说，不如多去了解你们自家的宝藏，须知，近代中国并非一穷二白，在思想资源的提供和人生示范上，



余世存，湖北随州人，青年思想家，自由撰稿人。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代表作《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常言道》、《类人孩》。

门。

唐君毅等人的努力不亚于西方的学术同行，而且更切己……

这种守着金饭碗仍要向外讨饭吃的情形，似乎一时难以改变。即使我们口口声声说读经、尊孔，但在我们跟经典、孔子之间，仍有着深刻的断裂。我们难以理解经典何以救济我们当下，难以理解孔子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至今未能全面理解民国人。要打通我们跟自家传统文化的隔膜，回到民国几乎是不二法门。一句话，回到民国是回到自家经典的方便之门。

## 二

但我们当代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民国想当然地理解了。即使一个人以为自己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再以为民国是“万恶的旧社会”，甚至不再以为那时“一穷二白”，但在内心里仍不免以历史成败论看待民国人物，以当代成功人士心理看待当时的生活。他们以为，民国人在知识、实业、地方建设、乡村实验……等方面的努力已经有历史的结论了。即使他们承认民国人的德性、事功、革命，但他们以为那都已经告别了。

我曾经在北大做“现代中国的实业家”之演讲，以卢作孚等人为例，演绎其人生的丰富性。听众虽然同意，但仍以为他们虽然了不起，活得却累了一些。

我也曾问过一个当代富豪，众人眼中的超级成功人士，您觉得您们跟民国的企业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富豪朋友想了一想，回答我说，比较起来，我们比他们善于生活，懂得生活。

这种隔膜之深可以想见。甚至我自己虽不同意，但也曾以为然。比如我感叹当代成功人士的无知时，就觉得当代富豪完全不知道旧上海买办们是多么懂得生活，以及善于生活；完全不知道旧中国的晋商徽商们是多么懂得生活，以及善于生活。但我没有想到卢作孚、张謇、范旭东这样的救国救民的实业家，我在心里也想当然地把他们当作清教徒了。

实际上，就是这些所谓的“清教徒”，较之买办、晋商徽商们在生活方面也不遑多让，他们也许少的是口腹之欲，但在生活的诸多领域一点儿也不匮乏。甚至就享受生活而言，我们当代人的享受也多是难以见光的。诚如中关村的一位企业家所说的，他羡慕比尔·盖茨等西方同行，因为后者可以生活得“那么阳光”。卢作孚的社会园艺家之生活、范旭东的企业王国、张謇的南通实验，等等，确实远比当代成功人士的生活更纯正，更丰富，更阳光。甚至说，正是他们的努力，才真正在纯粹的商人之外，奠定了极为丰富的中国人生实践。他们打破劳资关系的汇通努力，不仅是传统儒家伦理或清教徒式的革命，而确实在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计划之外，开辟了新的道路。

卢作孚们显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远非当下成功人士所能比拟，在当代人的想当然里，卢作孚们的人生是悲剧的，甚至是注定失败的。所谓民国人物被雨打风吹去，这就是结论。这种想当然，仍受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类历史决定论阴影的蛊惑。因此，当代人才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并徒然地以现代物质成就的可能性打造出所谓的成功人士神话。

实际上，我们当代社会最大的虚无病症之一即是对所谓成功人士的加冕和羡慕。成功人士成了一个生活确定的目标，成了一个令普通人嫉羨交加的物质主义消费代表。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在这种成功人士

的人生参照里，卢作孚的人生当然是难说成功。但中国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管理大师德鲁克说得好，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因此，就在中国人对成功人士献媚或成功人士洋洋得意之时，社会戾气空前地高涨。普天之下，莫非暴民，率土之滨，莫非暴行。这种残暴之横行，成功人士也在所难免，甚至是攻击的重要目标。

因此，该卸下我们心中关于成功的想当然了，该回到我们应该回归的地方去了。人穷则返本。是以西方人在穷窘状态里会返回来处，寻求人生社会的思想资源，他们不断地回到自己的先人那里去，甚至提出口号，“回到康德”，“回到苏格拉底”……他们深知自己并非一穷二白，因此不愿手捧金饭碗到处讨饭。我们当代这些拿着金饭碗的人，也应该回到卢作孚那里去，回到晏阳初那里去……

### 三

卢作孚从一个穷苦孩子自学成才，在人生道路上一路打拼，横跨政界、商界、学界，立功、立德、立言之不朽都可赞可叹可颂，被人称为圣贤。实际上，这种圣贤，在我的研究而言，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超人，而是一个深得自由真义的心灵和行藏极度自由的精神个体，因此，他的话语才那样契合大众的心理。所谓千古圣贤的一点真骨血传承，其实就是这种珍贵的自由精神。其立言之明心见性，之与普通人相通，远非当代成功人士一类的企业家的言行可以望其项背。当代人与其看成功人士的训导，不如回到卢作孚去。

卢作孚在当时人眼里被称为完人，完人并非不懂得物质享受，而是比急功近利的当代人更懂得生活。了解卢作孚的人会同意，他是打通了圣凡之隔碍的。他不像我们当代社会上层下层之间贫富之间强弱之间这样分歧、对立，甚至彼此敌意，卢作孚在这些看似断裂的地方出入自如，或者说，他的一大功德就是弥合这种社会断裂。因此，当代人急切地要求社会成功圣经，要求和谐或人生絮语，不如回到卢作孚去。


卢作孚经历过人生严重的时刻。我曾称道卢作孚有一种“利艰贞”的“明夷”智慧：内难而正其志，

君子以之，明不可息。这种智慧无论是创业，还是对待危难，都有大功用。当代人要求励志明心的哲理，要求应对个人身心危机或社会危机，不如回到卢作孚去。

据我所知，一如年轻的志愿者回到晏阳初那里去，教育工作者回到陶行知那里去，回到卢作孚那里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从学者、作家、退休人员，到影视工作者，规划设计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卢作孚是一座富矿，可以挖掘不尽。

本文作者有着在海外生活十几年的经历，自承“反倒觉得很多宝藏就在国内，要做的就是把上面的灰尘拂去，恢复它原本的光彩”。这是见道之言。作者研读卢作孚多年，为我们奉献出了一个可亲近可学习的卢作孚来。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它为我们回到卢作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我个人在成长之路上也从卢作孚那里受益匪浅。现在看到这样一部著作即将问世，拜读之中，再次印证我的想法：卢作孚跟我们并不隔膜。他深通我们平凡人心理，而尽心尽力地鼓励我们个人自立自足，从而推动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这部著作也再次印证我的想法：卢作孚跟传统文化并不隔膜，跟西方文化也不隔膜。他是中西文化结合而产生的现代完人，他是圣贤，又是自由的典范。我们在这自家文化人物中，能发现由过往至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唯有惊喜与感恩。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份“迟到的追怀”。较之市面流行的语录、人生箴言，较之成功人士自己都浮躁的言不及义，我敢肯定卢作孚的言行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生的圣经。因此，我乐意为之饶舌，将我们自家文化中这千古相传的真骨血揭示出来，并与读者共勉。

是为序。 

## “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推荐好书《思想的蝴蝶：高校人文讲座 24 讲》

蔡彦臣

这本文集有多少人能看到，我不太关心，而且现在看到它也是知识特权的标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预示着训政主义最美丽的时光到来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 引言：并非生造的词汇

“白封出版”这个词是我自造的。其一，官方有白皮书的习惯由来已久，我看到的特定书目就无法以白皮书来指谓，因前者民间色彩极重之故；其二，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前期出生的人，我对外表无商标等图案的香烟感触深刻，其为特权产品，能显示特定消费者的身份，而有些特定书目现在不乏其“特权”性。

刚刚看了一部分的“白封出版”，是无书号、无标价，当然也无出版社名称的好书——《思想的蝴蝶》。

### ➤ 偶然设计的模型

在正是介绍该书之间，先说三个小插曲：

第一，我到北京办事，见到时隔十一年之后再见的一位老朋友，话自然很多。他说在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工作，那也是 NGO，我对他们的第一辑讲座汇编大为欣赏。他也挺高兴，给了我第二辑，外加《思想的蝴蝶》。

第二，在北京南站坐动车返程时，安检之后，年轻的女安检员还要看看我背的一包书，和手提袋的书。我问何以有检查书的规定，她说：“上面新来的规定。”

我一点没想到我手提包中的两套“白封出版”会出什么问题。另一套，也两本，是受托带给石家庄的一位朋友的。我在 8 月 5 日，要去石家庄代理出庭一件行政诉讼官司。

第三，坐上动车以后，看在北京买的两期《炎黄春秋》杂志（6 月号 and 7 月号），其中 6 月号第 69 页有



一则广告，说：按需印书，稿子要符合国家出版法规定，书成后没书号，不能买卖，可留世与馈赠。看完这则广告，我轻松一笑。假设火车站的安检真地扣下了我从朋友那里拿到的“白封出版”，我和他们发生争执，他们留滞我，而我消磨时光看杂志，这则广告不正成了和他们交涉的有利于我的证据了？！

### ➤ 画饼的可能 VS 可能的画饼

浏览在北京买的数本杂志，翻看《思想的蝴蝶》文集，恰恰就很随机地翻到了展江先生的一个报告。展江是做传播学的，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他讲的是《新闻立法展望》。应当说明的是，整个文集的主体受众都是大学生，所以文集的副题是“高校人文讲座 24 讲”。

展教授的讲座一如此前我看的传知行研究所讲座第一辑里所有的文章一样，风格轻松，思想独特。展教授对中国的新闻立法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通过一些案例来说明，至少希望是有的，不至于绝望到什么等都等不到的地步。他讲的新闻立法不仅仅是纸面媒体所需法律，而且还包括到出版，甚至电子媒体。

这就很有趣了！他的这篇妙趣横生的讲座，能让我这位京城之外的人读到并在纸上圈圈点点，正是它





綦彦臣，河北泊头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网易历史名博/专栏作家）。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

的载体出于既合法又不合法，或曰合理不合法的地位上。当然，法也有好坏之分，像“白封出版”之非法是不合于恶法。有人曾问我什么叫恶法，我说：有权立法并执法的人们在你们家门口按了一个大栏杆，你绕道就费事，不绕道就罚你，罚你罚得没脾气，这就叫恶法。

好法的设置非常之难，如出版法或新闻法，或曰新闻出版传媒法，提案屡屡有之，立法却遥遥无期。而恶法却非常容易通过，并且废止极难。怎样去掉

“大栏杆”即不让有些势力随便“罚款”——不受限制地使用惩处权呐？按展教授的思路是大家一起要求中国人大批准“B 公约”。有没有可能？我看有的，但不可能是现在。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展教授持欣赏态度。我也如此。不过，真正做起来，还要有非常有素质的公民或公民团体来施加压力，即在细节上和政府较法理之劲。而对于我这样比较清高的人来说，是不好做到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去本地市政府——还是他们（法制办）约我过去的——谈一个我代理的仲裁案件，起初他们说给复印两种文件，五分钟过后变了卦，只复印一种，上面的市长批示还遮下去了。我没跟他们谈什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没去找市长（正市长是我同一个专业的中专校友），起身便走。对方反觉不好意思，要拉我再坐会儿。我文骂他们一句：“老吏如妓！”

其实，在现实中，那些老吏，包括上到一定层次的大吏，真地不如妓女。如果一定较劲，我宁自污说在妓女中有朋友，也不愿承认在政府部门中有朋友。也许有人说我激进。恰恰相反，正是我看到政府的操守不如妓女，我才得更耐心地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这也是我赞赏傅知行研究所印“白封出版”的原因之

所在。

## ➤ 知识价值的化学反应

整个文集中还有不少对于我的信息量而言，知名或不知名的学者。茅于軾，张鸣，我很熟悉，不必评价他们的观点。倒是茅老早就坚持的观点，让我看了展教授的文章后，再次提高了领悟程度。几年前，茅老说少讲民主多讲自由，我对此不太明白。而展教授说了“信息公开”在中国不叫“信息自由”的缘故之后，我才恍然大悟。

展教授的原话说：“因为有些官员害怕提到自由。中国很有意思，民主可以大讲，自由很少提，你们看，民主在我们媒体上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自由都不提了。”（参见文集第 270 页）

另外一位影响不亚于展教授的学者叫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他讲的题目是《不合作精神与公民社会》。里面的一些东西和展教授有相通之处，比如中宣部的“记忆洞”作用——“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每天发生的新闻给销毁掉，然后再重新造出一期来”。（文集第 245 页）

尽管萧瀚先生的这话是从奥威尔《1984》一书上套来的，恐怕这本文集要拿到出版社，审稿编辑会枪毙了它，最好的也会要拿掉这篇文章或删除这段话。如此以来，需要拿掉或删除的就太多了，结果文集也就成了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面的鱼骨架。所以，采取这个“白封出版”的办法来传播思想，是很不错的方式。传播者印书不是为赚钱，甚至连成本都别想收回，但是，结果生成了启蒙效应，出现了知识价值的化学反应。

至于张千帆博士的文章也即讲座《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从学理上为吴思的血酬定律做出了诠释，尽管他没提到后者，而吴思先生在该讲座中的题目是《官家主义：一种历史分析框架》（文集第 67 页至第 88 页）。

我有不少外界赋予的身份，但是本质上还是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也因该学问的前身是经济学里面的历史主义学派，就不可避免地有历史表达的习惯了。张博士对血酬定律的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

则容易多了，尽管他没有引用吴思先生的文献。他讲到“现在的执政党是通过千百万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政权，为了革命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然不愿拱手让人”，还有“既然新的利益集团原先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为了得到平衡，它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寻租赎回以前所付出的成本”。（参见文集第 395 页）

这两段话，从政治学往制度经济学方面推，学者们不难发现它们隐含了这样的道理：

第一，训政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又甚嚣尘上，在微观是公权力的极度扩张——公开妓女名字与在你们家门口设大栏杆，都是为说明他们的道德优先性；

第二，在一个政治单一而社会多元的场态中，训政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谋求利益（且不说得利正当与否），而谋求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社会评判；

第三，道德教训的资格与利益谋求肯定有一个平衡点，或者平衡区域，而一旦这个点或区域被超越，训政的道德性自然就会下降；

第四，道德资格的损毁或慢慢降低，会带来暴力索偿——接受道德教训的极端分子会认为受骗，所买不值，退货途径缺乏，只好采取极端方式。


因此，中国训政主义在一段时间的猖獗后，比如奥运十年纪念后，就会招致大规模的社会索偿。那时，景象是可怕的——经济陷入热寂，骚乱成为常态。那样的情景，我也不愿看到。不愿看到的现实道路，只有及早结束训政主义政治，全民走向宪政。话可能不小，而清高之态丝毫未变。所幸，还有许多不要钱而发言的良心学者存在，其队伍也在扩大，斯此文集是为证明。

## ➤ 结语：训政主义的黄昏来了！

这本文集有多少人能看到，我不太关心，而且现在看到它也是知识特权的标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预示着训政主义最美丽的时光到来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最后，在给这本文集拍照做本文插图时，我特地

选了最新一期《经济观察报》第 15 版做衬托。这一版上有法学专家李曙光的文章《新闻法的出台已经非常紧迫》。其文是否可以印证展江的乐观，本人不做评论。多说的是，关于这张报纸，带出了一个天大的新闻——它的记者触怒了权力与资本的联盟，遭到了网上通缉。尽管现在事情急转而下，滥用公权力的人公开道歉了，但是，这不是他们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整个社会不再相信训政主义，不相信它还具有任何道德基础。

我说“训政主义的黄昏来了”，绝不仇雠之言，而是基于对民意的基本判断。我说“经济陷入热寂，骚乱成为常态”，绝不是诅咒哪个势力，而是说那是恶劣的训政主义带给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必然灾难！

## ■ 对话黄有光

李程远

从客观来讲，现在我已经上了年纪，回过头去想，当时搞左派学生运动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假如以现在的受教育程度去思考着个问题，我可能就不会参与学生运动了，我会想，去搞左派也不一定能搞的成，即使搞成了，也未必是一个好结果。



李程远，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新闻系毕业，现为自由撰稿人，关注中国民生现状与社会变革。

岁月似乎更加偏袒智者。在采访黄有光教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身上，充满年轻人的活力，矍铄的目光，爽朗的笑容，敏捷的思维，极好的记忆力，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讲到一个话题，他总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办公室成堆的书海中找到某一份相关的文献，证明自己刚才说过的话，严谨得像是一个初学写论文的学生。

作为一名把“快乐”作为研究经济最重要指标的经济学家，黄有光以身践行着自己的理论，采访过程中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位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老人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年轻时投身于左派学生运动，二十几岁只身来到澳大利亚，1971年获得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任教于Monash大学，累迁至终身私座教授（Personal Chair），1980年入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三十年来，在世界顶尖杂志上发表数百篇论文，跻身世界十大华裔著名经济学家。

作为一名华裔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黄有光一直很关注中国经济，近年来又多次赴中国访问，对于中国的经济现状，他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 ➤ 关于经济转型：市场主导，政府参与

问：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转型？

黄有光：中国经济的转型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采取出口加工是没有错的，中国人多，劳动力多，做加工很合适，这也就是林毅夫强调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就不能继续依靠产品附加值的制造业了，如果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市场内在就会要求转型。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折衷主义（Eclecticism）：即市场能做的让市场来做，市场比较有效率；同时，也不排除一些方面，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环保，一些大的方针政策，这些需要政府来做的，也应该让政府参与。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通货膨胀，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通常我们说，货币是中性的，即货币本身不会造成经济危机，但这是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考虑到市场中有一部分是不完全竞争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市场，所以完全交给市场来做，是行不通的，有些事情还是要政府来做。

在转型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未尝没有机遇，比如可以淘汰一些低效率、高污染生产企业，向较高效、较环保实行产业转型，可以利用成本降低的机会，加快对社会保障、交通、教育、卫生、环保、科研等领域的发展。

中国增长的动力有几点：首先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市场开放了，就积极了，这点要感谢邓小平（笑）；其次是我们有后发优势，中国可以少走弯路，这里面也有制度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并不是个奇迹；再次，人民非常勤劳，并且中国人的习惯是高积累，低消费。这三点中，第二点优势会逐渐减少，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距离发达国家还差很多，因此还有很大的转型空间。

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是会逐渐减慢，但这是必然现象，关键是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那么中国将迎来一个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发展。但是，

必须趁着未来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来消除这些社会问题，这样将来要减速的时候，社会才会比较稳定，不会出乱子。

## ➤ 关于房价：政策性打压，不一定能压得住

问：讲到社会问题，现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房价太高，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能力。近一段时间，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打压高房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的房价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你不能说一定是泡沫。为什么？去年我在国内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研讨会，讲房价的问题。主讲人认为中国的房价是泡沫，我就问他说，你怎样衡量？他说我根据房价对于人均收入的比例。我就问他，现在这个比例相比 1988 年，哪一个更高？他说，应该是 1988 年更高。我说如果现在是泡沫，那么 1988 年不是泡沫的更厉害么？从 1988 年到现在，中国房价不是一直在长么？所以，我认为，虽然中国的房价，与人均收入相比，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确是很高，但是你还是不能就此断定它一定是泡沫。

中国房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大城市买房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与房价的比，不见得比其他国家的高。而且，影响中国房价的还有政策性因素，比如农业用地不能用来建商品房，土地买卖也受到一定限制。假如放开这一限制，如果开放农业用地建商品房，那么中国的房价一定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知道中国的农业用地是很有限的，因此开发农业用地建商品房的可能性不大。现在中国政府出台政策，打压房价，但是不一定能够压得住。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市化还会继续，更多的人期望在大城市购买房子，那么长远来看，房价还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增长。

问：近年来，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一直不断，最近还有经济学家撰文强调人民币应该与美元脱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有光：我觉得现在人民币的定价太低了，不但应该跟美元脱钩，而且尽快升值。即使短期内不能大

幅升，也要慢慢升上来。一个国家的币值，就像一家厂商的产品的价格，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价格定得低肯定是可以多卖，定得高一些，买的人就少一些，如果定得太高，肯定卖不出去。但是如果定得太低，卖得虽然多，还是会亏本。如果价格不能回报成本，多卖不见得是好事，即使是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因为我们生产是需要人力、物力资源的，此外还要考虑到许多其他因素，比如环境污染，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定的这么低，等于把生产的产品贱价出卖，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劳动力，还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不值得。

我这样说，不是替美国人说话，而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思考。即使出口减少，外汇收入也减少，也不见得是坏事。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导致外汇收入减少，表示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资源减少。这些资源，一来可以用来生产其他附加值更高的出口产品，二来可以用于生产其他对本国人民有利的产品，三来可以用着鞋子远来能生产提高经济的生产力的产品，比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对国民有利的。

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对出口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长期来看还是有利的。人民币一升值，一些以出口为主，利润不大

的工厂，可能会倒闭。不过我认为这是不需要担心的，中国经济在这方面，适应能力非常强。举个例子来说，2008 年金融危机，第三第四季度，珠三角大量工人失业，都回家了。不久前不是又闹“民工荒”了么？工人又不够了（大笑）。中国工会的组织能力比较弱，



黄有光，澳籍华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以福利经济学研究著称，对“快乐”有着独到的见解，被誉为“快乐经济学家”，是国际知名的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也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因此人力资源分布完全是市场在调节。因此，即使是一些工厂倒闭了，人力资源会立即流向其他工厂，这种市场调节能力，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强。

我再举一个例子，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是好的，但是还是有人认为短期内会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论证这个问题，我说短期内也许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中期就会调节过来，结果呢？短期就调节过来了，加入反而出口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更好，加入世贸对经济完全没有大的影响嘛。这种情况是西方国家中不常见的，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适应力之强。

## ➤ 关于外汇储备：美元不如黄金可靠

问：人民升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外汇储备的缩水，对此您怎么看？

我 05 年就讲过，中国已经不需要更多外汇储备了，即使政府有钱，要买，也是买黄金。05 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超过七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过国民产值的 40%，日本虽然外汇储备多，但只占 GDP 的 12%。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两万多亿了，可以说，中国现在完全不是外汇不足，而是持有太多，而且是低利息美元债卷。有多低？比通货膨胀率还要低，所以基本上是赔钱的，长期借给美国人钱，不赚反赔，我觉得很可惜。

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我要说，美元不可靠。那欧元呢？欧元更糟。你去欧洲，会发现欧洲的东西贵得不得了。从个人角度来说，欧元和美元比，我选择美元，美元和澳元比，我选择澳元，澳元和人民币比，我选择人民币。当然，中国政府不能储备人民币，所以他们得想别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把外汇放在美元上，不如放在黄金上。这样即使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受到冲击的影响也会降低。黄金在国际市场上 400 美金 1 盎司的时候，我就写信给余永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作者注），建议中国抛售美元，多买黄金。现在看一看，黄金在国际市场上涨到 1200 美金 1 盎司了（笑）。

## ➤ 关于澳洲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汇率高于购买力

问：作为一名华裔澳籍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澳洲经济？能不能谈谈留学生比较关注的澳元汇率问题？

黄有光：在过去的几年里，澳洲是西方社会中经济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一方面本国的经济没有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它有很多资源像石油、天然气、矿石可供出口。尤其是它主要出口的国家，中国和印度，近几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有能力购买澳洲的出口货物。因此澳洲的这种良性发展还会持续。近年来有人认为澳洲经济存在通货膨胀，其实不然，因为它本身发展很好，物价上涨也属于正常现象。未来的花，澳洲经济短期内不会出现大幅动荡，最多只是疲软。

08 年澳元的大幅度贬值，从 0.92 美元一路跌至接近 0.60，主要与国际市场上有卖家大幅度抛售澳元有关。世界金融危机，有的卖家认为经济不景气，要抛售手中的货币，属于正常现象。那么澳洲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有限，一旦国际形势开始好转，澳元的汇率反弹较为迅速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以购买力来讲，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在 0.75 ~ 0.80 属于正常。但是，正如我刚刚讲过的，近年来澳洲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处于上升状态，因此澳元的汇率可能会略高于它的实际购买力，综合来看，85 ~ 90 美分也是正常的。最近澳元兑美元大概是 82 美分，属于偏低，可能会涨。

## ➤ 关于人生：早年投身左派运动，至今不后悔

问：听说您早年投身于左派学生运动，能不能谈谈您对那段经历的看法？

黄有光：那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大笑），从客观来讲，现在我已经上了年纪，回过头去想，当时搞左派学生运动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假如以现在的受教育程度去思考着个问题，我可能就不会参与学生运动了，我会想，去搞左派也不一定能搞的成，即使搞成了，也未必是一个好结果。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我问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原籍中国吉林省。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5岁。

黄有光：这方面是有的。我记得最危险的一次，警察半夜冲入学校抓人，被我们知道了，于是几百人组织起来，堵在校门口，不让警车出校门，要求释放我们被捕的同学。后来政府动用了“镇暴队”，就是那种手持盾牌和电棍的，驱赶我们，并且抓更多的人，于是我们几百个左派学生就拼命逃，我个子小，跑在最后面，几乎被他们抓到了，那一次真的是非常惊险。

问：是否类似的经历使您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发生改变了呢？

已故的哲学家，英国人罗素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一个人二十岁的时候不相信共产主义的话，这个人会是个傻瓜。如果这个人到了四十岁，他仍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话，这个人又一定是个傻瓜。如果一个人到了六十岁时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话，这个

我，我可能会不赞成搞学生运动。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又觉得，年轻人应该有一股热情，愿意对社会作出贡献。

我一直认为，当时搞学生运动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这段经历，也愿意和别人分享，把它当作我的一段光史。参与学生运动体现了我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一种热情，当然，现在来看，这种热情不一定要搞学生运动，也可以是其他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活动，比如像汶川地震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跑去当志愿者，我觉得这种热情是很好的。

问：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之类的，比如来自政府的压力？

人是天下最大的傻瓜。”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不过我变得很慢（大笑）。

## ➤ 关于朋友：我比较看得开，有些事情要放得下

问：您的好友，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曾致力于改良社会，还因此身陷图圉，您能谈一谈他么？

黄有光：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在学术上也有很多愉快的合作。1987年我在美国马里兰州大学访问的时候，杨小凯打电话给我，有意到 Monash 大学任职。我读了他寄给我的文章，觉得非常好，应该说是我目前读过最好的两篇文章之一（另外一篇的作者是江西财大的博士陈军昌，内容也是基于杨小凯的理论），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大概是年轻的时候搞过左派学生运动的经历，我很欣赏他，不久就介绍他来到莫纳什大学任讲师，后面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第二年又获终身教职，后面的升职就很快，直到2000年升为私座教授（Personal Chair），并且入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小凯来莫纳什大学以后，我经常向人们介绍他人狱十年的光荣史。后来小凯曾两次向我说，这事最好不要提起。他可能认为入狱不是光荣的事，我个人认为，为贪污抢杀等而入狱当然不是光荣的事，但为了改善社会而成为政治犯，是很令人钦佩的事，可能是我比教看的开（大笑）。他后来跟我说，有时甚至不相信自己写过那篇《中国向何处去？》，我告诉他，那个时候你是用这种主义的理论去批判这种主义本身，很激进，就像我参加学生运动，全凭一股热情，后来等你不想这些的时候，自然就放下了。

## ➤ 关于武侠：最爱金庸《射雕三部曲》

问：您年轻的时候曾写过武侠小说，您怎么看待武侠这一东方色彩的文学作品的？

黄有光：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后来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是写着玩（笑）。武侠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种尚武精神的体现。我最喜欢的武侠小说，应该是金庸

先生的“射雕”三部曲。其他的虽然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三部最好，应该算是一个巅峰。

## ➤ 关于诺贝尔奖：做学问要务实

问：听说您曾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还有人说您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

黄有光：我的确是有在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做提名，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评委。大家知道，诺贝尔奖的评委并非经济学家，他们需要一些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经济学家来帮他们提名年度获奖名单，他们会向我征求一些意见。关于获得诺贝尔奖，主要源于我和杨小凯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译者提到了一些关于我们的研究受到诺贝尔奖青睐的事情。书翻译的很好，但是经过媒体一宣传，后来就变成了说我是最有希望获奖的华裔经济学家，不过我觉得有点夸大（笑），做学问，还是务实为好。



我们东搜西索，前翻后顾，发现无措的是：“不是找不到答案，而是答案很多——总会出现些半吊子学者和专家给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连半吊子也够不上，自然会被半吊子的答案给忽悠进那深不可测的逻辑迷宫。一旦进去你会发现他无比还有趣，张五常先生美其名曰：套套逻辑。非常正确，非常赞同，你要追问下去，就会发现原因子虚乌有——理论的基础子虚乌有？还有比这个更荒谬和更有趣的吗！

“在研究货币本质中受到欺骗的人，比谈恋爱受欺骗的人还要多”。这看似搞笑的言论，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所以这里首先声明我不能给你提供什么现成的东西。金·哈伯特曾说过：“在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货问题”。很抱歉，我不一定是那万中之一，所以最好瞪大双眼，时刻保持警惕。

现在我们一起推演看看，历史脉络大致如何，然后再我们再细节展开那些有趣的东西慢慢品味。

从最早的余物对换，人们开始学会如何以新的方法来获取所需。或许这是分工的一个开始，人们开始不自觉的专注自有优势，使用自己的盈余物品兑换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生活一时变得十分美好。好像什么都不缺了。

但人是自私而聪明的动物，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劲。A 用一只鸭子换了 C 一只鸡，而 B 用一只鸭子换了 D 十只鸡甚至还带一头牛。A 很不满，D 更不满。问题出现了，以物易物是有巨大缺陷的，一只鸭子到底能换什么。必须有个大家都接受的标准。否则就会产生问题，吵架必然增加交易的成本。

好吧，大家可以默认一只鸭子换一只鸡。那么其他的呢，驴马牛羊等等如何对换，统统需要大家商议一个规则出来？看问题变的复杂了，一个交换需要记住这么多东西，实在难为交易者了。

那么有人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使用各种少见的物品来做等价物比如贝壳，石头，骨头等等。看又分工了，并且开始产生专业知识。为了公平，一切都值得。

## ■ 货币趣谈

冯素磊



冯素雷 Feng Sulei

近年来人民币持续的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已经深刻的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不自觉地，总会有人重新研究和货币相关的问题，再加上 08 年的金融危机，经济成为不可不谈的话题。于是经济学界开始重新掌握话语权。和货币相关的种种问题，也被再次提出，比如近代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协定，黄金非货币化，包括货币的非国家化等等。这些历史，协议和观点一时闯入，不由使人茫然无措。

题，也被再次提出，比如近代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协定，黄金非货币化，包括货币的非国家化等等。这些历史，协议和观点一时闯入，不由使人茫然无措。

但是，骨头和贝壳本身有缺陷，因为有些人总是能够搞到无穷多的贝壳和骨头而却又不花什么成本。天哪，简直没法想象。专门搞生产的在这个时候不如搞货币投机的。想想也对，你生产的是商品，还得对换，而人家的可是直接生产货币啊，那可是后来国家银行干的事，定位高端，思想超前。想不赚都难。

事实就是事实！问题就是问题，该正视的正视，该解决的解决。

所幸的是科技进步了。金银被提炼出来，这个很有难度，没有人能够轻易搞定。哪怕你有金矿在手，想提炼出金子来依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货币的生产成本高昂，也正是由鉴于此，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才开始出现。金银作为货币开始流通，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贸易之路。有些人开始冒险，走出自己的部落，走出自己的国家，把各种物品带到各个地方，随着需求的变大，大规模的贸易出现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长久，围绕黄金和白银，人类开始漫长文明的旅程。

但是不管黄金白银还是其他贵金属，有两个天然的缺陷，沉重而不易运输，容易磨损。在运输不便的时代，那就是噩梦。一个长途交易不足斤两还是小事，途中出点人为的故障那就是大事。更别说碰上个海盗，劫匪了。官府的税款还有人敢劫，还怕你个商团。运输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

既然难以运输，那就不运输或少运输呗。想法很正点。问题是怎么实现。

答案是分工，把货币的运输专业化，贸易信用化。组织专门的机构来解决运输难题。钱庄，银行之类的商业机构雏形出现，他们把各地的金银整合起来，避免流通，直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简言之，就是 A 地的金银就放在 A 地，B 地的金银放在 B 地。A 地和 B 地的交易不再互相运输货币，而是直接把 A 地的金银标记成 B 地所有就可以了。操作过程就是换个所有权的标签。发给你个票证（就是纸币）就可以。梦幻般的解决方案。纸币流通变得可能。

但是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各地金银的兑换标准不同，会影响到整个金银货币的流通走向。比如 A 地金银互相兑换比例是 1:10，B 地的金银兑换比例是 1:20，那么整个流向必然变成如下情况：A 地的人拿出 1 块黄金去 B 地兑换 20 块银锭，然后返回 A 地再用 20 块银锭兑换 2 块黄金。然后重复以上步骤。最终将会导致 A 地黄金流失，B 地白银流失。

既然金银兑换有这个问题，那么纸币同金或银兑换必然也有同样问题。

突然好像回到了余物对换的时候，以金银本位制为基础的纸币方案同样有缺陷，且几乎无法避免。何去何从。退回去？不现实，大量的交易使用早期的金银来直接支付交易成本太高。退回去弊大于利。

既然是金银兑换问题，那么是纸币和金银脱钩不就好了。但是纸币的价值谁来保障，谁来发行。

现实中的答案是政府。那么问题就回到了文章开头。要是政府经受不了诱惑，使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侵吞公民财产，那时怎么办。要知道那样相当于直接抢劫全体国民。要知道那将会产生不可预料的灾难。要知道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通过以上的种种推定，原本的货币问题在最后发生了变化，货币本身的问题变成了政府信用问题。政府的忠诚性和可靠性成为解决货币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再来看，怎么最终问题会发生转向呢。

原因之所以好像比较难以理解。是因为我们没有厘定货币本身。那就是为什么政府就应该发行货币！政府为什么天然的拥有垄断货币的权利！货币为什么就不能拿到市场上去竞争，最终由市场来决定。

把最终的选择权交给使用者本身而非政府，这样岂不是更合乎民主的本意。还是货币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它可以高高在上像上帝一样不可亵渎和争议。如果没有，那么问题必然在于我们本身。

政府默默的垄断着货币的发行权，是否经过了你的同意？如果没有，你怎么就能容忍呢！





## 传知行推荐

### 新闻

- [北京启动“脉冲行动”黑车被查一律按上限罚款 2 万](#)（来源：京华时报）
- [上海金山查黑三轮 众多车主连人带车跳下河](#)（来源：新闻晚报）
- [辽宁卫生厅官员怒揭医院“潜规则”](#)（沈阳晚报）
- [用自己的血救自己的命 自体输血缘何遭遇推广难](#)（来源：科技日报）
- [药企将梦断黄金十年？](#)（来源：广州日报）
- [济南有两百家网上黑药店 假药暴利达 600%](#)（来源：齐鲁晚报）
-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 5800 万 幸福感普遍低于正常](#)（来源：中国青年报）
- [陈竺表示:改革支付制度是解决看病贵的最好出路](#)（来源：北京晚报）
- [中国上半年税收完成 3.86 万亿元 同比增 30%](#)（来源：人民日报）
- [财政部:上半年房产税实现收入 457.8 亿 增长 7.6%](#)（来源：证券日报）
- [财政部:下半年将研究完善个税制度](#)（新京报）

### 文章

- [正本清源还是病急乱投医？](#)（作者：顾昕）
- [地方医改方案评述](#)（作者：顾昕、余晖、熊茂友）
- [30 省医改方案盘点](#)（作者：王世玲）
- [“铁托主义者”谈南斯拉夫悲剧](#)（作者：秦晖）
-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必须终结](#)（作者：陈志武）
-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作者：徐友渔）
- [我们离法治有多远？](#)（作者：梁治平）
- [再议“第三条道路”](#)（作者：布莱尔）
- [政府等于国家吗？](#)（作者：傅国涌）
- [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作者：邓晓芒）
- [在海外的“中国模式”](#)（作者：吴敖祺）

## 好书

《近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话语》(一):  
黑色与白色的异类

楚望台

对中国人来说,“民族”、“种族”、“民族国家”等词语的界定相当困难。尤其是在19世纪之后,各种族群观念与学说历次登场。民族叙述从一个文化共同体变为想象的血缘共同体,更使得“民族的”与“种族的”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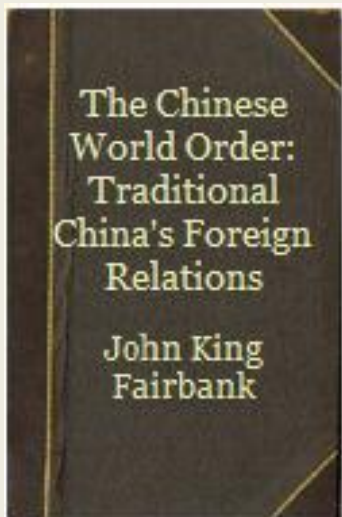
这篇文章希望通过引介一个脉络性的阅读材料给读者。它意图说明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并且推动“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生成,进而超越了政治共同体(王朝)及文化共同体(儒教),成为新的历史叙述主体。

近代中国人的种族身份意识被激活,是由“陌生者”的闯入开始的。李鸿章讲“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合地球东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对“大变局”的惊叹,常在各种版本的近代史中被引用。整个古代历史中,中原地区常常被周边民族侵入,也常有异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新王朝(包括李效忠的满清皇室)。这说明在李的眼中,异族与异族之间是有重大区分的。这一区分与种族的生理特征有关。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战争与交往,均维持在黄种人之间。欧洲白种人的大规模进入,给他带来强烈的危机感。



楚望台 Chu Wangtai



在经典《尚书·禹贡》的地理论述中,禹分九州,以王畿为中心,每五百里为单位,将疆域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又谓,“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文明从中心向外部辐射,又和种族观念叠合在一起——文明的程度导致生理的差异。荒服是政治疆域的最边界,在那里生活的民族处于进化的底层。如《左传》称“戎,禽兽也”。

五服之外的空间,长期属于想象的世界。小说和猎奇笔记对这些疆域生活的人进行畸形化的描述。这就是前近代一般士大夫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史学家以中国中心主义称之。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2010年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这种观念作了集中阐释。该书编于1968年,2010年5月译为中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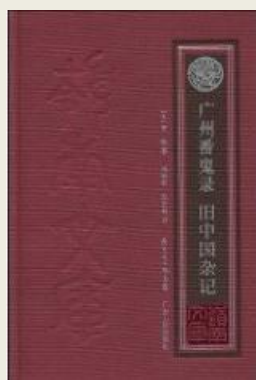
明清两代的航海技术进步，描写外洋风貌的著作多起来。如明蔡汝賢的《東夷圖像》、张燮的《东西洋考》、清朝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同时，广州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对黑人和白人形貌的叙述多载于这一时期的方志之中。如《嘉靖廣東通志》、屈大均《廣東新語》、王臨亨《粵劍篇》、杜臻《粵閩巡視紀略》等等。这些具有相当多的传闻、想象、捏造成分的著作，成为后来魏源《海国图志》的资料来源，并成为官员的施政参考。例如《东西洋考》对欧洲人的描述：

……红毛番自称和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红毛番云。（颜师古曰：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其种也。）……

……佛郎机（指葡萄牙和西班牙）身長七尺，眼如猫，嘴如莺，面如白灰，须密卷如乌纱，而发近赤。


作于乾嘉年间的《皇清职贡图》（（清）傅恒等编纂，广陵书社，2008年4月第一版）描写荷兰人贩运来的非洲黑奴：“夷人所役黑番奴，即唐时所谓崑崙奴。生海外諸島，初至，與之火食，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或病死，若不死，即可久畜。通體黝黑如漆，惟唇紅齒白。”《海語》对黑奴的描写则是：“……圓目黃睛，性絕專慤。木食，如猿獠，近煙火，淚目死。”

这些形容很容易让人想象到《山海经》中的那些海外异兽。用动物的肢体组合来形容异类是一种悠远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山海经去。



生理特征的显著差异，导致汉人对待白人与黑人的态度，与对待满清、蒙古、日本的态度截然不同。虽然早在16世纪商业往来就已开始，但在各种文本叙述上仍习惯性的将其异类化。

在华的外国人意识到了这种歧视。一位美国人威廉·亨特写了一本《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威廉·亨特著，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描述这一时期外国商人在广州的生活状态。

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辨，区分自身（self）与他者（others）时，文明上的优越感和种族上的优越感是一体的。生理特征可以很轻易地将两者区隔开来。在战争之前，中国人并未，也并无兴趣积累对陌生种族的认识，儒家经典对外夷的论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态度与策略。殖民战争开始之后，外国人开始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宗教性想象开始进入对陌生种族的叙述，以弥补知识和策略的不足。外国人的形象开始从异类变为妖魔。 

## 【关于传知行】

ABOUT THE TRANSITION INSTITUTE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立于 2007 年 3 月，英文名称为 The Transition Institute（简称为 TI）。我们致力于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等，并通过各种渠道推广给大众人群。其他出版物可从我们的网站上获取。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83-034 信箱 / 邮编：100083 / 电话：010-62618102 /

传真：010-62618102 / 联系邮箱：chuanzhixing@gmail.com /

网址：www.zhuanxing.org /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 23 号楼 401-403/